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9 772096 337179

2018/4

统一战线学研究

二〇一八年第四期（总第十一期第二卷）

新时代统战理论研究的的话语意识与话语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话语权建设。话语权建设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中国话语权建设面向国际，旨在应对世界话语格局“西强我弱”的状况，旨在为我国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争取话语权，基础在国内，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话语权的基础即为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中国话语是外在表现，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是内在支撑。这就要求充分挖掘、建设和阐释中国自身固有的话语资源。这些话语资源内含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华文化之中，深刻体现着“四个自信”。其中，统一战线作为重要法宝，是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的重要内容，是争取中国话语权的重要资源，是增强中国话语自信的重要条件，是加强中国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力量。

统一战线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上层建筑构件，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而且具有话语意义。这就要求增强统一战线话语意识。统一战线话语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实践话语。目前，统一战线政策话语的使用最为广泛。长期以来，理论界更多把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政治事物来使用，更多作为一种重要工具来看待，更多使用政策语言来阐释。加深对统一战线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实践层面，而是要进入理论提升的层面；不能仅停留在政策层面，而是要进入学理阐释的层面。因而，增强统一战线话语意识，主要就是增强统一战线学术话语意识。增强统一战线学术话语意识，要求自觉把统一战线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来看待，要求用专业的话语概念和研究方法来加以阐释。新时代统战理论研究要大力引入多学科的话语概念，要大力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统一战线学术话语要回答清楚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机制的重要内涵，回答清楚统一战线作为人类社会重要政治现象的学理依据。

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不是为了话语而话语，更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应从治国理政的实践出发，作出更有说服力的阐释。新时代，统一战线学术话语构建虽任务繁重，但适逢机遇。新时代是统一战线话语构建的战略需求期和战略机遇期。新时代统战理论研究的的话语建构要把握重点、增强回应。一是构建统一战线的元话语。要对统一战线的战略价值确立新的话语表述，重视提出新概念、新话语，以对统一战线实践形成话语引领。二是构建统一战线的理论话语。要对统一战线各领域加强理论阐释，形成有说服力的话语表述。这些话语涉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宗教中国化、“一国两制”等。新时代统战理论研究要站在统一战线制度的高度来对这些方面进行话语阐释。三是构建统一战线的实践话语。要对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加强理论提炼，从中提炼出具有话语功能的理论概念。统一战线的话语构建从统一战线实践而来，也反过来指导统一战线实践。新时代统战理论研究增强话语意识和加强话语构建，将促进统战实践与统战理论统一，促进统一战线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实践话语的互动融合，进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更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18年第4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编 委： 王英津 冯玉军 朱陆民 齐鹏飞
许建英 严安林 李金河 李春玲
李路路 杨 恕 肖存良 吴志成
邹平学 沈桂萍 宋 俭 张献生
张 峰 陈先才 范柏乃 罗振建
周 勇 周淑真 袁廷华 莫岳云
钱再见 殷啸虎 郭春生 黄天柱
蒋 锐 蒋德海 韩云波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 王 庆
主 编： 何晓栋
执行主编： 汪守军
编辑部主任： 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18年第4期（总第10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2卷

编前语

封二 新时代统战理论研究的话语意识与话语建构

《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专题：新时代祖国统一问题研究

05 论大陆对台话语主导权的建构：意义与思路 / 王英津

12 蔡英文主政下的两岸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 / 刘佳雁

26 国家统一的理论探讨 / 朱磊

——基于复杂性思维的视角

40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 / 林子荣

统一战线基础理论

48 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新发展 / 贺善侃

58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及提升路径 / 钱再见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 ◎ 《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 中国终身教育学术研究数据库总库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统一战线工作

- 68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模式转换与发展方向 / 肖存良
——以上海市黄浦区“海燕博客”为例
- 76 新乡贤统战：基层统战工作的整合拓展与全新模式 / 许 军
——以浙江省县以下实践为案例
- 86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新乡贤统战工作 / 范景鹏

统一战线历史

- 92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的由来新探 / 路 璐
- 100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政商关系：从冲撞到磨合再走向飞跃 / 耿 曙

国际统一战线

- 106 新时代中美合作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背景、条件与对策 / 王俊生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18 No.4(Sum No.10) Vol.2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 United Front Theory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 05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minant Power of the Mainland to Taiwan Discourse: Meaning and Thinking
WANG Yingjin
- 12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the Cai Yingwen's Administration
LIU Jiayan
- 26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National Un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Thinking ZHU Lei
- 40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o the Work of Taiwan LIN Zirong
- 48 New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Theory in the New Era HE Shankan
- 58 Democratic Party's Democratic Supervision Ability and Promotion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QIAN Zaijian
- 68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United Front Work for New Social Strata
——Taking the "Haiyan blog" in Huangpu District, Shanghai as an Example XIAO Cunliang
- 76 The United Front Work on the New County Sage: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United Front Work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a New Model
——In the Case of Practice in Counties Below Zhejiang Province XU Jun
- 86 The United Front Work on the New County Sage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AN Jingpeng
- 92 A New Exploration of Origin on the Concept of Marx's United Front LU Lu
- 100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Over the Forty Years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the Collision to the Grinding and Then to the Leap GENG Shu
- 106 Sino-US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to Solve the Korean Peninsula Problem:Background,Condi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WANG Junsheng

论大陆对台话语主导权的建构：意义与思路

王英津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如何加强大陆对台话语主导权的建构是新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大陆未形成对台话语主导权。原因主要有：大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两岸力量对比中没有占据显著优势地位；大陆未凝聚起一支建构话语主导权所需要的人才队伍；大陆涉台研究力量分布状态不尽合理。大陆的对台话语现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推动大陆对台话语主导权建构，不仅是大陆综合实力不断壮大的内在要求，也是增进大陆软实力的重要举措，还是防止大陆陷入台湾“话语陷阱”的需要。未来大陆建构对台话语主导权的基本思路是：在学术话语方面，着力建构大陆自己的概念、理论、分析框架和方法论体系；在政策话语方面，要通过修正旧论述来建构新论述；在大众话语方面，要着力打造和使用涵盖两岸元素的论述；要有意识地打造一批进行理论创新和话语建设的研究团队；要坚持以解决问题为指向，增强话语对两岸分歧的解释力；要强化话语的利益基础，并系统稳妥地推进。

关键词：台湾问题；两岸关系；祖国统一；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8）04-0005-07

新时代是党的十九大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界定，是我国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一切工作布局的出发点，也是大陆制定对台政策的出发点。对于大陆来说，如何结合新时代这一大背景，进一步将大陆战略优势有效地转化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乃至两岸和平统一的推动力，是当下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新任务。其中，加强大陆对台话语主导权的建构是这一新任务的重要内容。

一、大陆尚未形成对台话语主导权的表现和原因

所谓话语主导权是指在话语领域因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产生的引导、改变乃至支配其他个人或组织的话语权力。从内容构成上说，对台话语主导权主要包括两部分：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

DOI：10.13946/j.cnki.jcqi.s.2018.04.001

作者简介：王英津，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引用格式：王英津. 论大陆对台话语主导权的建构：意义与思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4): 05-11.

而后者又包括政策话语（大陆处理对台事务的政策表述）和大众话语^①（大陆争取台湾民心的政策表述）两部分。为行文清晰起见，笔者将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和大众话语作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概念并列起来使用。

（一）大陆尚未形成对台话语主导权的主要表现

虽然大陆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对台湾已经形成明显的战略优势，但在话语权领域并未占据明显优势，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在学术话语方面，大陆迄今没有完全建立起自己研究两岸关系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目前，部分大陆研究者尤其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或对两岸关系中的深层问题了解不够，或形成了用台湾话语来诠释两岸关系问题的路径依赖，习惯性地照搬台湾学界的语词和理论来研究两岸关系。从目前大陆公开发表的涉台研究成果来看，沿用的概念和理论多是由台湾方面在20世纪80—90年代建构的。譬如，“台独”“独台”“华独”和“蓝营”“绿营”。在那个年代，这些概念较好地反映了台湾社会的政治生态状况。但时过境迁，这些概念已经不能很好地诠释和描述当前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和发展境况。再譬如，“主权-治权”理论分析框架。台湾学界在建构这一框架时，本身就是基于“对己有利”“为我服务”的原则，即使这些概念已经不合时宜，台湾方面也不可能主动放弃它们。因此，在大陆未能建立起自己的话语表述概念及理论的情势下，不仅谈不上用己方话语影响台湾社会，反而容易掉进台湾方面所建构的“话语陷阱”。

第二，在政策话语方面，虽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导权问题，但仍存在既有表述有待于与时俱进的问题。当前，大陆对台政策话语在整体上是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但是，其中的个别表述在当时适应和推动了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也发挥了积极的功效，随着时代背景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存在着调整或更新的问题。譬如，20世纪90年代后，大陆方面曾表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甚至未来两岸统一时的“国名”“国号”都可以商量；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提出了“共同缔造论”，即“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应是一个尚未统一的中国，共同迈向统一的中国”^[1]。“共同缔造论”是汪道涵在当时两岸力量对比并不悬殊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时至今日，两岸综合实力已经不在同一量级，在大陆日益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的情势下，修改“国名”“国号”和共同缔造第三主体的模式很难被大陆民众接受，需要重新框定。

第三，在大众话语方面，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力有待增强。大陆是否掌握对台大众话语主导权，主要看以下两个指标：其一，是否对台湾民众产生说服力；其二，是否对台湾民众产生引导力。前者来自于该话语是否能直接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同，后者来自于该话语是否能间接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同。进而言之，即大众话语本身是否反映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与趋势，并凭此促进台湾民众逐渐接受大陆的话语内容，最终形成两岸价值共识。依据这两个指标来观察，我们发现：过去一段时间，大陆的对台话语对台湾民众产生的影响力不大，原因是绝大部分台湾民众根本就不愿意听、不愿意看、不愿意了解大陆对他们所做的宣传和论述。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固然与他们对大陆的敌对情绪有关，但与我们的话语建构不到位也有直接关联。

（二）长期以来大陆未形成对台话语主导权的主要原因

第一，大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在两岸力量对比中没有占据显著优势地位。这是根本原因。在两岸互动交流的30多年中，大陆更多地重视对台政策的表述和调整，而忽视了对台学术话语的建

^① 此处所指大众话语与通常所说的大众话语有所区别。在通常情况下，大众话语是指大众通用的话语，而非官方面对大众时所用的话语，此处的大众话语是指大陆官方争取台湾民众的话语。

构和创新。长期以来，台湾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绩，尤其是台湾作为西式自由民主社会的一员，习惯性地以西式话语来审视和评价大陆，并凭借一时的民主成就对大陆体制抱有偏见。与此同时，大陆体制的优势尚未充分得到阐释，这不仅削弱了形成自己话语主导权的信心，而且助长了台湾方面话语权的“威风”。过去大陆综合实力不强，是大陆未能形成对台话语主导权的主因。大陆学界频繁论及大陆在两岸力量对比中的优势地位，也仅是近些年的事情。

第二，大陆未凝聚起一支建构话语主导权所需要的人才队伍。话语主导权的建构离不开从事理论研究的学术队伍。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所以大国关系（中美、中欧、中日关系等）成为大陆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相对而言，两岸关系在大陆涉外关系中的位置和比重就没有那么明显，大陆学界在两岸关系研究领域未能像大国关系研究领域那样聚集一大批国内顶尖学者。然而，台湾岛内的情况与此不同，因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加之台湾的体量较小，两岸关系与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关系是台湾对外关系的两大支柱，在两岸关系研究领域汇集了数量不菲的一流学者^{[2]7}。

第三，大陆涉台研究力量分布状态不尽合理。总体来看，涉台研究主要有三大板块，即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舆情研究。目前，大陆涉台研究队伍主要集中于后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的专家和学者相对较少。然而，对台话语主导权的建构更多的是与第一个板块研究相关联。过分重视舆情分析和对策研究而忽视基础性的理论研究，是大陆涉台研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不仅使分布于三大板块的研究力量极不平衡，而且容易导致重复性研究和资源浪费。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以下两点尤其突出：一是研究者在选择研究方向时有失偏颇。许多高校研究者并未结合自身学科背景和学术优势，就两岸关系中的基础性问题或者中长期战略发展问题开展研究，而是纷纷投身于本来研究队伍就已经呈现饱和状态的舆情研究，使得舆情研究队伍更加膨胀。二是缺乏相关部门的引导。大陆相关部门召集的会议更多的是讨论舆情性、对策性议题，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指挥棒”作用，促使大陆涉台研究界过分跟踪和分析现实热点问题，不重视研究基础性、长远性、根本性和战略性问题。

第四，大陆没有足够重视三种不同对台话语之间良性转化的重要性。首先，大陆有些学者不能正确区分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的不同，甚至将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混为一谈，有时将政策话语予以简单的注释和平移，就将其视为学术话语。事实上，尽管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话语。我们只有对政策话语进行学术加工和处理，才能将其转换为学术话语。其次，大众话语与学术话语、政策话语之间存在着不能及时转化的问题。譬如，有的期刊有时将出席会议的领导的讲话稿在未经规范性处理和方法论加工的情况下，直接当作学术论文予以发表。这折射出有的期刊及其编辑对大众话语和学术话语的混淆。

二、大陆建构对台话语主导权的意义和条件

（一）建构大陆对台话语主导权的必要性

大陆的对台话语现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积极推动大陆对台话语主导权建构具有突出的必要性：

第一，这是大陆综合实力不断壮大的内在要求。大陆之所以要追求对台话语主导权的建构，根本原因是大陆综合实力的壮大以及由此带来的两岸力量对比失衡。大陆不仅要形塑未来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而且要引领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这既是大陆崛起的历史必然，也是新时代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断进行变革和调整。当前，大陆的对台话语权现状与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新时代历史方位及未来目标不符，需要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以适应大陆综合实力壮大的需要。否则，长期的话语权滞后不仅容易使大陆在两岸关系

中陷于被动,而且不利于我们主导和引领两岸关系。因此,尽快建构对台话语主导权并占据理论制高点,应成为大陆学界今后一段时期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

第二,这是增强大陆软实力和改变、引导台湾民意的重要举措。其一,话语权建构是增强大陆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大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乃至未来统一,不仅要依靠硬实力,而且要依靠软实力。建构一套能够被台湾民众接受的话语体系,是促进台湾民众认同一个中国的重要举措。这不仅能减少统一阻力,而且能减少统一后的治理成本。当前,大陆在硬实力方面的成就可圈可点,但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所以,积极建构“对我有利”的对台话语体系,掌控两岸关系话语主导权,是增强大陆对台软实力的重要选择。其二,这是改变和引导台湾民意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应认识到,话语权对于改变民意、引导民意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未能很好地从理论上去阐释和回答两岸关系发展在当前遇到的一些瓶颈问题和台湾民众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致使大陆涉台话语对台湾民众产生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所以,推动话语权建设、增强软实力,以期增强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力,改变台湾民意结构,不失为争取台湾民心工作的一项重要思路。

第三,这是防止大陆陷入台湾“话语陷阱”的需要。大陆只有建构起对台话语主导权,才能在处理涉台事务时更加主动自如。譬如,一直以来,台湾的“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及相关论述在大陆流传甚广,许多大陆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使用。然而,“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及相关论述其实是暗藏“独台”祸心、企图用“治权”架空“主权”、掏空“实体一中”的表述。这些论述表面上承认两岸主权并未分裂,仅坚持所谓的“治权”分裂,但其归为“治权”的诸多权力(台湾地区“行政院”下辖的“国防部”“外交部”等机构的权力)在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均属于“主权利”,甚至“治权”一词都找不到准确的英文对应概念。因此可以说,“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及相关论述并非严谨的学术理论和观点,而是李登辉当年在“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框架下维护“中华民国主体性”的理论基石,是一种典型的维持“事实独立”的理论,其目的是从学理的角度“曲线独台”。倘若大陆学者看不清这一点,继续沿用“主权-治权”分析框架,并引用台湾学者在该框架下所做的分析和论断,那么就很容易掉进台湾方面的话语陷阱,这非常不利于我们维护一个中国框架。因此,大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分析概念和理论体系,才能实现“以我为主”“对我有利”。

(二) 大陆基本具备建构对台话语主导权所需条件

大陆综合实力的壮大为建构对台话语主导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大陆涉台研究队伍的成长为建构对台话语主导权提供了人才基础。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日益成为大陆涉台研究的中坚力量。从当前大陆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单位中从事涉台研究的青年学者来看,绝大多数具有博士学位,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无论理论知识抑或方法论基础均堪称训练有素。这一代中青年学者吃苦耐劳、敢于打拼,具有开拓创新的科研精神和学术品格。这样有创造力、生命力的学术群体是大陆建构对台话语主导权的重要人才保障。

第二,大陆官方的充足科研经费为建构对台话语主导权提供了资金支撑。科学研究离不开高额科研经费的保障。相对于过去,最近10年大陆对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和使用有了很大的增长。当前,大陆的社会科学基金非常充足,可以通过连续设置几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来推动这一研究。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横向政府委托项目、部委专项委托项目、单位内部基金项目等一起推动大陆对台话语权的建构。

第三,大陆官方正在推动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工程为建构大陆对台话语主导权提供了契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此外,中央有关部门专门发文倡导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以便从软实力上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这为大陆积极建构对台话语主导权提供了机遇,大陆

涉台研究界应顺势而为。

三、大陆建构对台话语主导权的思路

笔者认为，未来大陆建构对台话语主导权的基本思路主要如下：

（一）在学术话语方面，着力建构大陆自己的概念、理论、分析框架和方法论体系

在逻辑层面上，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大众话语同等重要，应该给予同等重视。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学术话语建构具有更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得到学界的特别重视。学术话语代表大陆对台研究的理论水平，学术话语愈系统、合理、科学，对两岸实践就愈有解释力、预测力，话语体系就愈成熟。未来一段时期内，学术话语建构应成为大陆对台话语主导权建构的中心任务和主要目标。针对目前两岸关系研究中出现的概念复杂化现象，笔者主张，大陆应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呼吁学者建构简单明了且“对我有利”的概念体系^①。譬如，针对“台独”“独台”“华独”“柔性台独”“刚性台独”“A型台独”“B型台独”“AB型台独”等纷繁复杂而又难以把握的一系列概念，笔者建议：以后统一使用“台独”一词，不再使用上述其他概念。在此基础上，根据“台独”对两岸关系冲击的烈度（如同地震的强度），将其划分为一级“台独”、二级“台独”……六级“台独”；每一个级别的“台独”均被赋予具体的指标，与此相对应，具备哪些指标，就是哪个级别的“台独”；然后针对“台独”的不同级别，设置对应的打击力度和惩罚措施。该方案的特点是将“台独”划分简单化、具体化、指标化、明晰化。这不仅有利于清晰界定“台独”，而且有助于精准打击和惩罚“台独”。当然，笔者在此提出的仅仅是一个理论设计，其可行与否并非只是取决于设计本身，关键还要看其他方面更为复杂的因素。譬如，这一设计会使双方失去在“台独”问题上的模糊空间，减少处理问题的弹性，需要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全盘考虑。

（二）在政策话语方面，要通过修正旧论述来建构新论述

过去的两岸关系论述多是两岸对等、平衡思维下的产物，现在须重新审视，并做出与时俱进的修正。譬如，“新三句”^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适应了当时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但是20余年来，两岸关系的具体情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应适时地对“新三句”加以调整和发展，以适应未来国家统一的需要，否则会强化台湾方面的“对等感”，在无形中助长台湾方面的“主体意识”，给未来的国家统一带来不利影响。我们需要意识到，“新三句”毕竟是阶段性表述，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不宜长久使用。笔者建议：大陆应在“新三句”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一个中国”政策表述进行调整，具体表述可以升级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中央政府。”该表述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国家统一大业：其一，此处“代表中国的唯一中央政府”的新表述，较之前“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时代意涵。其二，大陆给台湾预留适度的政治空间是必要的，但也必须理直气壮地声称己方政权为代表中国的唯一中央政府。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国两府”，更好地维护“一个中国”。其三，新表述向“旧三句”作了适度回归，兼顾了“新三句”和“旧三

^①学术研究固然离不开概念，但概念多了，也有其问题：一是对一个初入门的研究者来说，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困扰，这不利于研究问题；二是容易被有的台湾学者“偷换”或“嫁接”，甚至用来“浑水摸鱼”。

^②“新三句”是2000年7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会见亲民党及联合报新闻访问团时正式提出的，其表述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裂”。“新三句”是相对于“旧三句”而言的，后者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0世纪90年代，因“旧三句”过分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于中国，不仅引起了台湾方面的抵触，而且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这不利于巩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框架，故大陆将其调整为“新三句”。“新三句”强调两岸对等的意味有所增强，这在一段时间内有利于引导台湾方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句”之间的平衡^{[2] 50-52}。此类问题均值得大陆审视和思考。正如有学者指出：“随着两岸情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势必需要作根本性调整，需要有新思维，需要有新办法。一个强大中国与过去一个弱勢的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应该是完全不同的，这不仅仅是方法问题，还涉及理想与途径……一系列问题。”^[3]

（三）在大众话语方面，要着力打造和使用涵盖两岸元素的论述

大众话语是政策话语的延伸和外化，它体现着政策话语的创新性与合理性。话语主导权的打造不是对话语领域的单向占领，而是要依靠台湾民众对大陆话语体系的自觉认同。在新时代背景下，只有兼顾两岸利益的包容性话语才容易被台湾民众接受，所以大陆要打造独具两岸特色、两岸风格、两岸元素的新型大众话语。譬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两岸关系向前发展过程中创新发展了一系列富含两岸元素的大众话语，如“共圆中国梦”“两岸一家亲”“两岸命运共同体”等。这些通俗易懂的话语涵盖了两岸共同利益，契合两岸共同发展的愿景，巧妙表达了大陆发展两岸关系的愿望和主张。这些概念很难被台湾民众所否定或抵制，很容易引起两岸民众共鸣。所以，建构对话语不要一味地批评对方，不能将对台话语搞成大陆单方面的说辞，否则就会失去台湾民心 and 话语自身的生命力。另外，大众话语的叙述方式要生活化和通俗化，尽可能客观中性，以让台湾民众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譬如，可以通过电影、电视、小说、辩论等大众传播形式使台湾民众在潜移默化之中认同大陆的价值观，而不要以标语式、口号式、号召性的叙述方式强行灌输，否则不仅无助于增进两岸联结，还会在无形中拉大台湾民众与大陆的距离。

（四）在话语融合方面，要恰当处理学术话语、政策话语与大众话语三者的关系

学术话语指通过运用概念、判断、推理凝练而成的由学术概念、范畴和语言组成的理性话语。政策话语是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指导性、行动性和准则性话语。大众话语是指根据政策话语，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特点和大众语言风格而形成的既反映理论话语内容，又符合大众语言特点、风格和习惯的通俗性话语^{[4] ①}。一方面，大众话语不需要晦涩难懂、高度抽象的话语表达，而需要立足两岸关系实际，以生活化的朴实语言表达大陆的立场、观点和主张，与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也离不开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否则大众话语会失去支撑基础。同时，政策话语也要有学术话语的支撑，只有如此，政策话语才会更加严谨和周延。以上三种话语各有其特点，但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要真正建立起对台话语主导权，就必须正确处理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打通三者的壁垒，使它们融为一体。

（五）要有意识地打造一批进行理论创新和话语建设的研究团队

话语建设最为根本的动力是理论创新，而进行理论创新离不开优秀的人才队伍。如何在过去舆情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理论创新和基础研究，是今后大陆涉台研究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首先，大陆官方和学界要意识到话语建设对推进两岸关系发展乃至未来统一的重要性，只有明确这点才能朝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其次，大陆学界不能只着眼于眼前的热点现实问题，而忽视未来国家统一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涉台主管部门要发挥积极引导和协调作用，有意识地引导涉台研究界向这方面前进，为优化现有研究结构创造条件。再次，大陆相关部门应积极引导一部分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投身于该领域的研究，有意识地打造和凝聚一批话语建设研究团队。这些团队除了要熟悉两岸关系实务之外，还应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基础。

（六）要敢于同“台独”思潮和活动作斗争

① 本文在其他几处地方对该文研究思路也有所借鉴，在此对曾令辉、陈敏二位学者深表感谢。

话语主导权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经过不断斗争、反复博弈而确立的。如果大陆不去占领对台话语的阵地，那么台湾的一些错误思想、理论和观点就会去占领，大陆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去纠正台湾民众对大陆政治的偏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与各种“台独”思潮进行坚决斗争，否则就无法真正建立大陆对台话语主导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过于注重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争取台湾民心的重要性，致使我们在执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策时过于强调团结性一面，而忽视斗争性的一面，进而对台湾当局的某些言行过于忍让迁就。今后对于那些逾越两岸政策“雷池”的言行，要敢于批判和斗争，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但在非原则问题上可以协商讨论。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要敢于同“台独”思潮作斗争，并非意味着要完全排斥台湾的现有话语，而应该进行梳理和辨析：哪些话语可以继续两岸互动中使用，哪些必须坚决予以抛弃，哪些可以改造后保留。因此，我们应把对台话语的改造和转换视为对台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完全另立一套自说自话的封闭的话语体系。这一点与笔者主张大陆建构话语体系时要注意打造含有两岸元素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七）要坚持以解决问题为指向，增强话语对两岸分歧的解释力

尽管话语主导权的建构离不开概念、理论和论述，但概念、理论和论述的建构不能面壁构思、抽象杜撰，而应来自生动的两岸关系实践；同时，对台话语只有回归两岸关系实践，指导解决两岸关系中的现实问题，才能彰显其价值和意义。如果大陆建构的对台话语不能有效地回应、解释和解决当今两岸关系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那么台湾方面就会给出他们的解答，这势必会影响大陆在两岸关系中的话语地位。因此，只有增强对台话语的解释力，才能更好地与“台独”思潮作斗争。这就要求建构对台话语的研究者必须深入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洞察两岸关系的复杂性、特殊性，以获取对两岸关系最丰富、最生动的感悟，达到对两岸关系最真实的认识，从而为对台话语权的建构提供基础性素材。如果仅仅从红头文件、领导人讲话、制度文本等去提炼解释话语，那是远远不够的。另外，我们应注重和加强对两岸关系的实证研究，学会用经验事实和调研数据说话，善于从经验事实和调研数据中凝练出对两岸关系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判断和理论，进而形成话语体系。

（八）要强化话语的利益基础，系统稳妥地推进话语建构

话语权的建构必须与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相挂钩，必须在利益联结的基础上推进话语权建设，否则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也就无从影响他们。为此，我们应该让台湾民众参与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来，让他们分享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遇和红利，这样有助于增进他们的一个中国认同。当然，大陆对台话语主导权的建构和确立是一项渐进的系统工程，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切不可急躁冒进。

参考文献：

- [1] 张亚中. 两岸主权共享与特殊关系 [J]. 中国评论, 2012 (2) : 4.
- [2] 王英津. 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研究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 50-52.
- [3] 章念驰. 站在历史转折点的两岸关系 [J]. 中国评论, 2017 (12) : 4-5.
- [4] 曾令辉, 陈敏.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 (4) : 5-15+159.

蔡英文主政下的两岸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

刘佳雁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研究所, 北京 100083)

摘要: 蔡英文当局拒不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变本加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全方位地推行“实质台独”路线, 蚕食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制造两岸敌意和对抗。两岸关系虽总体保持基本稳定, 但面临的形势严峻复杂。这不仅表现为两岸关系面临“台独”分裂势力制造“台独”冒险的现实威胁, 也面临美国等国际势力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的干扰。蔡英文当局尽管不断挑战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但不能撼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 也不能改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两岸关系格局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重大的趋势性变化。从两岸关系发展的规律来看, 决定未来两岸关系基本格局和趋势的根本因素是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陆一方面要冷静客观地看待蔡英文主政两年多来两岸关系的现状, 更应以此为基础科学地判断未来两岸关系面临的风险和发展趋势, 以更好地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

关键词: 两岸关系; 两岸政策; 祖国统一; 民进党; 蔡英文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8) 04-0012-14

在 2016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机构换届选举中, 民进党不仅再度取得“执政权”, 而且首次实现了全面“执政”的目标。蔡英文当局上台两年多来, 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实施“实质台独”路线。这直接导致两岸制度化沟通和协商谈判机制中断, 两岸关系良好气氛逆转, 两岸诸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无法持续推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遭遇严重冲击, 两岸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与风险, 未来形势复杂严峻。有关蔡英文主政以来两岸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涉台研究学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 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蔡英文当局“维持现状”政策及其本质; 二是民进党重新上台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发展的现状及其特点、危害; 三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美台实质关系的走向。内容上, 学者对蔡英文两岸政策的内涵和本质、“台独”活动和“台独”势力的新特点及未来风险和危害、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及打“台湾牌”的动因等, 都进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8.04.002

作者简介: 刘佳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台湾研究》主编,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推进两岸民间交流与社会融合研究”(16JJDGAT001)

引用格式: 刘佳雁. 蔡英文主政下的两岸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4): 12-25.

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但是，这些成果存在明显的不足：涉及两岸关系基本格局的覆盖面还不全面；一些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还不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对两岸关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缺乏一定深度，尤其是对两岸关系发展趋势及大陆对两岸关系主导权的研究较少。本文将对民进党重新上台以来两岸关系的现状和特点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并就蔡英文主政时期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评估。

一、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上台以来的两岸关系

众所周知，蔡英文在竞选期间就确立了以“维持现状”为论述核心的两岸政策主轴，因此其上台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两岸关系现状。尽管在大陆方面的持续压力下，蔡英文的“520 就职演说”对民进党既有的两岸政策做出了某种调整，但并未放弃“台独”立场，始终回避和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导致两岸政治关系持续处于一种“冷和对抗”状态。

（一）大陆方面综合施策妥善应对民进党重新上台，保证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两岸交流继续平稳发展

早在 2014 年底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出炉后，大陆方面即已预判到，“台独”政党民进党赢得 2016 年“大选”、再度上台“执政”的可能性相当大，台湾政局将发生翻转性的重大变化。为降低台湾政局剧变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冲击，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大陆方面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将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列为第一要务，同时在台湾政局生变后又不断创新思维，提出并逐渐完善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在逆境中持续、深入地推进两岸关系发展，开创了对台工作新局面。

第一，大陆方面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对蔡英文当局的压力，有效约束了民进党“台独”势力的冒进活动，巩固了“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确保了台海局势的基本稳定。

2015 年以来，面对日益复杂的两岸关系形势，大陆方面多次明确表达了坚持“九二共识”的底线立场。2015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看望参加十二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和发表讲话，向台湾岛内各界发出了强烈的政治信号：不论岛内政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陆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的立场绝不会有丝毫的松动，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针政策也决不会改变^[1]。5 月 4 日，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提出：否认“九二共识”，挑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基础，搞“一边一国”“一中一台”就会损害民族、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动摇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石，就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能有发展^[2]。大陆方面把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摆在更为突出的地位，是在总结过去 20 年两岸关系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深刻结论，体现了大陆方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的珍惜及对两岸关系未来稳定发展的期待。11 月 7 日，习近平与马英九会面，双方共同确认了“九二共识”的定锚作用。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它表明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也不是“一中一台”。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主权这一原则问题上，我们的意志坚如磐石，态度始终如一^[3]。

2016 年 1 月 16 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揭晓，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在外界的意料中胜选，同时民进党在“立委”选举中首次赢得过半的席次，从而实现全面“执政”。鉴于民进党上台后竭力推行“台独”路线，8 年在野期间一直扮演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光彩角色，且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是理念型“台独”者，两岸关系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两岸关系发展的新情况新形势，坚持底线思维，以明确的态度为两岸关系定方向、划

红线，维护了台海局势的稳定，维护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人大上海团审议时指出：“我们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我们将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两岸双方就有了共同政治基础，就可以保持良性互动……我们将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让国家分裂的历史重演。”^[4]11月，习近平在会见来访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时再次强调：“‘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台湾政局变化改变不了‘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和核心意涵。承认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关系认定两岸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不可能有丝毫松动。”^[5]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度对外传达了大陆方面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的强烈信号，阐明了“绝不允许六个任何”的反对“台独”的坚定决心^[6]。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宣示为新形势下对台工作定下了基调，指明了努力方向，同时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表明了大陆方面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绝不容忍什么的鲜明态度，划出了清晰底线，迫使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不仅不敢直接挑战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底线，而且反复承诺“维持现状”。

另一方面，针对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破坏两岸共同政治基础，大陆方面果断地采取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等一系列措施，充分展现出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的决心、意志和能力，维护了两岸关系的基本稳定。一是政治上坚决停摆了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沟通和商谈机制，加强同台湾岛内相关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交流互动，壮大反对“台独”、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和声势；积极开展舆论斗争，揭露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破坏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和现状的行径。二是军事上加强对台军事斗争的准备，实现机舰“绕岛巡航”常态化，并有针对性地加强海军航母编队远海战备训练，举行首次最大规模的南海阅兵以及进行东南沿海实弹演习，回击蔡英文当局“台独”动作和赖清德的“台独”言论。三是外交上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对外活动问题。经与大陆方面协商，相关国际组织拒绝了台湾当局要求继续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和国际刑警组织的申请，中止了台湾当局继续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资格。台湾当局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代表的规模被压缩、层级被降低。2016年以来，大陆方面先后与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复交，与台湾当局在中美洲的最重要“邦交国”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建交。截至2018年5月，台湾当局的“邦交国”被压缩至19个。在大陆方面的推动下，阿联酋、约旦、厄瓜多尔和巴林等国严格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要求台湾当局驻在机构更名；斐济直接裁撤了台湾当局的代表处，尼日利亚勒令台湾当局代表处摘牌和迁址减员。大陆方面在外交上的积极作为巩固了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框架，粉碎了蔡英文当局企图回避一个中国原则、绕开两岸协商来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图谋。

第二，大陆方面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和人员往来，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稳步发展。

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对两岸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带来了严重影响和冲击，但大陆方面在维护两岸关系稳定的同时，本着“两岸一家亲”“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其一，两岸经济合作水平继续提升。一是两岸贸易经历2016年短暂下滑后在2017年获得快速增长。2016年两岸贸易受全球经济及两岸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持续下滑，全年贸易额为1796亿美

元,同比下降4.5%。在2017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大陆经济蓬勃发展的带动下,两岸贸易快速增长。据大陆海关统计,2017年1—11月,两岸贸易额为1793亿美元,同比增幅达11.7%,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394.1亿美元,同比增长8.1%,自台湾进口13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大陆仍是台湾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两岸关系虽在民进党上台后面临挑战,但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持续回升。2017年前11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的出口依存度回升至40.8%,对大陆(含香港)的进口依存度也持续回升。二是台商投资大陆继续保持恢复增长态势。2016年,台商投资大陆出现增长,全年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3517个,同比上升18.7%,实际使用台资金额19.6亿美元,同比上升27.7%。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前11月,台商实际对大陆投资44.3亿美元。此外,陆资赴台虽受到民进党当局限制的影响而减少,但金额与项目规模扩大。自2009年6月台湾开放陆资入台至2017年11月,陆资累计投资项目约1076件,金额19.48亿美元。三是大陆方面充分利用既有平台机制,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推动两岸民间经贸交流与合作。2016年9月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修正案,这有利于为台湾同胞投资兴业创造更加便利、公平的法治环境。各地各部门积极支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为在大陆台商搭建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平台,坚定了台商、台企在大陆扎根发展的信心。

其二,两岸社会联系愈趋密切。2016年5月以来,受两岸政治僵局影响和“辽宁陆客团火烧车”事件冲击,陆客赴台人数出现明显下滑。2016年大陆居民赴台361万人次,同比减少14.4%,为过去8年来首次出现下降;2017年1—11月同比继续减少24.51%,为248.5万人次。但同时期台湾居民来大陆呈现增长态势,分别达到573万人次和578万人次。总的来看,大陆方面始终以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发展两岸关系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增加了对台湾同胞的吸引力,两岸人员往来和社会联系更加频繁和紧密。大陆积极开展体验式交流,设立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53家,吸引1000多家台资企业和团队入驻,为台湾年轻人来大陆创业、就业和工作提供方便;充分发挥两岸民间交流机制的作用,两岸工会、青年、妇女、体育、卫生、宗教、宗亲和民间信仰等各领域、各界别的交流持续增多。

其三,与台湾岛内在野势力的交流更贴近台湾民意,契合两岸民众需求。2016年以来国共交流平台互动新形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两岸地方县市的交流合作与互动引领国共两党的交流更加贴近台湾民意、契合两岸民众的需求。在这一机制下,大陆方面继续保持了与国民党的良性互动,相继邀请洪秀柱、郝龙斌、林政则等国民党高层来访,巩固了双方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明确表示“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2016年9月,大陆方面主动邀请国民党占多数的蓝营“执政”8县市来访,并宣布了与8县市交流的具体措施,推动两岸地方县市的交流与合作。此外,2017年大陆方面邀请新党主席郁慕明率团来访,达成建立完善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加强服务两岸同胞等共识,并声援新党青年干部被搜查事件。在台北市长柯文哲就两岸关系立场的积极表态下,大陆方面续办“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维系与具有深绿背景的柯文哲之间的沟通合作。正因此,民进党重新上台后两岸政治关系虽然陷入僵局,但两岸交流交往仍保持平稳发展。这表明,即便受到民进党当局的干扰,国共平台与两岸地方民间交流也能担负起为台湾同胞谋商机、为台湾青年谋出路、为两岸产业搭桥铺路的部分重任。

(二)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推行“实质台独”路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速度和进程放缓,对抗风险上升

身兼民进党主席、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蔡英文是一个理念型的“台独主义者”。蔡英文上台以来,吸取了陈水扁时期搞“法理台独”、公开冲撞一个中国原则的教训,以“维持现状”为幌子,拒不

放弃“台独”立场，“不答卷、不屈服”姿态强硬，并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教育、法律、涉外、军事等方面全方位推进以“脱中”为目标的“实质台独”路线，竭力在台湾岛内创造“台独”的条件，两岸对抗性明显上升。

第一，蔡英文当局两岸政策立场强硬，丝毫没有调整两岸政策立场的善意和行动。

蔡英文“520就职演说”延续了其上台前即已确立的“维持现状”基调，虽不再称呼大陆为“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以“对岸”“两岸”等字眼描述两岸关系，提出“1992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并表示“尊重这个历史事实”，声称“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该讲话内容未将两岸关系单独列章，而是放在“区域的和平稳定发展及两岸关系”的结尾部分。蔡英文既刻意回避“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又刻意将两岸关系从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分离出来，将之纳入亚太区域体系之中，赤裸裸地将两岸关系“两国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导致两岸关系快速冷却，出现“冷和”状态。

面对两岸关系迟迟无法打开僵局、“现状”难以维系的情况，蔡英文的两岸立场不仅没有丝毫调整，反而开始趋于强硬。2016年7月，蔡英文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称“要求台湾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aiwan）违反民意去接受对方设的期限，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声称“对于在台湾的人而言，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主‘国家’”^[7]，公开表明了拒绝“九二共识”的态度。以此为标志，蔡英文当局开始完全不提“九二共识”，声称“与其说我没有完成一个答卷，不如说我们双方都面临一个新的问卷”^[8]。她抛出“新情势、新问卷、新模式”的论述，称“情势已经改变，是一个大家共同维持的局面”；“面对新的问卷，不是任何人可以单独解答的，是大家要共同来解答”^[9]。蔡英文两度接受网络节目采访时虽然强调“不会暴走、也不会僵住、也不会走回国民党威权时代老死不相往来的路”，但也表示“不会在压力底下去屈服，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11]；声称“事实就是1992年发生了这个会谈，但会谈之后各说各话”“就只有这两件事”；“事涉主权问题，不能轻易让步”^[12]。蔡英文的一系列重要两岸谈话或政策宣示，虽然“没有走回对抗的老路”，但绵里藏针、软中带硬，不但丝毫没有放弃其固有的政治立场，完全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根本没有完成答卷的意愿和想法，而且以所谓“民意”“民主”原则进行对抗，期望大陆方面松动立场、作出妥协。由此，两岸关系持续处在敌对与僵持之中。

第二，蔡英文当局全面推进“实质台独”，加剧两岸敌意，两岸对抗风险持续上升。

李登辉曾称，能够以台湾之名存在，才是唯一的重点；主张“台独”会引起美、中等国反制，台湾现在所要做的只是从“宪政法律”、文化教育以及媒体宣传等领域循序渐进地构建“台湾国家认同”，还台湾一个“实质国家”的地位^[13]。蔡英文是李登辉提拔与重用的政治明星，是李登辉“两国论”的主要炮制者。她既深得李登辉的“台独”分裂主义理念的真传，又是其忠实的继承者与捍卫者。蔡英文上台以来，不断利用行政力量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全方位推动“去中国化”的“实质台独”路线，形塑台湾“主权独立国家”地位。

其一，加紧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去除台湾社会带有“中国政治意识”的象征和符号。蔡英文上台后的“柔性台独”不再限于简单的“去中国化”或“去中华民国化”，而是从政治体制和法律层面落实“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强化绿营标记，营造绿营长期“执政”的社会土壤和制度条件。一是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和“不当党产处分条例”铲除承载“中国”图腾的国民党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政治符号。其终极目标就是要摧毁国民党在“中华民国宪法”下代表“中国体制”的核心价值，彻底瓦解其代表一中核心价值的基础。为此，民进党一上台就迅速通过所谓“不当党产条

例”，全面清剿国民党党产，包括冻结国民党银行账户，认定国民党党营事业为不当党产，认定“救国团”“妇联会”等机构团体为国民党附随组织并对其财产进行清查罚没；利用“转型正义条例”，以开放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为名，纵容“立法院党团”和“文化部”推动“废除国父遗像”“中正纪念馆转型”等议案，抹黑国民党过去的威权统治，从精神上解构国民党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同时放任激进“台独”分子“斩首”蒋介石头像、“台湾民政府”侮辱外省老兵和泼污蒋介石灵柩，挑起与煽动台湾地区民众对“中国”“中国人”的仇恨与敌意。二是加紧向公权力部门和地方基层组织进行“台独”意识渗透。蔡英文当局刻意提名主张“两国论”的许宗力和许志雄分别为“司法院长”和“大法官”，聘请“独派”代表人物为“资政”“国策顾问”，任命“台独”理念极强的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长”，并纵容他们在“立法院”公开鼓吹“台独”主张；修改“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并拟修改“地方制度法”，推动国民党长期占据优势的农田水利会长改为“官派”，并拟废除乡镇市长民选。三是以维护“台湾安全”为名整肃台湾岛内统一力量，制造“绿色恐怖”。放任“立法院”制定“政党法”、推动修正“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等，限制打压“中华统一促进党”“爱国四海同心会”等组织的游行抗争活动，借“共谍案”搜索新党骨干并打击新党。

其二，推动“公投法”修正，为“法理台独”清除障碍。2016年民进党取得“立法院”多数，修改“公投法”成为其优先目标。5月，由“时代力量”和民进党部分“立委”主导的、以大幅降低“公投门槛”和投票年龄，增列“领土变更案”适用公投事项为主要内容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初审获通过。12月，该案进入“院会”审查，“领土变更案复决”回归“宪法增修条文”规定，“两岸政治协商协议公投”被删除。这一做法迅速遭到激进“台独”势力的强烈反弹，他们通过举办“公投法补正民意论坛”和筹组“独派协议平台”来向蔡英文施压。为化解来自深绿的强大压力，2017年5月10日，蔡英文在“中常会”表示，承诺年底之前完成。12月12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公投法修正案”。蔡英文当局虽将“领土变更”“宪法改造”“新宪复决”“两岸政治协议”等敏感议题排除，但大幅降低公投成案与通过门槛并简化相关程序，为各种变相的“统独公投”特别是“台独修宪”打开了缺口。

其三，全力落实与推进“经济远中脱中”的战略，削弱两岸经济连接，维持台湾在经济层面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蔡英文宣称要打造、催生“台湾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强化经济的活力与自主性，加强和全球及区域的联结，积极参与多边经济合作及自由贸易谈判”，“推动新南向政策，提升对外经济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别以往过于依赖单一市场的现象”^[14]。为此，蔡英文当局刻意冷处理两岸经济交流，不仅搁置了“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进度，而且以“两岸协商业量减少”为名，裁撤了2011年成立的隶属于“经济部”的ECFA小组。同时，蔡英文当局加强防控陆资入岛，不仅拒绝开放新的项目，而且不批准清华紫光对台湾岛内半导体产业并购案。蔡英文当局在台湾岛内以所谓“创新、就业、分配”为“经济发展新模式”主轴，力图摆脱对大陆依赖性较强的以代工生产为主的“旧模式”，强化台湾经济的“自主性”；重点发展与大陆关联度较低的“五大创新产业”，并意图通过整合岛内产业来对抗“红色供应链”；加强与美日经济结盟，集中资源力推“新南向政策”，企图通过转移市场以降低对大陆的经济依赖。

其四，在文教社会领域深入推进“去中国化”。蔡英文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政教社会领域的“去中国化”活动，并将其推向更高、更广、更深入的层次。一是任命激进“台独”分子执掌文化、教育部门，阻止蓝营背景的管中闵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二是迅速废止课纲微调案，抛出“十二年国教社会领域课程纲要草案”，减少语文教学中的文言文比例；将“中国史”课程予以撤销且并入“东亚史”，把“台湾史”的“重点放在台湾最近五百年的发展脉络”，建构脱离“中华史观”“以台

湾为主体的下一代史观”及“原民史观”。三是推动“去孙化”，取消遥祭南京中山陵活动，淡化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四是推动官方语言多元化，裁撤“蒙藏委员会”，并以转型正义为名，全面推动“去蒋化”。五是取消遥祭黄帝陵仪典，持续推动“去孔子化”，停办抗战80周年纪念展，纵容丑化郑成功行为，降低郑成功祭典规格。六是丑化“中华文化”，彰显台湾文化。比如，放任“台独”分子“斩首”台北故宫南院12兽首；将“中华文化总会”的工作重点定位为台湾文化，推动制订淡化中华文化的“文化基本法”等。甚至有人提出要將台湾时区从“GMT+8”改为“GMT+9”，“禁止中国五星红旗在台湾公开悬挂、展示、陈列出现”^[15]。

其五，利用法律手段限制与阻挠两岸人民正常的交流与交往。一是严格规范高阶人员前往大陆。民进党当局通过“两岸关系人民条例”修正案及“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修正条文，对退役中將以上军职人员、曾任“情报机关”的主管、曾任机要机关政务副主管以上人员赴大陆，规定3~15年甚至更长的管制时间；规定对“文武职高阶离退人员赴大陆参加政治活动，且有妨害‘国家尊严’行为，最重者取消退休俸，或最重罚款新台币300万元”，泄露“机密”者则将加重处罚，最重可处10年徒刑。二是“陆委会”采取多项规定、政策措施限制两岸正常交流。目前已出台的管制与限制措施包括：限制大陆对台交流的层级与对象，如对大陆各省级台办、智库学者、具有党政身份人士赴台参访将从严审核；以申请出境手续等软性方式抵制泛蓝8个县市团组赴大陆参访交流；阻止台籍教师赴大陆大专院校任职等。三是“农委会”出台相关规定限制渔业团体与大陆洽谈两岸渔业合作的相关民间协议或意向，要求依法采取事前申请许可。

第三，蔡英文当局与美日战略互信增强，实质关系有所突破，美日介入台湾事务的可能性明显增强。

为走出国际空间困境，蔡英文当局上台以来抓住美日在亚太围堵中国的战略机会，极力迎合美日对华战略，推行“依美联日抗中”战略，美日干预台湾事务呈现出新态势。其一，台湾地区和美国实质关系出现升级态势。在蔡英文当局的游说和美国国会亲台势力的频繁施压下，台湾地区 and 美国的实质关系出现了明显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高层互动升级。2016年5月以来，美行政、立法部门及主要政党与台湾互动规模、层级显著提升。特别是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打破了1979年以来美候任总统不与台湾地区领导人公开通话的惯例。为继续在战略上绑定美国，蔡英文当局还试图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谋求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美国高层不断表态“绝不会牺牲台湾以换取与中国关系改善”^[16]。2017年底，特朗普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被列为美国优先要务的“军事与安全”行动篇，指出“维持与台湾强而有力的关系”，“依‘与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合理的防务需求”^[17]。蔡英文当局极力响应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声称台湾“自然是印太战略中的相关者”^[18]。双方强化战略捆绑不仅有利于美国打“台湾牌”，也扩大了双方关系升级的空间。二是军事安全合作增多。蔡英文当局将军事安全合作的突破作为强化与美国关系的着力点，多次向美国官员、学者重申加强台湾自主防卫能力的决心，表示将继续扩大预算规模。在蔡英文当局的积极推动下，特朗普政府首轮对台军售即纳入台湾10余年来持续寻购的高速反辐射导弹等攻击性武器；首次允许“台军”一个排赴夏威夷与美海军陆战队协同训练，首度允许“台军”参加“反潜猎杀操演”和“黑镖”反无人机演习；宣布台驻美F-16战斗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从路克基地转至土桑机场。三是美国国会推动涉台敏感法案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12月12日，特朗普签署了“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首次将对台“六项保证”写入法律文件，提出“考虑重新建立美台海军舰艇互访的适当性和可行性”“常态化地对台转移防务装备和服务”“邀请台参与美‘红旗’军演”等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内容。2018年3月16日，继美

国众议院、参议院全票通过后，特朗普签署“与台湾交往法”并正式生效，全面提升与台湾地区交往范围和层级。美国行政、立法加大“以台制华”力度，推动美国的台海政策进一步向台湾倾斜。其二，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明显提升。蔡英文具有浓厚的“亲日情结”，台湾当局与日本在共同对付大陆上具有共同战略利益。蔡英文上台后即任命“亲日派”谢长廷、邱义仁分别为“驻日代表”和“亚东关系协会”会长，公开淡化双方历史、海洋权益争议，并在“立法院”成立由“院长”苏嘉全任会长的“议员交流联谊会”，改变了马英九时期对日关系冷淡的态势，台湾当局与日本的实质关系迅速提升。一是日本对台湾当局的政策主动性明显加强，频频挑战一中政策。安倍晋三多次强调“台湾是日本极为重要的伙伴和值得珍惜的友人”，将对台政策作为对华战略的一张牌。2016年5月，日本派出史上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参加蔡英文的“就职典礼”；将日本对台交流机构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8月，台湾“立法院”正、副院长首次一同访日；2017年安倍晋三派遣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公开访台，打破了1972年以来双方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二是经济社会交往层级提升，关系更加紧密。日本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台湾是日本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经济往来本就密切。为“联日制陆”，蔡英文上台后重视加强对日本的经济联结，不仅公开表示争取加入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第二轮谈判，还以“5+2 产业创新计划”和“新南向政策”为支点，推动与日本的产业对接与合作。双方还通过经贸会议和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机制，签署了“关务合作及互助协定”“文化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及“海难搜索救助合作备忘录”，强化经贸、文化及人道救援等领域的实质合作。2017年，“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正式启用“日本文化中心”，与台湾在日本设立的文化中心进行对口交流，扩大日本文化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

二、蔡英文主政下两岸关系未来发展趋势

两岸关系发展的内外环境自蔡英文当局上台以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在蔡英文当局“柔性实质台独”的侵蚀下面临严峻挑战，台海的和平稳定也因为“台独”势力的蠢蠢欲动和美日等外部因素的深度介入而更趋复杂，但决定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始终是大陆自身的发展。我们认识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现状、思考两岸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和基础，仍然是对两岸关系基本格局的准确判断和科学把握。

（一）未来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

蔡英文当局尽管不断挑战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但不能撼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也不能改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两岸关系格局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重大趋势性变化。

第一，“陆强台弱”的战略优势不断扩大，两岸综合实力对比更加悬殊。根据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概念，综合实力可以分为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硬实力是综合实力的基础和根本，软实力和巧实力是对硬实力的必要补充。经济实力特别是GDP是衡量硬实力的重要指标。1990年台湾和大陆GDP总量分别为1700亿美元和3878亿美元，台湾GDP为大陆GDP总量的43.8%。201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陆的GDP总量达到113847亿美元，是台湾的21.9倍；台湾的GDP总量只有5188亿美元，仅占大陆GDP总量的4.56%。有人预估大陆经济总量到2020年将是台湾的24.5倍。除GDP外，近年来大陆的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及创新能力如井喷式增长，很多方面已经大幅甩开台湾。在软实力方面，台湾在政党恶性竞争和“台独”民粹主义的破坏下，曾经引以为傲的优势迅速衰减，无论行政效率、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感召力、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社会凝聚力

和创造力、国际影响力都难以与大陆相提并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差距拉大,使台湾方面很难发挥所谓的“巧实力”。大陆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看待和解决台湾问题上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第二,两岸民间交流交往态势愈趋良性,大陆社会发展对台湾社会的正面效应日益上升。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大交流、大发展、大合作阶段。在大陆综合实力持续增强的背景下,大陆经济发展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明显上升。一是对台湾岛内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赖度超过30%,出口依赖度更超过40%。二是台湾岛内直接或间接与两岸交流利益相关的民众大幅增加。一般估计,包括台生、台商、台干在内,常住大陆的台湾同胞至少有150万^[19]。近年来,大陆台生持续增加,台籍教师的人数也在稳定增长。两岸婚姻已达38.3万对,20多万陆配在台湾生活。若加上这些人的直系亲属,台湾岛内民众经济生活与两岸交流活动紧密相关的人数可达百万。如果再将为两岸产业分工合作提供生产服务的台湾岛内民众考虑进去,总数会更大。两岸民间交流持续热络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稳定器和融合发展的推进器,加速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三是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总体好感度发生积极变化。随着两岸关系日益密切,台湾民众开始关心大陆事务,对大陆的正向观感呈现出稳步提升的趋势。《联合报》2017年11月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持正面观感者达到40%,为历年调查的新高;持负面观感者为45%,为历年最低,首次低于50%;对大陆民众持正面好感者达49%,负面恶感者为37%,正面好感比例首次超过负面恶感比例^[20]。台湾岛内有学者认为,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和人民的观感已经发生结构性改变^[21]。四是台湾民众来大陆发展的意愿显著提升。《联合报》最新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愿往大陆工作、创业、求学、定居的比例达历年新高。其中,20—29岁、30—39岁、40—49岁青壮年比例分别达到53%、47%、47%,分别比去年增加23%、9%、12%^[22]。《天下杂志》的最新调查也显示,37.5%的人愿意去大陆工作,为2010年以来新高^[23]。2018年2月28日,大陆出台的31项惠台措施对台湾社会民心产生明显冲击。据《远见杂志》的最新民调,61.6%的18—29岁年轻族群在惠台措施出台后有到大陆发展的意愿^[24]。

第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主流民意,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更加务实理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大陆经济建设成就更加了解,两岸同胞之间的利益联结更为紧密、利益基础更为牢固、利益领域更为广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逐渐改变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印象。他们对大陆情况和社会经济制度有了更加正面的认知,对两岸关系发展前途的判断趋于理性。综合最新的台湾岛内民调来看,尽管蔡英文当局持续推进“实质台独”活动,但台湾民众的心态仍然出现了积极变化。《联合报》的两岸关系民意调查显示,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人仍达到49%,但主张“急独”和“缓独”的比例分别比2016年减少了2个和5个百分点,分别为13%和11%,是2010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最低点;主张统一的比例达到20%,统“独”比例的差距从2016年的14%降到2017年的4%,呈现一种趋向均衡的态势;认为“台独”是两岸最大变数的比例较2016年的22%大幅增加了11个百分点^[25]。显然,台湾民众对“台独”的危险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天下杂志》的年度调查显示,主张“一定条件下统一”的比例较2017年的8.2%明显增长到13.8%,台湾人认同比例下滑至新低,为2010年以来最低。其中,20—29岁、30—39岁自认“台湾人”的比例分别萎缩为72.7%、59%;前者转往“中国人”认同的比例从1.1%提高到4%,后者则从27.3%提高到36.7%,这表明所谓“天然独”并非铁板一块。《远见杂志》的调查也显示:赞成“独立”的比例约21.1%,少于去年的23.4%;而赞成统一的比例比2017年的9.3%多出5.5个百分点,大幅攀升至14.8%^[26]。台湾民众统“独”立场与“台湾人”认同的变化无疑是大陆综合实

力增长所带来的两岸经济实力消长的反映，也是两岸交流效果逐步外溢的结果^[27]。这表明两岸融合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四，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框架更加巩固。尽管美国等外部因素对台湾问题仍具有重要影响，但这并没有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国际格局。特朗普不到两个月就从特蔡通话迅速回归美国传统的“一个中国”立场，这表明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框架没有改变。2016年5月以来，大陆方面妥善处理台湾当局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国际刑警组织、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问题，捍卫了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目前，联合国195个成员国中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高达174个，国际社会“弃台就中”成为客观趋势。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图谋越来越没有市场。

（二）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

从两岸关系发展的规律来看，决定未来两岸关系基本格局和趋势的根本因素是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以下几个因素也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一是大陆对台政策的良窳；二是蔡英文当局的两岸政策及其施为；三是美国与台湾地区的互动关系；四是亚太格局和大陆周边安全环境。这些因素既孤立地存在，也相互作用，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都会产生复杂的影响，但尚不至于改变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趋势。

第一，两岸政治关系僵局突破的可能性很小，但在大局上大陆仍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动权，蔡英文当局难以挣脱一个中国的大框架。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是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顽固坚持“台独”的立场丝毫没有松动，根本不可能调整其两岸政策。二是中美关系仍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政争压力下签署新财年“国防授权法”和“台湾旅行法”。美国强力提升美台关系，给蔡英文当局寻找与美联合对抗大陆的利益契合点提供了可乘之机。三是大陆周边安全环境仍然复杂，中国与南海声索国之间的争议并没有根本解决。日本、印度等国家的搅局更加剧了周边安全的复杂性，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带来挑战。这给台湾当局拓展对外经济关系、累积对抗大陆的资本提供了空间。当然，更关键的是台湾从2018年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选举周期。2018年和2020年的两场选举对蔡英文当局来说都极为重要。2018年选举关系到她在党内的地位，2020年选举关系到她的连任。在民意支持度无法拉抬的情况下，巩固基本盘是蔡英文的必然选择。这种情况下，蔡英文当局调整两岸政策并在两岸关系发展上采取积极作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大陆方面仍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动权，这既得益于过去30多年来两岸关系发展所累积的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结构性变化，更有赖于大陆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两岸关系在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也潜藏着不确定的风险和变数。这种风险不仅来自蔡英文当局持续推动“去中国化”的“柔性实质台独”，更主要的是伴随2018年、2020年两场选举，两岸议题可能成为台湾朝野竞相要价的筹码，从而导致两岸关系面临对抗和冲突。从目前台湾岛内政局发展来看，以下几个议题最有可能给两岸关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一是“台独公投”。在激进“台独”势力的施压下，蔡英文完成了“公投法”的修订。目前，台湾当局前副领导人吕秀莲提出了“和平中立公投案”，“时代力量”公开宣布将推动六项有关两岸关系的“公投”提案，这些文稿都已经送到“中选会”初审。成立不久的“喜乐岛联盟”更是明确提出，2019年4月6日发动“独立公投”。按照新的“公投法”，若以2016年“大选”总投票权人数为基准，未来只要1878人就可提案发动“公投”，28万人即可联署成案，470万人投下赞成票并获得相对多数即可通过。在台湾岛内目前的政治生态下，“公投”门槛的大幅降低明显增加了“公投台独”的冒险性。二是

“宪改”。蔡英文在2017年民进党“全代会”提出“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就是为台湾打造更完善运作的民主宪政体系”。蔡英文将“宪改”议题集中在“十八岁公民权”“人权条款”“票票不等值”等方面，重点是调整“政府体制”。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正研拟成立“修宪小组”，并提出降低“修宪”门槛、增加“公民修宪提案权”、废除“考试院”与“监察院”、“十八岁公民权”等“宪改清单”。蔡英文当局与“独派”势力分进合击炒热、推进“宪改”议题，向打破“一中框架”发展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三是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可能取得重大突破。从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台湾旅游法”等法案来看，受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影响，双方军事安全关系升级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四是“台独”与“藏独”“疆独”“港独”和“法轮功”势力合流。尽管目前不能判断蔡英文当局是否会邀请达赖访台，但以民间邀请并由蔡英文当局批准的变通方式在未来不能完全排除。

此外，在两岸政治僵局无法打破的情况下，拓展国际空间将成为蔡英文当局纾解执政压力、拉高民意支持并向基本教义派交待的重要途径，两岸在国际领域的较量将更加激烈。台湾当局仍会在国际社会推行所谓“积极外交”“踏实外交”，以巩固“邦交国”局面，拓展与“邦交国”的实质关系；以“新南向政策”为指引，全力参与以美国、日本为首建构的“印太联盟”。这些都会给大陆在国际社会处理涉台事务造成干扰。

第二，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将受到民进党当局的干扰和阻挠，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会停滞。

影响两岸交流交往的最大变数是蔡英文当局的两岸政策。蔡英文当局为抗衡大陆方面推出的积极政策，仍将会从内部进行收紧，其主要着眼点就是修改两岸交流的相关规定。因此，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及民间各项交流将会受到民进党当局的反制。然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台湾民众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意愿持续增强。这是大陆方面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并将“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2018年2月28日，国家多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内容涵盖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和台湾民众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等待遇。这些措施无需满足台湾方面“对等开放”的需求，完全掌握在大陆一方，已经并必将对台湾岛内民众产生积极影响，势必对台商投资和人才流向产生巨大磁吸效应，进而加快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第三，国际势力介入台海事务和台湾岛内政治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强。

综合来看，“依美联日抗陆”是蔡英文当局发展对外关系的主轴，其主要考虑是通过美日的支持且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前提下维系和扩大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在两岸关系持续僵持、民意支持度不断走低的背景下，蔡英文当局面对大陆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依赖美日并与大陆对抗，美日介入台海事务和台湾岛内政治的力度将进一步增强。

首先，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美国不会放弃打“台湾牌”。当前的中美关系仍然比较复杂，在中国变得越来越自信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既面临美国国内矛盾丛生、社会分裂、政治竞争脱序的压力，也面临失去“全球老大”地位的焦虑。美国国内目前出现的不自信和心理失常容易导致中美关系脱离正常的轨道而走向极端。特朗普政府通过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上升到对西方价值观的威胁。基于对中国这样的消极定位，美国打“台湾牌”的意愿将会上升。

其次，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台战略决定了美国拓展对台关系的限度和程度。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行政部门仍是外交的主导者。尽管美国国会动作频频，但综合来看仍难以根本改变中美关系既有的格局和框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不会受到台湾问题的干扰。中美关系会斗而不破，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实质关系也可能在国际大格局和中美结构性矛盾下有所提升。其最有可能的领域包

括对台军售与军事合作、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

再次，美国将深度介入台湾岛内的政党竞争。从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开始，美国的对台控制战略由掌控台湾当局转向加强对台湾岛内政党的掌控。马英九主政期间，国民党、民进党两党竞相亲美。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更奉行“亲美亲日远中”战略，在东海、南海和区域经济合作上百般迎合美国、日本的亚太战略，并配合美国的对华政策而坚持“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国民党党内权力斗争也因美国的介入，而最终导致以吴敦义为代表的本土势力完全掌控该党的权力和发展方向。民进党当局通过“转型正义条例”迅速引起美国的关切。美国委派在台协会理事会主席莫健访台，要求民进党澄清外界“一党独大”“一党独裁”的疑虑。可见，美国“以台制华”战略未变，但传统策略正在悄然转变，其对台政策的重点正逐渐转向维持台湾岛内政党政治格局的平衡，企图完全掌控台湾当局，把控其两岸政策。

三、大陆应对两岸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本思路

蔡英文主政两年多来，两岸关系发展相较马英九时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两岸政治关系正从僵持逐渐迈向对抗。而且，在两岸缺乏政治互信下，美日介入台海事务加剧了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尽管如此，两岸关系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仍然没有改变，台海局势总体上仍处于战略可控状态。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两岸关系形势，特别是未来两年台湾将进入新的选举周期，我们对台海局势演变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台湾当局不会放弃以政权的力量在台湾岛内继续全方位推行“台独”分裂活动；另一方面，美日等国际势力为遏制中国崛起，用“台湾牌”来牵制中国发展的政策不会改变。大陆方面应该在推进实现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目标的同时，做好应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联手发难的准备。同时，要继续扩大两岸交流交往，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大陆方面可以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对台工作目标，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第一，要坚守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一底线，持续向蔡英文当局施压，坚决打掉蔡英文当局期待大陆调整政策的幻想。蔡英文上台以来，大陆方面始终明确坚持“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展现了捍卫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决心和意志，给蔡英文当局以巨大压力，有效约束了“台独”冒进活动，加剧了蔡英文的“执政”困境。考虑到蔡英文当局两岸政策不仅短期内不会改弦易辙，且因施政不顺、民调下滑，有走向激进的危险，大陆方面应更加明确地坚守“九二共识”和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的原则底线，以避免向台湾岛内民众传递错误信号。第二，针对台湾岛内“台独”发展的现实情况，不仅要任何名义、任何形式的“台独”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应对各种“台独”言行及时做出反应。比如，对“台独”重大动作如“公投法修改”“宪改”“释宪”等要迅速采取有力反制措施。在国际上，要毫不留情、坚决果断地打击其推动的所谓“踏实外交”和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逐渐压缩其空间。第三，要进一步加强打击绿色台商和绿色艺人，尽可能地削弱“台独”势力的支持基础。第四，要加强对民进党党内政治生态和派系政治的研究，更具针对性地做民进党的工作。第五，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部署，切实落实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区域合作，以压缩蔡英文当局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空间。同时，要借此以外促内，降低台湾民众对蔡英文当局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问题和两岸困局的期待，间接给国民党等反“独”力量以喘息之机。

（二）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加强对“台独”活动规律和形式的研究

研究清楚“台独”的本质和规律，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反对“台独”斗争的基础。过去我们常讲

“台独就是战争”，这里的“台独”一般是指“台湾宣布独立为国家”。但从陈水扁时期的“渐进式台独”开始，“文化台独”“法理台独”“政治台独”等不一而足，几乎民进党当局的每一项施政都变成了“台独”。概念的混乱导致很难提出客观和更具针对性的对策。因此，对于坚决反对“台独”，如何准确理解和界定“台独”的内涵与外延就显得很有必要。笔者认为，对“台独”概念的把握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同时切忌滥用，而是要根据特殊的条件和语境去理解。只有这样，反对“台独”斗争才能占据主动，才会更有针对性。

（三）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要切实做到落地有效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未来一段时期扩大两岸经济往来和民间交流的重点。大陆方面可以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上采取以下举措：第一，进一步加强青年工作。近年来，在加强做台湾青年工作上，大陆方面出台了相当多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做青年工作光靠输血和大包大揽是不够的，重点应增强他们在大陆的生存和造血机能。要积极落实同等待遇措施，通过环境的改善和塑造，真正让他们在参与两岸交流时有获得感和成就感，并逐渐地自觉地融入大陆社会。第二，进一步扩大基层交流的接触面。基层交流是将大陆政策影响力正面传导至台湾岛内的重要途径。大陆以民间先行的方式，通过两岸同胞共同努力建立了诸如海峡论坛等各个阶层的交流品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应看到，现有交流机制的实际效果与现实反应之间存有较大的差距。应积极总结经验，创新两岸基层交流的机制与形式，特别是要在扩大基层交流的参与面和政策落实的有效性上下功夫。同时，要努力形成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局面，实现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第三，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交流。要善用两岸经济交流的重要平台和各种机制，进一步减少中间环节，将经济实惠落实到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促成台湾同胞优先分享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成果。第四，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权益保护。要以我为主，切实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和海外的生活和安全提供保障和便利。

（四）继续提升大陆综合实力，改善台湾社会和舆情对大陆的负面印象

经济供给侧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周边国际环境的改善等，都应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扎实推进，避免重大失误。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共产党执政、大陆发展的正面形象，也才能避免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进行造谣中伤。以做好媒体宣传工作为基础，大陆综合实力的提升可以正面牵引台湾民意并对台湾持续施加影响力。

（五）维持斗而不破的中美关系，减少国际势力对两岸关系的干扰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我们应继续高举改革开放和多边主义的大旗，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在核心利益问题上，要敢于亮剑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要善用美国在很多重大国际事务上对我们的战略需求，做好对美交涉，以牵制美国介入台海事务，防止国际势力向蔡英文当局发出错误信号。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强调：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EB/OL] . (2015-03-04) [2018-05-04] . http://www.gwytb.gov.cn/zt/xijinjpingzhuanti/201504/t20150409_9538279.htm.
- [2]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EB/OL] . (2015-05-04) [2018-05-04] . http://www.gwytb.gov.cn/zt/xijinjpingzhuanti/201505/t20150505_9728243.htm.
- [3] 习近平同马英九会面 [N] . 人民日报, 2015-11-08 (1) .
- [4] 习近平在参加上海团审议时强调 保持锐意创新勇气蓬勃向上朝气 加强深化改革开放措施系统集成 [N] .

- 人民日报, 2016-03-06 (1) .
- [5]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N] . 人民日报, 2016-11-02 (1) .
- [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 年 10 月 18 日) [N] ,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
- [7] “总统”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专访 [EB/OL] . (2017-07-22) [2018-05-06] . <http://www.president.gov.tw/NEWS/20588>.
- [8] “总统”接受路透社专访 [EB/OL] . (2017-04-27) [2018-05-06] .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9117&mid=514>.
- [9] “总统” 接见 2017 海外华文媒体人士回“国”参访团 [EB/OL] . (2017-05-19) [2018-05-06] 总统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9224&mid=514>.
- [11] 两岸“维持现状” 蔡重申“四不” [EB/OL] . (2018-05-21) [2018-05-21] . <http://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80521000540-260118>.
- [12] “总统”接受 Hit FM 联播网“蔻蔻早餐”节目专访 [EB/OL] . (2018-05-14) [2018-05-20] . <http://www.president.gov.tw/NEWS/23337/>.
- [13] 社论: 走李登辉路线就是改变现状 [N] . “中国”时报, 2016-05-16 (15) .
- [14] “中华民国”第 14 任“总统”蔡英文女士就职演说 [EB/OL] . (2016-05-20) [2018-05-06] .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7408&mid=514>.
- [15] 北京来论: 放任“台独” 奇想只会恶化两岸关系 [EB/OL] . (2017-11-07) [2018-05-06] . <http://bj.crntt.com/doc/1048/6/9/7/104869735.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4869735>.
- [16] 美前亚太助卿: 绝不会牺牲台湾 换取美中关系改善 [N] . “中国”时报, 2017-10-24.
- [17] 川普国安战略提“台湾关系法” 保持与台湾强劲关系 [N] . 自由时报, 2017-12-19 (2) .
- [18] 首度提及印太战略 蔡英文: 台湾可做更大贡献 [N] . 苹果日报, 2017-12-11 (2) .
- [19] 常住大陆台胞 17 万? 台商普查查不可靠 [EB/OL] . (2011-04-30) [2018-07-06] . <http://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story20110430-170289>.
- [20] 对大陆政府观感 负评历年最低 首度逆转! 49%对陆民众印象好 [N] . 联合报, 2017-11-20 (4) .
- [21] 张五岳: 人民善意 两岸稳定基石 [N] . 联合报, 2017-11-20 (13) .
- [22] 49%希望永远维持现状, 急独+缓独 1 年来少 7 个百分点 愿赴陆变业、念书创 8 年新高 [N] . 联合报, 2017-11-20 (3) .
- [23] 2018《天下》国情调查: 年轻人外逃、“天然独”松动 民进党的“敌手”是习近平? [J] . 天下杂志, 2018-01-03~01-16 (639) : 25.
- [24] 彭杏珠: 惠台 31 措施对台冲击 “执政党”面对一大隐忧、三大警讯 [EB/OL] . (2018-03-14) [2018-05-06] . http://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3280&utm_source=ElisPost&utm_medium=FB&utm_campaign=20180314_0700.
- [25] 本报两岸关系年度调查: 蔡“总统”两岸表现 56%不满意 两岸政策 47%质疑不当 [N] . 联合报, 2017-11-20 (1) .
- [26] 林让均: 蔡英文执政关键调查: “台独”创 10 年新低、统一创 10 年新高 [EB/OL] . (2018-02-12) [2018-05-06] . <http://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2863>.
- [27] 社评: 台湾的中国人认同为何上升? [EB/OL] . (2017-09-18) [2018-05-06] . <http://www.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93&kindid=2777&docid=104814567>.

国家统一的理论探讨

——基于复杂性思维的视角

朱 磊

(南开大学 台湾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摘 要: 国家是由个人及利益集团等多层级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 国家统一与分裂是系统不同的相。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益斗争是推动国家系统演化乃至发生相变的根本动力。权益弹性是国家系统内部要素发生不平衡变化时权益矛盾与对立可以化解的程度。它反映出国家制度的权益包容性和可变性, 也体现了国家政权解决各种分歧的执政能力。权益弹性大的政权具有更强的向心力, 可以取得政权竞争中的优势, 主导国家的演化方向。对国家系统演化进行人工优化的合理途径是通过系统的自组织功能为权益弹性大的政权主导国家发生相变创造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推动国家系统在政权竞争中远离平衡, 形成系统耗散结构, 在临界点附近发生的随机涨落中诱致国家系统发生相变。

关键词: 台湾问题; 国家统一; 分裂; 系统论; 权益弹性; 复杂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8) 04-0026-14

复杂性科学的最新研究使人们对系统论的认识由构成整体论发展到进化整体论, 对系统演化的动力、条件、方式、机制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这对从系统演化的角度开展国家统一问题研究、把握国家统一客观发展规律、科学制定国家统一战略和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国 家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而且这个有机整体又是它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1]。“用于演变的动力学模型也应该是最适于人类社会系统的模式。”^[2]人类社会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层级, 国家则是人类社会复杂巨系统下面层级的子系统。国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历史上有一个从氏族部落到古代国家再到现代国家的系统形成和发展过程, 符合复杂系统演化从混沌到有序的演化规律。原始人类为提高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而形成有组织的群体, 并由氏族部落逐渐演化出国家的形式。恩格斯考察了国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8.04.003

作者简介: 朱磊, 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研究”(15BDJ005)

引用格式: 朱磊. 国家统一的理论探讨——基于复杂性思维的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4): 26-39.

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他认为国家是在阶级冲突中产生的：“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国家的建立可以保证人类社会的秩序和文明，避免个体之间的混乱和伤害。“国家不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是管理全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原有的古老的氏族组织面对着日益复杂而尖锐的社会事务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了，于是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机构（国家）便应运而生。”^[4]霍布斯、洛克等17世纪理论家的著作对国家的起源和意义有过深刻论述。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标志着包括主权、领土、人口三要素的现代民族国家，即“以民族主义原则确立其合法性的国家”^[5]开始出现。现代国家体系更强调主权和民族的特点，这不同于此前分别以封建原则和宗主权原则构成的西方国家体系与东方国家体系。

关于国家本质的认识主要有三种思路。马克思以“统治阶级”为权力主体的研究思路认为，国家反映的是阶级和社会利益，阶级和社会斗争驱动国家权力向力量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和阶层转移。韦伯以“官僚体系”为权力主体的研究思路认为，国家反映的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体系的利益，官僚体系在自我利益的驱动下会扩张自身权益与加强国家干预。第三种思路以“国家自主性”强调其独立的行政资源、信息渠道和治理国家的专业知识，主张国家并不总是代表主导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是要维持普遍的政治秩序。新多元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沿着这种思路展开，将研究重点放在由不同阶级、精英和利益群体组成的政权如何自我运作上面，更强调国家和政权的公共服务功能。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新多元主义秉持多元主义价值，更加强调组成国家的利益集团的自发性、自由性和自愿性。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现代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他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6]。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继续发展国家学说。普兰查斯等率先提出国家并不总是阶级统治简单而被动的机器，他还与米利班德就国家在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的作用展开辩论^[7]。杰索普对新马克思主义阵营持续了10余年的辩论提出综合性结论：国家权力反映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并不总是代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国家在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过程中建立了自在的制度结构，也拥有了多样的社会基础，从而获得了相对自主性，国家是“政治战略的结晶体”^[8]。

韦伯开创的权威理论提供了另一种理解国家的思路。他将国家的本质特征定义为“在特定的疆域范围内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权”^[9]。与马克思注重国家阶级结构分析不同，韦伯强调国家权力形成过程中的“理性行为”，这种理性行为意味着社会行为的可计算性、高效率性和有秩序性。他认为欧洲宗教改革导致理性行为扩展，由此建构的官僚体系最终形成一定范围内某个合法权威的垄断统治，即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权力既来自于暴力权力，也来自合法权力，即权威，因为国民如果不服从权威，再多的暴力都不能强迫他们服从统治^[10]。韦伯将权威的来源分为三种——传统、魅力和法理，并认为权威的差异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权与时代之间的主要差异。韦伯的理论虽是从国家统治者角度出发的思路，但更强调国家工具的合法性来源，只是他没有意识到政治行动主体对各自利益的理解不同，采取的行动也会不同，因而也就没有深入分析国家统治者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权威

形成过程。后来的新韦伯主义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韦伯理论的不足。蒂利、唐宁、波特等人将国家权力主体视为自利的统治者，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是有严重路径依赖的，最初统治者与控制资本和军事力量的被统治者之间的交易形塑了国家的组织结构^[11]。在国家演变过程中，蒂利提出了集体行动的动员模式，包含利益、组织、动员和时机等基本要素。他认为，集体行动挑战权威的结果改变国家现状，而集体行动有多种形态，不一定是马克思的革命与韦伯的社会运动^[12]。

其他学者认为，第三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国家的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回归国家学派代表人物斯科克波尔从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两个方面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一方面，国家被视为官员集体在特定的国家资源与社会关系中高效或低效地去实现明确目标的组织；另一方面，国家被看作更加宏观的结构，这种结构影响着社会中所有群体与阶级的政治目的及其实现方式。国家的自主性来自其独立的行政资源、信息渠道和治理国家的专业知识，因此国家并不总是代表主导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是要维持普遍的政治秩序。新多元主义将研究重点放在由不同阶级、精英和利益群体组成的政权如何自我运作上面，更加强调国家和政权的公共服务功能与多元主义价值；认为组成国家的利益集团的互动具有自发性、自由性和自愿性，并非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强调的对抗性、暴力性和强制性。多元论政治理论家林德赛对此的解释是社会的共同生活是由各种社会关系维系的，每一种生活都存在一种“不能被国家通过强制机制占据”的“自动、自主和自由的领域”^[13]。国家处于各种团体和利益以及所有社会阶级影响之下，并不偏向特定的利益或团体，也没有与所在社会相分享的自我利益。施瓦茨曼特称国家是“社会之奴仆而非其主人”^[14]。其理由是政党竞争和利益团体活动确保政府对公众舆论保持敏感和积极反应，国家则从属于严格公正的政府官僚体系。

比较以上三种主要思路，无论将国家视为阶级斗争的统治工具、具有权威的官僚体系还是利益集团的协调平台，均是从系统功能的角度来理解国家的本质和特点，都认为国家具有集中和分配集体权力与利益的功能，而差异主要是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关系和博弈方式。归根到底，国家系统的形成在提高人类社会生产效率与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内部权益的分配秩序问题。这里的“权益”是广义的，不仅包括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还包括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也涵括各级子系统各方面的自由发展权。由于国家系统由多种利益集团的子系统构成，必然存在权益分配的分歧与对立，如果在一个国家框架内无法通过和平的或者暴力的手段解决这些分歧，国家将发生分裂。相反，如果权益分配可以在国家内部得到调整，原来统一的国家不会走向分裂，原来分裂的国家却有可能在共同利益和政权强大的吸引力下走向统一。国家系统的演化方向最终趋于统一还是分裂取决于权益弹性。

二、权 益

系统分为三种：与外界完全没有物质能量交换的孤立系统，只有能量交换而无物质交换的封闭系统（在量子力学中封闭系统等同于孤立系统），与外界同时有能量和物质交换的开放系统。在前两种系统里，系统演化方向趋于无序，而开放系统中系统演化趋于有序。现实中的系统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国家系统的总体演化方向趋于有序统一，其过程往往不是直线，而是进化与退化交织。系统退化与进化的机理相同，但方向相反，是从有序到无序、从高级到低级、从复杂到简单的倒退下降的方向。国家演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统一也可能出现分裂。

系统演化中的“熵流”概念为国家演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视角。熵指的是系统的混乱程度。任

一系统内部自发产生的熵总是大于或等于零。孤立系统与外界没有熵流，必然趋于熵增。其无序度增大，一直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时，系统内部才达到一种完全均匀的平衡状态，不会再发生任何变化，除非外界对系统提供新的能量。当一个系统保持开放性时，即熵流不等于零时，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热力学平衡态，熵流大于零，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涌入大大增加了系统的总熵，加速了系统向无序平衡的运动；第二种情况是线性平衡态，熵流约等于零，这种系统一般开始时有一些有序结构，但最终无法抵抗系统内自发产生的熵的破坏而趋于平衡态；第三种情况是远离平衡态，即熵流小于零，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给系统带来负熵，结果使系统有序性的增加大于无序性的增加，新的有序组织结构就能从中形成。

国家系统内部各方力量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之中，从而导致系统整体的演化，在此过程中国家系统内部会自发产生熵，即无序性。国家系统由作为子系统的多种利益集团组成，这些子系统由作为孙系统的次利益集团组成，可以如此不断细分，直到个人。无论个人还是利益集团，为了存在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个人与各层级利益集团都在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如果没有任何相互制约，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每个人或每个利益集团的权益趋于无穷大，整个社会将处于无序状态。对人类社会而言，无序意味着不稳定和脆弱，但有利于释放创造力；有序意味着稳定和强大，但创新性约束较大。因此无序和有序各有利弊，没有哪种状态是绝对的好或坏。个人与每个层级的利益集团都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不断追求自由度的本能要求会产生熵增，而现实中任何系统的外部资源都存在有限性，个体与外界不可能无限自由地产生熵流，任何个体与利益集团在获取资源时都要受到其他个体与利益集团的制约。这些外力产生熵减，系统只有在与外界相互作用与交换的条件下才能保持有序和无序的平衡。

现实中，人类社会系统不存在绝对无序和绝对有序的状态，但在无序和有序的宽广区间内，可以根据形势需要出现多种不同程度与不同组合的系统形式。国家系统采取的具体组织方式由外部环境和路径依赖所决定，并对国家走向统一还是分裂的演化方向具有决定性影响。国家系统内的任何个人或利益集团都有从外部获取权益的需要和扩张本能。这些权益包括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的自由支配权、选择权和发展权，但每个系统都只能享有一定规则下的配额，即有限权益。这些规则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而对另一些利益集团不利，受损的利益集团会反对并采取游说请愿、罢工游行、阶级斗争、民族冲突等和平或暴力的多种方式进行抗争。如果这些权益配额可以根据形势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改，抗争得以在原有国家框架内解决，国家就将呈现统一状态。假如在原有框架内无法平息矛盾，配额争夺呈现相峙局面，国家将趋向分裂。从理论上讲，没有任何具体的差异和对立必然导致国家分裂，决定国家统一或分裂的最根本因素不是政治对立、经济差异、语言文化和民族宗教，而是权益弹性。

国家的权益弹性是指国家系统内部要素发生不平衡变化时，权益安排的规则可以化解矛盾与对立的程度。它反映出国家制度的权益包容性和可变性，也体现了国家政权解决分歧的执政能力。权益弹性越强，国家越不容易分裂。在一个权益弹性强的国家，当某一利益集团发展壮大后提出宗教信仰、民族待遇、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等领域更高的权益要求时，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得到满足。例如，具有与其他利益集团进行公平合理协商的平台与渠道；该利益集团中的个人可以自由流动到其他利益集团中满足自身的权益需要，不需要通过国家分裂解决激化的矛盾。而在一个权益弹性弱的国家，某一利益集团提出的新的权益要求得不到有效解决或缓解，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将

日益加剧。如果居于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对其进行暴力镇压甚至消灭,固然暂时不会出现国家分裂,但如果镇压效果不好而形成权力对峙的局面,国家就开始走向分裂。权益弹性是国家系统稳定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权益弹性强意味着系统存在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任何偏离会通过国家运行机制将系统拉回原来状态,使系统具有较好的稳定性。相反,权益弹性弱则系统稳定性也差。

外部环境也会通过影响权益弹性来影响系统稳定性。例如,一个国家出现趋于统一或分裂的系统演化倾向时,国际势力对一国内部分裂势力或对一国执政当局的有力支持可能会打断或延缓国家系统的最初演化方向,使该国维持原有状态;或者该国执政当局在国际势力的影响或压力下进行制度改革,减弱甚至弥合国内的政治纷争,这也可以增强系统的稳定性。系统的稳定状态表现为平衡被打破后可以迅速恢复原有状态,稳定系统不易发生相变。打破平衡的力量往往是系统内外的合力。国家系统发生相变常常是外部条件改变或内部力量从外部环境获得足够的物质和能量,打破系统原有的平衡状态,促成系统演化。权益弹性本质上是国家系统内部制度力量,但国家系统的外部力量对内部力量有放大或制约作用,从而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国家系统上面层级有国际环境母系统,或称“超系统”,下面层级的子系统包括统一国家的各组成单位或分裂国家的各方政权,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子系统,它们互相交叉。各层级系统间相互作用和影响。每一层级系统的相互作用以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为前提,二者又总是相互转化。国际格局力量可能增强国家系统现状的稳定性,国家系统的相变也可能改变国际格局。

国家的权益弹性来源于制度设计,其制定和执行者是政府或政权。个人权益的设定由每个人所处的群体决定,这些群体的权益由上一层级群体决定,决定权不断向上延伸,直到国家层级。当前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拥有最高权益分配权力的系统层级仍然是国家,没有更高权力对国家有强制权。国家通过政府或政权形式使用最高权力减少因争夺权益而引发的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冲突。政权数量和关系的变化既是国家统一或分裂的标志,也是国家系统发生相变的演化结果。国家系统的相变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国体和政体的改变会使国家系统演化为不同的相,系统结构功能发生改变可能使一国国民由高度无序的一盘散沙转变为高度有序的铜墙铁壁。统一和分裂之间的转化只是国家系统各种相变中的一种。

三、政 权

政权或政府^①作为国家的中枢神经代表国家行使合法权力,并与所有国民共同组成国家。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人口通常由一个政权管辖,也可能出现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行政权分别管辖的情况,但一个统一国家在国际上只能由一个政权代表。因此,可以用政权是否拥有国家内外最高权力并具有唯一性作为判断国家是否统一的重要标准。政权既是由多种利益群体组成的拥有最高合法权力的实体,也是具有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官僚体系。达尔、罗斯等人认为不同社会利益集团通过国家机构和政治体系进行讨价还价,完成国家权力资源分配,作为统治者的政权其实是利益群体多元化的组合^[15]。斯科克波尔提出政权是拥有其自身全部权力与能量的自治的社会公共机构,由各种特殊的组织和参与者构成,国家变迁的目标就应该是建立强而有力和富有成效的国家官僚机构和行政体系^{[12] 58-61}。迈克尔·曼提出社会由“相互重叠交叉的社会权力网络”构成,其权力来源有四种——意

^① 二者在通常语境中没有差别,但严格说来,政府比政权更具有合法性。在统一国家中,政权即指中央政府;在未统一国家中,政府通常指在国内与国际均获得承认的政权。

识形态、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其中只有政治权力是国家特有的权力，人类历史就是统治者如何通过整合不同权力来源将国家权力制度化的过程^[16]。拉克曼提出国家首先是一个场域，一个权力斗争和整合的领域，关键因素始终是国家内部精英关系的结构，即到底是只有一种精英统摄局面，还是有两种或多种精英处于联合或斗争的状态，这种结构极大地制约了国家的力量和自主性。在一个未统一国家，所谓的“精英斗争”就是政权企图攫取敌对政权的组织机构为己所用的过程^{[11] 5-6}。

政权作为国家内部精英权力斗争的场域，不仅有协调不同利益集团进行权益分配的职能，同时具有自身的权益诉求。政权在将国家权力制度化的过程中，通过阶级斗争、社会运动、集体行动和讨价还价等方式完成社会权益的分配和转移，同时必然追求自身权益的最大化。某个政权的内在扩张动力与其他政权或利益集团的反对和制约共同构成该政权的权益边界，该权益边界往往也是国家的边界。在该政权控制下的国家内部，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发展呈现不平衡性，无论多么合理的权益分配方案都需要根据情况变化而调整，如果该政权拥有使利益集团间的权益分配具备足够的可调整弹性的能力，国家也相应具备维持统一的条件。相反，如果权益弹性较小，不能解决或控制权益分配中出现的政治路线差异、民族宗教纷争、经济利益失衡等矛盾和冲突，统一国家就可能发生分裂或分治。

从国家最高权力^①的角度看，国家具有统一、分裂和分治三种状态。国家的最高权力包括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的独立地位。前者指行使和分配颁布法律、司法、任命公职人员、征收捐税、发行货币、组织和调动军队等权力的权力，后者是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并具有行使对外战争与和平、缔结国际条约等权力的权力^②。一个国家如果对内最高权力和对外独立地位都是唯一的，国家处于统一状态；如果二者都不唯一，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如果对外独立地位是唯一的，国际上只承认一个代表该国的政权，但同时对内最高权力不唯一，存在两个或更多互不隶属、各自为政的政权，则国家处于分治状态。统一或分裂状态如果得到各方政权的认可均可以是稳定状态，但分治状态意味着一国内部不同政权间对国家演化方向存在根本分歧，很难有持续的稳定性。

国家在统一、分治和分裂三种状态间转化是系统的相变。政权是相变的序参量。序参量是描述系统有序程度的参量，决定着演化的进程与系统的最终结构，扮演“建序者”的角色。国家由不统一状态向统一状态演化是系统形成宏观有序结构的过程，统一国家一定只有唯一的中央政权。如果国家系统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政权之间必然存在竞争。竞争的结果既可能是统一也可能是分裂，取决于不同序参量的增长率。增长率最高的序参量通常获得优势并决定宏观结构。系统演化的关键是具有支配能力的序参量推动系统从无序向有序演变。序参量通过支配原理来左右子系统的行为，支配微观层次上的子系统服从集体的命令。序参量一旦占有优势，就会趋向主导地位，迫使其他因素服从其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因素在系统中的作用不再相等，形成“对称破缺”，系统演化的整个过程被序参量主导。有时系统可能受到几个序参量的控制：在一段时间内，一个序参量占主导地位，支配其他序参量，规定其运动，但不久后这个序参量就失去主导地位，把支配地位让给另一个序参量。在国家系统的演化过程中，社会舆论、主流观念和政权都是序参量。一种社会

① 很多文献将国家最高权力视为“主权”或“立法权”，但“主权”的内涵与意义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大争议，因此本文不采用“主权”概念，而用“最高权力”表述可以行使诸多终极权力（包括“立法权”）的权力。换言之，国家最高权力派生出立法、司法、行政等具体的终极权力。

② 英国学者布尔的“内部主权”与“外部主权”的分类概念与此类似。（参见：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p. 8.）

舆论需要在兴起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影响或改变主流观念，继而改造或更迭政权。政权序参量一旦占据支配地位，会运用各种力量影响社会舆论与主流观念，主导国家演化的方向。

政权向心力决定国家系统的稳定性与政权之间的竞争力。政权的制度和政策是否具有权益弹性，对向心力强弱有重要影响。权益本身是涉及多领域的内容丰富的各种支配权，因而政权的向心力必然是多方面的综合性力量。这些能力构造出民众对政权的信任、认同和服从。离心力则相反，如果政权的上述能力有严重缺陷，民众将会对其失去信任，转而支持或生成其他政权。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比决定国家系统演化方向趋于统一还是分裂。政权的向心力受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具体体现为政治影响力、经济推动力、文化凝聚力、社会控制力、信仰包容力、军事战斗力、外交亲和力与统一意志力的合力。这些合力可以简化为两类——“硬实力”和“软实力”，即政权在经济、军事、科技和人才等方面可量化可衡量的刚性力量，以及包括价值观、文化、政策和制度等政权可以施加影响但难以量化的柔性力量^[17]。通常来说，政权如果具有较强的软实力，则国家系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为软实力可以通过调动自愿力量促使民众对政权产生信任和认同。在民众与政权具备较高互信的国家系统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益分配矛盾可以通过自愿方式解决。而政权如果运用硬实力即通过强迫手段解决纷争，除非同时具备较强软实力，否则这种系统的稳定性是脆弱的，系统是不稳定的。

不稳定系统一定要向稳定系统的目的点演化。国家内部如果出现了互不隶属且互不承认的两个最高权力中心，国家系统宏观结构必然是不稳定的，此时国家系统会向消除根本政治分歧的稳定结构演化。在两个政权之间的博弈中，消除根本政治分歧有三种途径：一方改变意志；双方改变意志；在均不改变意志的情况下一方消灭另一方。三种途径的演化方式最终由政权的向心力决定。向心力强的一方将获得优势，占据主导地位，迫使另一方改变意志。在主导政权运用软硬实力推动国家系统演化时，外部环境将对不同实力的运用产生重要影响。当国际形势处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时，政权更倾向运用软实力对双方控制下的民众产生影响、改变民意对比；而在时代主题是战争与冲突的国际形势下，作为非自愿力量的军事手段将成为政权的优先考虑。民意主要是由历史惯性、时代潮流、舆论引导等因素决定；军力则取决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组织士气等因素。政权的决策直接决定己方意志是否改变，是否坚定要求对方改变意志，以及即使自己有足够军事能力毁灭对方但是否愿意这样做。政权之间根本政治分歧的消除伴随着国际结构的演变，意味着国家系统进入新的稳定态。即使在这种新的稳定态下，国家系统并非静止不变，新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力量仍会不断出现，即系统涨落。很多政治观点和力量不会演化到足以挑战主流观点和政治力量的程度，但在特定情形下，某些政治观点和力量通过正反馈机制形成自聚集、自生长的自组织结构。它就可能迅速壮大，成为可能挑战和打破现状的新的力量，因此不稳定系统向稳定系统的目的点演化所发生的相变也只是系统演化中的一个阶段。

四、相 变

相变是系统状态发生改变而形成的系统质变。相变是有序和无序两种倾向相互竞争的结果。系统发生相变的运行原理是：当外部条件及内部要素改变时，系统状态变得不稳定，在临界点附近，系统通过不断涨落探测有序宏观状态的各种新的可能性，某种新的集体运动形式将越来越强，最终压倒所有其他的集体运动，通过自组织方式出现一种新的宏观有序状态。国家系统演化是一个自组

织产生新系统的演化发展过程，其中能否形成耗散结构是一个新系统能否诞生和进化的关键。耗散结构是指远离平衡态的动态的稳定有序结构。与平衡结构不同，它不是“死”的稳定有序结构，而是“活”的稳定有序结构。耗散结构系统在性质上与守恒系统的重大区别就在于有时间发展行为。耗散结构的形成条件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开放是整体进化的前提，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涨落是有序实现途径，非线性导致自组织。如果未统一国家系统满足耗散结构条件，系统可以通过自组织功能恢复稳定有序的国家统一状态，完成从分裂或分治到统一的非平衡相变。

开放系统因从外界引入足够强的负熵流而抵消系统本身的熵产生。系统总熵减少或不变使系统进入或维持相对有序的状态。国家系统不可能是孤立系统，现实中或多或少都是开放的，与外界有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因而国家系统演化的前提始终存在。但在国家系统由未统一向统一演化的过程中，外部环境对系统演化未必是正效应，如果国际势力的介入是强化分裂或分治国家的现状稳定性，主张统一的政权就需要快速发展自身力量，克服国际势力的阻挠，压制分裂势力，这样才能为实现国家统一创造条件。

非平衡条件的满足有赖于政权向心力的变化。政权向心力对比决定了国家趋于分裂还是统一，以及由谁来主导完成统一。非平衡态意味着力量分布不均匀，政权之间力量存在差异。远离平衡态就是远离系统的无序状态。系统只有远离平衡态，才可能使原来的结构状态失稳，并在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点后发生相变。非平衡是形成和维持宏观有序结构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只有出现有强大向心力的政权才有条件结束国家混乱状态、主导完成国家统一，但强有力政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国家统一的必然实现。国家系统内部要素不平衡发展引发的系统失稳是国家系统发生相变的最重要动力，而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对系统的非平衡程度有重要影响，有时需要通过系统与外部环境互动来改变国际势力的平衡策略、打破系统内部平衡。一国内部的政权之间的竞争离不开与国际势力的关系处理，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排除或改变外部力量的介入才可能进入国家系统的非平衡态。

涨落是系统宏观量对平均值的偏离。在非平衡态，如果系统中存在着正反馈机制，涨落就会被放大，导致系统失稳而被推到临界点上。系统在临界点上的行为有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涨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选择作用。系统演化的规律“常常是一种不可预见的涨落在两个等价的有序状态之间作出了最终选择”^[18]。国家系统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存在政治事件、经济波动或社会运动等各种涨落，即使整体是稳定的，系统中也可能存在局部的不稳定。个别的、局部的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会放大，如果超出系统在原先条件下保持自身稳定的条件，会使系统保持自身稳定的能力遭到破坏，整体失稳，在震荡后进入新的稳定态。非平衡自组织系统对于某些涨落格外敏感，微小的随机涨落往往带来出乎预料的后果，国家统一的发生常常不是按预定计划实现，而是随机涨落引发的突然进化。

非线性是国家系统天然具备的功能。在产生耗散结构的系统中，基元间以及不同的组分和层次间通常都存在错综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在线性作用下，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缺乏关联，无法产生竞争合作；在非线性作用下，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密不可分，表现出强烈的整体行为，个别涨落能引起系统的整体自组织。“线性律和非线性律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叠加性质有效还是无效：在一个线性系统里，两个不同因素的组合作用只是每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简单叠加。但在非线性系统中，一个微小的因素能导致用它的幅值无法衡量的戏剧性结果。”^{[2] 63-64}系统发展的本质是非线性相互作用，体现为要素间的排斥和吸引、竞争和协同。在临界区域附近，涨落加上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的

关联放大效应主宰系统演化的方向和模式。国家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领域子系统之间会产生非线性作用，国家系统与母系统及子系统之间也存在非线性作用。国家系统发生统一相变不一定是政治因素直接导致的结果，很多时候是通过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涨落对政治领域产生非线性作用，进而诱发统一相变。

在以上四个形成耗散结构的条件中，开放、涨落和非线性是国家系统自然而然会具备的条件，非平衡条件则与政权的能动性密切相关。在一个未统一国家，两个或两个以上政权之间存在向心力的激烈竞争，这种差异随着暴力或和平方式的竞争不断增大而使国家系统远离平衡，逐步具备实现国家统一的非平衡条件。在这个推动系统远离平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是系统正反馈功能。反馈是系统的输出和输入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反馈是自我复制、自我放大的机制，是“序”产生的重要因素。负反馈抵消系统中随机偶然的因素，使系统稳定运行；正反馈放大系统中随机偶然的因素，使系统演化创新。正反馈促使系统运动偏离已有状态，使系统运动趋于失稳，一旦突破量的规定性而发生质变，系统就进入新的稳定状态。政权在运用武力推动国家统一的过程中，胜利会强化己方的士气与战斗意志，同时敌方会因失败产生恐惧和涣散，从而扩大了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在正反馈的作用下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情形。如果政权通过和平方式推动国家统一进程，同样可以在政权与民意之间形成正反馈，即政权的统一政策得到主流民意的拥护和支持，反过来民意压力下政权推动国家统一的脚步不得不加快以适应舆论的要求，统一于是迅速完成。无论是武力手段还是和平手段，此时占据绝对优势的政权只需要在正反馈机制创造出的有利形势下对其他政权展现自己的权益弹性，国家统一“传檄可定”，国家系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进入稳定状态，完成系统相变。

正反馈机制是自组织功能的关键，自组织理论是系统演化规律的核心。“系统自己走向有序结构就可以称为系统自组织。”^[19]自组织的表现形式包括“自聚集、自整合、自创生、自发育、自生长、自稳定、自适应、自调整、自更新、自修复、自复制、自繁殖、自演化、自衰落（老化）、自消亡等”^[20]。自组织实质上是在大量要素以混乱无序的方式互动中寻找确定性的自发行为过程，并以某种有序结构模式把这种确定性固定下来，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从而实现有序。自组织理论主要由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和超循环理论等构成，对系统的演化规律形成较清晰的轮廓。普利高津创建的耗散结构理论研究了系统自组织演化发生的条件。“耗散结构一旦形成，时间以及空间的均匀性可能就遭到破坏。”^[21]哈肯创立的协同学回答了系统演化的临界点上各子系统如何通过自组织形成新的有序结构，揭示了系统演化的动力。“最终哪种结构得以实现，将取决于各个集体运动形式（方式）的增长率，这一观点意味着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不断相互竞争。”^[18]²⁰⁸托姆的突变论研究了自组织的演化途径，阐明系统演化如何采取突变和渐变方式从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突变是系统得以生存的手段。”^[22]艾根的超循环理论从生命系统的角度探索了系统整体生成的内在机制。“超循环是通过循环关系联结多个自催化和自我复制单元构成的系统。”这些理论观点揭示：系统演化以自组织的形式完成。自组织表现为在系统整合要素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专职的组织指挥者，所有要素或组分都在行动，整体上却能形成、维持、发展、改变系统结构。系统发生相变的条件包括开放、非平衡、涨落和非线性，系统形成新的整体结构的演化动力是序参量之间的协同竞争。相变过程中，中介态不稳定的相变对应于突变，中介态稳定的相变对应渐变。突变分叉使系统演化有多种可能性，既可能是系统进化的创造性源泉，也可能是系统退化崩溃的路径。国家系统的自组织就是由各种关联的个人、利益集团或政权自行组织成为统一有序的国家。在

这个过程中，没有高于国家的力量设计和推动国家系统的演化进程，要素间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完成自组织，形成更为复杂有序的多层次国家系统。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涨落事件经过正反馈机制的放大可能演变成为重大政治事件，系统与母系统及子系统之间、各层级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对政权序参量产生重要影响。政权向心力的变化引发国家系统失稳，在民意的推动下国家系统进入新的状态。

五、政策

按照上述逻辑思路，国家是由个人及利益集团等多层级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权益安排是其最重要功能。权益弹性大小决定国家系统的稳定性。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益斗争是推动国家系统演化的根本动力。政权作为权益弹性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既要维护和协调国家系统内外不同利益集团的权益，又要顾及或扩张政权自身的权益，扮演着国家系统演化序参量的角色。未统一国家内不同政权之间的竞争决定国家系统演化的方向。权益弹性大的政权具有更强的向心力，占据政权竞争的优势，推动国家系统远离平衡，逐步满足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的条件；在临界点附近发生的涨落被正反馈机制放大后，国家系统发生相变，进入完全统一或彻底分裂的状态。这种突变的发生是通过武力还是和平方式具有不确定性。国家系统的演化动力最关键的是政权力量的不平衡增长，只有政权实力对比远离平衡才能使国家系统发生相变。政权实力的核心是其制度及政策的权益弹性，因此对国家系统演化进行人工优化的合理途径是通过扩大权益弹性来增强推动国家统一的政权的实力，以为相变的发生创造条件。

一个统一有序、管理高效的多层级国家系统有利于国家系统功能涌现和提升，并且符合民众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国家系统向统一演化符合复杂系统趋于有序的演化方向及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对于推动国家统一的政权而言，重点是要在制度和政策层面扩大权益弹性，具体需要在三个方面加强国家建设，即构建“势-力-策”的“3S模型”。一是外部形势，简称“势”（Situation），是政权运作和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国际环境。上一层系统对下一层系统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政权需要处理好国家系统与国际超系统的关系。二是内部力量，简称“力”（Strength），是政权自身具备的实力和能量。政权力量增长率是国家系统演化的重要序参量，对国家系统的各个子系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三是政权策略，简称“策”（Strategy），是政权采取的施政策略。系统一旦具有自我意识就会主动影响系统演化，客观上可以加速或改变系统演化进程。

政权追求国家统一或权力最大化目标时有三个约束条件：国际形势、自身能力和国内民意，因此政权进行权力扩张的着力点也在于上述的“势”“力”“策”三个方面。首先是“势”，因为国家系统本身也需要从外部获取权益，国家系统与超系统之间的联系和作用决定了政权的外部权益边界，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家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决定了政权的内部权益边界。追求国家统一可能带来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会对国际格局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意味着国家在国际上权益配额的变化，由此必然产生与国际势力的相互作用。“环境条件的微小变化可造成全新的序参数或序参数系统。”^{[18] 73} 国际格局的权益弹性较大体现为国际形势处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有利于政权通过和平方式取得国际势力对本国统一的谅解和支持，例如冷战结束时的德国统一；而在国际格局的权益弹性较小的情况下，时代主题是对抗与冲突，政权使用非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统一目标将成为优先考虑和现实途径，例如冷战时期的越南统一。

相对而言，“力”是慢变量，但也是最根本的序参量，因此长期而言国家建设主要是“力”的

建设,即自身全面发展进步。政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通过使民众产生畏惧与热爱的不同情感形成推力和引力,从而共同构成民众对其的向心力。与缺乏最高权力中心的多元的国际秩序不同,政权治理下的国家系统是具有最高权力的有序系统,政权可以通过权益弹性的提升改善自身的软硬实力。民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仰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与选择权意味着国内权益弹性的增大,当然这并不等同于完全依赖自愿力量的无序性扩张。事实上,政权的军事、法制和外交力量的增强同样是扩展权益弹性的表现,有助于解决内外权益的纷争。二战后印度独立初期国家在宗教信仰方面权益弹性低,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在政治经济方面缺乏权益弹性,终于酿成东巴与西巴分裂,导致孟加拉国独立;二战后独立的埃塞俄比亚在政治权力方面明显缺乏权益弹性,迫使厄立特里亚人由和平请愿争取权益最终转为以武力方式实现从埃塞俄比亚分裂出去;英国在宗教信仰和经济文化方面的权益弹性较高,北爱尔兰和苏格兰虽然有分离倾向但迄今都没有独立出去;加拿大不断提升语言文化和政治经济方面的权益弹性,以将魁北克留在国家内;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外交实力,不但可以粉碎车臣的分裂行动,还可以让克里米亚从乌克兰重新回归俄罗斯,这种处理子系统分裂的方式也是高权益弹性的表现。

国家系统演化进程中,特别是处于临界点时,政权能否把握涨落实现统一相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权的“策”。策略核心应该是展示权益弹性,表明政权有能力向更多国民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公共产品,从而赢取国民的信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信任感,有了信任才能使权力、制度、社会和政治机构持续运作^{[12] 2-3}。政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在维护掌权政党利益的同时,要让国民相信其政策或政策主张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未来能够提供给国民更多、更优、成本更低的公共服务,以更好地满足国民生存和生活的福利需求。这种信任应通过软硬两种策略在长期施政中建立。由于在未统一国家内存在两个以上的政权,每个政权都在采取类似的举措争取民心与向心力,因此政权要着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取得对其他政权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产品的形成取决于由政权“软实力”和“硬实力”构成的政权资源禀赋。未统一国家内不同政权控制的区域、人口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与阶段不同,因此资源禀赋不同,其在不同领域形成正负不一、程度不同的优势。政权资源禀赋较丰富的一方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的边界更高,但对每个政权而言采取比较优势策略都是效率最高的选择。比较优势在硬实力的政权应更多为国民提供经济上的充分就业、收入提高和国防上的安全,以获取国民尤其是对方管辖民众对自己的信任与支持;而在软实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政权则需要更多地宣扬其价值观、文化、政策及制度等,以获取民众认同。同样是吸收式统一的成功案例,德国更多是发挥软实力,而越南则更多依靠硬实力。政权不但要向民众展示权益弹性,同时要向竞争对手展示自己具有政权合并后合理安排双方权益的能力与诚意,使其认识到统一的成本低于分裂且收益更大。换言之,要通过正反馈机制向对手反复传达其坚持分裂必须付出远大于统一的代价的信号。二战后国家统一的成功案例中,坦桑尼亚与也门均采取了联合式统一方式,这显示政权处理权益弹性可以存在多种策略。

六、结 论

将复杂性科学的思维应用于国家统一问题的研究有五个特点:一是第三视角,跳出国家统一的博弈双方视角,从多层次系统的视角审视国家演化的客观规律;二是强解释力,可以利用系统演化原理解释国家统一与分裂过程中各种现象的深刻联系;三是非线性观,打破传统的单一因果关系的线性思维,强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涉外等领域之间的互相影响;四是自组织力,把

握国家系统演化的自发性，核心是通过正反馈机制自我走向稳定结构；五是不确定性，认识到事物演化过程中的大量随机性与偶然性，对国家演化规律持有限预测观。

国家是由个人及利益集团组成的多层级系统。国家版图的变动是国家系统的一种相变。国家系统演化动力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权益斗争。权益包括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的自由支配权、选择权和发展权。国家分裂的最根本原因是权益弹性小，而不是政治对立、经济差异、语言文化、民族宗教等表面现象。这些差异与分歧在高权益弹性的一个国家内部仍然可以存在和化解。国家统一的根本途径是通过系统的自组织功能为国家在高权益弹性下发生相变创造条件。在复杂性思维中，判断一个系统的相变有利与否必须从更高层级的系统去看，即要比较国家统一和分裂哪种形式对国际大系统有利。例如，中国国家系统进入稳定状态是统一还是分裂，需要跳出仅从台湾或大陆的单方面视角来权衡利弊的传统思维，不但要从两岸民众的福祉去判断，还要从亚太乃至人类社会的利弊去权衡。如果发展壮大的中国是维护世界繁荣稳定的积极力量，国家统一就是有益且必然的。否则，世界力量也会成为两岸统一的阻力。因此，对中国大陆而言，要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力量的崛起可以为多数国家和地区带来包容性增长，在中国的参与下世界可以呈现多样性繁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国际社会对中国信任程度的增加必然会降低两岸统一的阻力。趋利避害是任何一个系统演化时自然遵循的法则。任何一个系统的演化方向都要服从于更高层级系统的需要。一个统一有序、管理高效的多层级国家系统有利于国家系统功能涌现和提升，并且符合民众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同时一个负责任的统一国家对国际社会的繁荣稳定是有利的。因此，国家系统向统一演化，符合复杂系统趋于有序的演化方向，符合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

从实践来看，系统演化不是由单一变量线性决定发展方向，而是在系统环境的影响下，不同要素通过非线性作用形成系统的自组织，完成自身调节和演化以达到稳定有序的状态。自组织运行的核心是反馈机制。一旦两个变量之间形成正反馈，趋势化效应就会自我增强，形成推动系统演化的内生动力。这样的反馈机制在系统内外无处不在，并互相影响，不断发生非线性作用。对国家系统演化而言，有三组反馈机制最为重要：国家系统与国际大系统之间的反馈、政权子系统之间的反馈、政权内部的反馈。这三个正反馈机制有助于形成国家演化动力和创造统一条件。在开放、非平衡、涨落、非线性四个条件中，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国家系统因实力的不均衡发展不断向远离平衡的方向移动，最终会满足耗散结构条件，可以通过自组织功能恢复稳定有序的国家统一状态，完成从分治或分裂到统一的非平衡相变。

对中国国家系统演化而言，当前影响国家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国国家系统演化的方向选择：两岸统一还是两岸分裂。中国历史上的不同版图与不同制度都是中国国家系统不同的相。近现代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是产生台湾问题的主要外部因素，国共两党不同政治制度的道路选择分歧是产生台湾问题的最主要内部因素。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内战中失败的中国国民党则退守台湾保留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能否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共存或解决，是台湾问题的矛盾焦点。

按照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方式，系统演化并不是单一变量线性决定发展方向，而是在系统环境的影响下，不同要素通过非线性作用形成系统的自组织，完成自身调节和演化以达到稳定有序的状态。对国家系统演化而言，有三组反馈机制最为重要：国家系统与国际大系统之间的反馈、政权子系统之间的反馈、政权内部的反馈。两岸关系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台湾岛内政权和民意对统一的意愿反而减弱，其根本原因是多层次系统内形成了三个以“台湾独立”为指向的正反馈机制：在国际大系

统层次，中美关系越对抗，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越保守，解决台湾问题来自美国的阻力越大；在国家系统层次，台湾当局对统一后的自身权益越没有信心，政策越趋于保守，台湾当局自我设限会进一步扩大两岸实力差距，导致台湾当局对统一更加恐惧和抗拒；在台湾岛内子系统层次，台湾当局越是避统容“独”，进行“独化”教育，台湾民意越认为“独立”的正当性大于统一，靠选举上台的政党就更不敢轻言统一。这三组正反馈机制在非线性作用下会互相形成因果连接：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愈发不愿放弃以台制华的战略；台湾因此增加与大陆对抗信心，出台更多不利于两岸统一的政策和言论；台湾岛内民意受当局立场引导益加远离国家统一。产生这三组正反馈机制的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发生三件大事促成三组正反馈机制的形成：苏联解体使美国原来的“联中反苏”战略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基础；大陆与台湾的实力差距迅速拉开使台湾当局失去统一大陆的信心；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制度的施行使原本以国家统一为目标的国民党失去了长期“执政”的制度基础。

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是要让中国国家版图进入一个稳定的系统状态。国家版图的稳定状态就是被双方接受的有序的国家状态，而双方没有一致意见的国家分管则是相对无序的不稳定状态。中国国家系统正处于双方意见可能有根本性分歧的不稳定的分管状态。当前两岸子系统的政治现实是：中国对外最高权力是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但中国对内最高权力不是唯一的，台、澎、金、马地区与大陆地区分别由台湾当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际管辖，双方法律条文均声称对全中国具有统治权，因此两岸处于分管状态，但国家没有分裂。两岸双方以“九二共识”描述这种现状。大陆方面的最终政治目标是由当前的分管状态转为国家统一，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对如何实现全中国对内最高权力唯一化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为此提出了权益弹性极高、可以照顾各方利益的“一国两制”方案。然而，台湾方面没有接受该方案，也拒绝为此展开和平谈判。

通过人工优化来加速国家系统向统一方向演化，突破口在于构建具有更高权益弹性的国家制度。对中国大陆而言，对外要让世界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可以为多数国家和地区带来包容性增长，对内要让台湾感受到大陆尊重和保护台湾各阶层利益的诚意，增强台湾当局与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让高权益弹性的制度设计能够付诸实施。成功实施高权益弹性的制度需要一定的条件。创造条件的方式是通过制度创新重建系统内外的反馈机制，改变系统运行的方向。台湾问题的解决也许会通过非和平方式进行，也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先有一个微小的改变，然后形势逐步向某个方向发展，最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整个系统发生相变实际上是通过系统内部机制的自我运行自动完成的。后一种解决方式更具有系统演化的代表性。由于“大系统—系统—子系统”三级系统结构之间存在非线性作用，最好的做法是同时采取针对性政策，增强系统的反馈效应。在中美层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降低国家统一阻力；在两岸层面，建立良性互动，避免“西西弗斯陷阱”，形成奖统罚“独”的规则；在民意层面，建立社会公信，避免“塔西佗陷阱”，增强对民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政权与民意之间的信任通过正反馈机制被放大到相当程度后，大陆提出的和平统一方案就可能被台湾民众接受。

如果将中国国家系统的演化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看，从台湾问题的产生到两岸实现和平统一总体上需要经过三个主要阶段：争统一、争统“独”、谈统一。统一的背景是在国际势力的干预下两岸势均力敌，形成平衡对峙，两岸双方的目标都是争取国家统一，均在争夺以非和平或和平方式统一对方的主导权，其时台湾岛内的主流民意明显倾向国家统一，只是两岸的立场和实力在当时的

国际环境下都无法立即消除双方的政治对立。统“独”的背景是随着大陆综合实力持续增长，两岸原有的平衡对峙转为不平衡对峙，但大陆还不具备和平统一台湾的充分条件，两岸双方的目标变成大陆仍争取国家统一、台湾在统一大陆无望的情形下开始争取实质“独立”，此时台湾岛内的民意呈现要求维持现状且倾向“独立”的比重大增。两岸目前即处于这一阶段，大陆方面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以求降低对立、化解分歧，台湾方面则公开放弃国家统一目标。2016年以来，台湾岛内“台独”政党上台，“台独”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具有“台独”倾向民众的比例增加，台湾民众对国家统一呈现焦虑感和恐惧感等现象。这些都是两岸关系发展到该阶段的正常反应。谈统一的背景是大陆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对台湾取得压倒性优势，并具备足够强的影响力使国际势力不敢冒险对台湾问题进行武力干涉，两岸对峙最终被打破，形成“对称破缺”，双方都已看清中国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且和平统一有利于双方的自身发展，因此形成协商谈判的合作形势，此时台湾岛内的民意倾向于统一的比例重新超越主张“独立”的比例。台湾当局在岛内民意的压力下被动与大陆展开统一谈判，只为争取国家统一后获得较为有利的合作条件。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的内在推动力是大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及对台湾推动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政策。在大陆客观上实力日益强大及主观上对台湾同胞亲近友善的作用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台湾岛内民意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文选 [M]. 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1：4.
- [2] G. 尼科里斯, I. 普利高津. 探索复杂性 [M]. 罗久里, 陈奎宁, 译.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268.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9.
- [4] 黄英贤. 国家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 [J]. 中国社会科学，1984（4）：88-89.
- [5] 韩献栋. 分裂国家的统一：理论与实践 [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15.
- [6] 马克思主义著作选编 [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13.
- [7] Martin Carnoy,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vol. 1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84), pp. 104-107.
- [8]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 Martin Robertson Oxford, 1982.
- [9]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Gerth and Mills, *From Max Weber*, 78.
- [10] 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 1962, Chapter 9.
- [11] 理查德·拉克曼. 国家与权力 [M]. 郇菁, 张昕,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8-30.
- [12] 安东尼·奥罗姆. 政治社会学导论 [M]. 张华青, 何俊志, 孙嘉明, 等,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0-58.
- [13] A. D. Lindsay, *The Modern Democratic Stat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I, p. 245.
- [14] 安德鲁·海伍德. 政治学 [M]. 张立鹏,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98.
- [15] 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第11版 [M]. 李强,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526.
- [16] 迈克尔·曼. 社会权力的来源 [M]. 刘北成, 李少军,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22.
- [17] 约瑟夫·奈. 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 [M]. 马娟娟, 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41.
- [18] 哈肯. 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 [M]. 凌复华,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11.
- [19] 钱学森. 论系统工程 [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242.
- [20] 苗东升. 复杂性科学研究 [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143.
- [21] 普利高津. 从存在到演化 [M]. 曾庆宏, 严士健, 马本堃, 等,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2.
- [22] 托姆. 突变论：思想和应用 [M]. 周仲良,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06.

责任编辑：林华山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辩证思维

林子荣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智慧,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 以联系观点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阐明“台胞利益”“台湾前途”“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 以整体性的辩证思维把握两岸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做到历史地认识台湾问题; 其二, 以发展观点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 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 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和大势充满战略信心, 强调持之以恒地做好台湾人民工作; 其三, 以矛盾观点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 严守底线, 坚持“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 把握主流, 毫不动摇地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 把握共性, 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将心比心, 促进心灵契合。

关键词: 祖国统一; 对台工作; 唯物辩证法; 反分裂; 台湾问题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8) 04-0040-08

一、引言

恩格斯指出: “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 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点, 就是强调用科学思想方法去观察、思考、分析问题。辩证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最为强调、最注重运用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科学思想方法。他多次要求全党“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2]。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是唯物辩证法在新时代对台工作中的灵活运用, 为妥善应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探析习近平总书记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8.04.004

作者简介: 林子荣,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人员,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理论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 武汉大学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研究课题“新形势下高校港澳台侨生思想政治引导工作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08年以来大陆对台经贸政策在台湾的政经效应研究”(118-211000016)

引用格式: 林子荣.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4): 40-47.

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助力对台工作在新时代有新气象新作为。

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各项工作的部署和实践中所体现的辩证思维，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工作、宗教工作、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角度加以阐述。目前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所蕴含辩证思维的系统研究还付之阙如，相关学术观点只是散见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研究成果之中。例如，朱松岭从辩证统一的对台工作方法论以及两岸关系本质论、两岸关系道路论、两岸关系前途论等4个方面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3]。许小青、白纯从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一分为二以及以人为本原则等三个面向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4]。李振广指出，辩证处理核心利益和中国崛起大局的关系是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特征之一^[5]。李维一从整体和局部相互关系的角度就习近平民族复兴视野中的国家统一思想加以探讨^[6]。杨立宪则深入阐述了新时代开展对台工作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7]。以上成果对于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所蕴含的辩证思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目前相关工作依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并且存在一定的表层化问题。鉴此，本文专门对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加以探讨。

所谓辩证思维，指的是人们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是唯物辩证法在人们思维中的运用，是客观辩证法在思维中的反映。辩证思维最显著的特征是克服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强调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待一切事物的发展^[8]。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所蕴含的辩证思维，就是坚持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认识台湾问题，强调在对台工作中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

二、以联系观点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

联系范畴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范畴和逻辑起点。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现象、过程不是孤立存在的；整个物质世界就是由无数事物、现象、过程互相联系的统一体；任何事物、现象、过程都是这个统一体上的一个“环节”或“链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唯物辩证法，就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在实践中，他提出“要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这些重要论述突出强调了在具体工作中，要承认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处理好整体和部分、当前和长远、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新时代对台工作的决策部署亦充分体现普遍联系观点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阐明了“台胞利益”“台湾前途”“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的客观联系；其二，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国家发展的全局，以整体性的辩证思维把握两岸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其三，历史地认识台湾问题。

其一，台湾同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我们同属一个国家、同属一个民族从来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因为我们的血脉里流动

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血，我们的精神上坚守的都是中华民族的魂。”^[9]“两岸同胞虽然隔着一道海峡，但命运从来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民族强盛，是同胞共同之福；民族弱乱，是同胞共同之祸。”^[9]“中国梦与台湾前途息息相关。”^[10]这些论述从血缘关系、文化联结、历史维度、现实利益等面向点明了两岸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突出了台湾同胞身为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征程中的主体性：台湾同胞不是旁观者，而是“追梦者”、获益者。正是基于对两岸之间这种天然、客观、内在联系的正确认识和判断，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呼吁两岸同胞一道顺应历史大势、共担民族大义，“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不分地域，都参与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10]。

其二，从全民族发展的高度来把握两岸关系发展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以宏观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为特色的辩证思维。其实质就是一种全局性思维、战略性思维，即处理具体问题时要着眼于大局，解决眼前问题时要考虑长远。立足全局、着眼长远是新时代运用联系观的方法论指导对台工作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9]；“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11]。这些论述一方面把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对台工作目标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去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把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和推进。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12]。这是从长远的角度思考祖国统一问题，以面向未来的视野审视当前的对台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其三，历史地认识台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3]重视学习借鉴历史经验，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是基于对台湾问题历史经纬的深入体察研究，是在总结历史规律和两岸关系发展经验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述，具有广阔的历史纵深感。在谈到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时，他说：“不论是几百年前跨越‘黑水沟’到台湾‘讨生活’，还是几十年前迁徙到台湾，广大台湾同胞都是我们的骨肉天亲。”^[10]在谈到台湾同胞的历史遭遇时，他说：“在日本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从未停止抗争，数十万台湾同胞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全面抗战爆发后，台湾同胞积极参加和支援大陆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14]这些论述高度评价了台湾同胞爱国爱乡所展现的民族精神。正是基于对台湾同胞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史、屈辱史的充分了解，他指出：“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特定的心态，包括特殊的历史悲情心结，有着强烈的当家作主‘出头天’的意识，珍视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希望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10]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以民族情怀理解台湾历史，进而把握两岸关系现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以历史关照现实。这是以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为指导，历史地、辩证地分析现实问题的生动案例。

三、以发展观点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论域里，辩证法就是发展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不仅是普遍联系的，而且是运动发展的，是过程的集合体。发展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同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因此，

辩证思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事物和思考问题。“我们党是站在时代前列、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总是坚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1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求实效、谋长远，求的不仅是一时之效，更有意义的是求得长远之效。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要放胆去做，当前不见效、长远打基础的事也要努力去做。”^[16]在谈到历史、现实与未来三者的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10]这些论述都深刻阐释了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以发展观点为指导，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同样坚持以发展观点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

其一，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和大势充满战略自信。唯物辩证法肯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前进、上升的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的上升、前进是绝对的、直线式的。由于新旧事物的利害冲突及旧事物对新事物的压制，使得发展成为包含着局部的或者暂时的倒退、停滞在内的曲折前进的运动。因此，辩证思维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思维方法，展示的是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习近平总书记清楚指明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稳定，经得起风浪考验。两岸关系风风雨雨几十年，总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这是历史的必然。”^[17]他强调，“坚持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前途”，“看到时代发展、民族振兴大趋势，摆脱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束缚”^[18]。正是基于对两岸关系发展大势的充分认识，面对“台独”政党在岛内赢得全面“执政”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央对台的大政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不会因台湾政局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要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持之以恒地做好台湾人民工作。这些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战略思维高度和深度。

其二，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陆各领域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具有对台湾的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同时也大大缩小了与美国力量对比的差距。由此，大陆对两岸关系大局的主导权大为增强，两岸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具有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从根本上说，两岸关系发展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都奠基于大陆的发展进步。正是在总结历史规律和两岸关系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在发展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的科学论断。他指出：“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因此，我们要保持自身发展势头，同时要采取正确政策措施做好台湾工作。”^[19]这一战略思想是坚持用发展眼光看待台湾问题的具体体现。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只有充分把握在发展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才能强化保持战略定力的主体自觉，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此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强调坚持党对对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建设一支对党忠诚、业务专精、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对台工作队伍。这也是从内因着手，提升对台工作水平的具体实践。

其三，持之以恒地做好台湾人民工作。量变、质变是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二者统一于事物发展过程之中。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没有量的积累，便没有质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谈统战工作时指出：“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难做？应该就是争取人心了。”人心无比宝贵，人心也无比难得，“得土地易，得人心难”^[20]。争取人心的工作需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量的积累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统战工作不是快餐，是功夫菜，要像做佛跳墙，慢慢炖。必须绵绵用力、润物无声，锲而不舍、久久

为功。“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新时代的对台工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价值观和方法论^[7]。在谈到化解两岸政治分歧以及做好台湾人民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的很多问题，解决起来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只要谈着就有希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0]“熨平心里创伤需要亲情，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真情，我们有耐心，更有信心。”^[10]这些论述充分显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争取台湾人心所需要的“量的积累”有战略耐心，对于最终化解台湾同胞的心结、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质的飞跃”有战略自信。正因为抱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开展对台工作要注重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思想。以融合发展促进两岸民众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最终达成“心灵契合”。这会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但在融合发展过程中，通过两岸间大量的人、事、物等元素的流动、整合，逐步化解心结、缩小分歧、弱化矛盾，形成共同利益联结，能够更加稳固地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为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and 创造条件。

四、以矛盾观点认识和分析台湾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这句话清楚地阐明了辩证思维能力的科学内涵及其基本要求。辩证思维首先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分析问题时必须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正视矛盾的客观存在，然后对矛盾进行客观分析，揭示矛盾的内在规律性，即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两分法”。其次，要善于抓关键、找准重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这些论述点明了实际工作中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两岸关系错综复杂，是一个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矛盾系统。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伴随着两岸关系发展过程，推动两岸关系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贯穿着矛盾分析法，坚持用矛盾的观点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

其一，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台独’分裂势力并未善罢甘休，仍在竭力煽动两岸敌意和对立，阻挠两岸交流合作，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现实威胁。”^[12]基于这个客观判断，针对“台独”势力的侥幸心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把握两岸关系大局，最根本的、最核心的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核心利益，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必须继续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主张和活动，不能有任何妥协”^[18]。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六个任何”。这一系列论述都明确地表达我们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鲜明立场以及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在事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会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始终坚持把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政党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只要做到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都不会存在障碍。”^[19]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严守底线、抓住重点、把握关键，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展现出坚定的原则性，对于争取两岸和平统一前景表现出高度机动的灵活性。

其二，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它的历史也有其特殊性。如果只强调共同性，而忽略其特殊性，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台湾的历史，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台湾的现实^[21]。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实事求是地看待台湾的历史、台湾同胞的心态以及台湾同胞较为特殊的历史情结。他指出：“我们理解台湾同胞因特殊历史遭遇和不同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心态，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愿意用真诚、善意、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12]正是有了这份理解和同情，他才动情地指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关于“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实现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三个充分”，即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这三个充分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必须指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所追求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达成这一目标是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这需要通过两岸双方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实现。他指出：“台湾同胞也需要更多了解和理解大陆 13 亿同胞的感受和心态，尊重大陆同胞的选择和追求。”^[12]

其三，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坚持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既要高度重视矛盾的特殊性，又要充分认识矛盾的普遍性，既要正视矛盾的对立性，又要注意矛盾的统一性，要善于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由于近代以来两岸历史道路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两岸同胞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存在某些差异。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大、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两岸同胞都是中华文化的传人，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在两岸同胞内心深处，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积极的建构性角度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建设、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将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既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不断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凝聚携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又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资源，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打造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同化力的价值观体系，努力使话语主导权向国际范围延伸，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可，从而增强台湾地区民众对祖国大陆的价值认同。

其四，毫不动摇地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唯物辩证法认为，看问题既要全面，又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既要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又不能忽略支流。2016 年，民进党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及民意代表两项选举，在岛内首次实现全面“执政”。民进党重新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放任纵容“去中国化”“渐进台独”，台湾岛内社会政治生态持续“绿化”，各种“急独”势力动作频频，外部干扰因素明显增多。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台海形势将更加复杂严峻。对此，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保持高度警觉，积极防范、有效应对台海重大风险。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维护和发展两岸关系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民进党重新“执政”后的倒行逆施遭到台湾各界同胞的强烈反对，要求当局调整两岸政策、重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轨的呼声高涨^[2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顺应历史潮流作出的共同选择”，“我们将毫不动摇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17]。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新时代对台工作的主

要任务明确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这些论述明确了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分清了主流和支流。正是基于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及台湾岛内主流民意的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基本路径和具体措施，强调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五、结 语

思路决定出路，思维决定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辩证思维基础，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发展观和矛盾观，充分展现了思想理论高度、观察视野广度、战略思维深度以及话语体系温度，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系统性的理论品格，表明我们党对于台湾问题的认知更加成熟。

明晰台湾前途、台胞福祉、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四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所蕴含辩证思维的逻辑起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必然；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台湾同胞的福祉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强盛，台湾前途系于国家统一。因此，两岸同胞都是民族复兴的参与者、推动者、获益者，都应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而共同奋斗。“台独”分裂势力无视这一客观联系，甚至试图割裂这一客观联系，损害了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一股逆流，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构成最大现实威胁。“台独”分裂势力违背联系客观性是其永远不能得逞的哲学解释，也是我们必须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哲学依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视野下，新时代的对台工作既要立足于大局，处理好整体和部分的联系，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严守底线，抓住重点，把握关键，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既要登高望远，分清主流、支流，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和大势抱有战略信心，又要主动作为，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耐心细致、持之以恒地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既要加快自身发展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政策话语在台湾岛内的感染力、吸引力和同化力，又要密切关注影响中国统一与民族复兴的外部因素，防止外部势力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联系、发展、矛盾统一于事物运动发展的过程中。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需要综合运用辩证法三大基本观点，全面地加以理解和把握。

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台海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的背景下，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有助于我们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 and 战略耐心，引导我们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界、更大的格局推进新时代对台工作，避免出现思维与行为的片面性、狭隘性和极端性。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67.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01-25（1）.
- [3] 朱松岭.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初探[J].现代台湾研究，2017（6）：1-7.

- [4] 许小青,白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视域下两岸关系治理原则研究——以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为遵循[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6):9-13.
- [5] 李振广.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特征研究[J].两岸关系,2017(8):18-20.
- [6] 李维一,陈星.习近平民族复兴视野中的国家统一思想[J].两岸关系,2017(9):7-9.
- [7] 杨立宪.以人民为中心开展新时代对台工作[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1):33-39.
- [8] 齐卫平.辩证思维能力与党的建设科学化[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46-52.
- [9]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10 次会见台湾各界代表都说了啥?[EB/OL].(2015-05-04)[2018-05-20]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6945030>.
- [10] 吴亚明.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连战一行[N].人民日报,2014-02-19(1).
-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1).
- [12] 吴亚明.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N].人民日报,2014-09-27(1).
-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14] 吴储岐.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各界代表人士[N].人民日报,2015-09-02(1).
- [15] 十五大以来重大文献选编: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48.
- [16]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出版社,2007:86.
- [17] 王尧.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宋楚瑜一行[N].人民日报,2014-05-08(1).
- [18] 吴亚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N].人民日报,2013-06-14(1).
- [19]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强调 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俞正声参加看望和讨论[N].人民日报,2015-03-05(1).
- [20] 魏晓东.把“争取人心”的工作做得更好[EB/OL].(2016-06-06)[2018-05-20].<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606/c49150-28413467.html>.
- [21] 陈孔立.台湾历史与两岸关系[M].北京:台海出版社,1999.
- [22] 中共中央台办理论学习中心组.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引领新时代对台工作[EB/OL].(2017-10-17)[2018-05-20].<http://tw.people.com.cn/n1/2018/0315/c14657-29870092.html>.

责任编辑:林华山

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新发展

贺善侃

(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进入新时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开辟了新境界,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作出新贡献。其实践的新贡献集中体现在制度建设上的重大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继承了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相结合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了新的开拓。新时代要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法治化道路,更深入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其政治优势,承担好协商治国的新使命。

关键词: 新时代;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社会协商; 政治协商; 协商治国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8) 04-0048-1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开辟了新境界,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不断取得新发展。

一、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新拓展

(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的正式提出及其内涵的新拓展

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从基层到国家层面,从治理到决策环节,存在着丰富的、宝贵的协商民主经验。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对科学民主决策、公民政治参与、社会治理和法制建设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概念,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从概念的演变过程看,经历了从“协商”“民主协商”“政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转化。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8.04.005

作者简介: 贺善侃,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统战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引用格式: 贺善侃. 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新发展[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4): 48-57.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团结社会各界参与革命斗争，一贯主张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将大多数人都纳入革命队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与党派合作的道路，在边区民主政权建设中容纳各方，实行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制度，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三三制”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权建设上的一种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形式显然是协商民主理念和制度的一种实践形式。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毛泽东于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1]。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纪念五一口号，其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召开。这次会议在中国创造了一种联合各党派与各社会组织、团体等进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等的民主形式。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多党合作制度”）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民主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在多党合作制度的探索实践中，“协商”“民主协商”“政治协商”等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献以及党的领导人讲话中。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根据中国阶级状况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明确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协商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但明确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势，确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理论政策，包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等。在实施多党合作制度过程中，“协商”“民主协商”概念被广泛运用。例如：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同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外人士座谈时讲到：“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1975年5月，中央统战部组织一批爱国人士外出参观，周恩来在其请示报告中批示：“此类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1989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规定中共同民主党派协商的第一种形式就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但“民主协商”不同于“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把“民主协商”上升到制度层面的产物。从“民主协商”到“协商民主”，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认识上的升华。“协商民主”理念的逐步明朗化，是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同步的。1991年3月，江泽民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3]的概念。这一概念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7年11月，《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4]这是在政府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协商民主”这一概念。201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这是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协商民主”这一概念。

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是从1949年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步的。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没有独霸政权,而是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共商国是,采用政治协商的形式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通过“协商+选举”的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基础上确立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而实施以协商民主为主要特色的统一战线是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是统一战线的一大贡献。正是在长期民主协商和政治协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首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概念。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5]。“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的正式提出及其内涵的明确规定,把协商民主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是在实质上提升到了新境界,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定性为一种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这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层面回答了民主协商的领导力量、协商主体、协商客体、协商目的等问题。实施协商民主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种协商民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民主。这是党的十八大给协商民主的全新定位。二是在外延上有了新拓展。党的十八大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做出了新的概括。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概括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形成了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相结合的、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新思考和新要求,主张“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6]。报告专门强调“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中“加强议事协商”^{[6]27}。显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政治协商的形式、渠道、主体与范围,意在通过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的对接,构建更加广泛的协商民主渠道、制度与机制。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架构中,人大有协商,政府有协商,政协有协商,党派团体有协商,基层也有协商。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重大判断的提出及其功能的新拓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判断。我们要全面认识这一重大判断。

首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不是“舶来品”,而是内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7]诚然,协商民主是西方政治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美国政

治哲学家罗尔斯、英国社会政治理论家吉登斯、德国社会思想家哈贝马斯等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就协商民主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协商”或“公共协商”是协商民主的核心概念。在英语与德语语境中，“deliberative”一词的基本含义为对话、讨论、审议。一般认为，协商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其含义包括思考、沟通、对话、交流、讨论等。然而，在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始终仅仅是理论探讨，而且遭到多方质疑。西方许多现实主义民主理论批评家认为，协商理想与现存民主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家甚至认为协商民主观念是不真实、不可行的。因此，协商民主在西方未能付诸实施。而在我国，协商民主早已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主形式得到了发扬光大，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具有独特优势。这种独特优势集中在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五个可以”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民主，一是“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二是“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三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四是“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五是“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克服了五个方面的弊端，包括：“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所在”^[7]。

“五个可以”是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功能的首次全面系统的概括。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有密切关系。中国实行的是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并不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都是法定的。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本质区别所在。我国的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党，它与西方国家一般理解的政党有很大不同。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一个参加、三个参与”：“一个参加”即参加国家政权；“三个参与”分别是参与重要方针政策、重要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是民主党派履行职能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为何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用三个“新”字作出精准概括：一是“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二是“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三是“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新”意味着统一和团结，意味着力量和希望。这三个“新”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重大判断的提出及其定性的新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

的重要体现这一基本定性。”^[7]

首先，党的群众路线是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了我党必须拜人民群众为师，视人民群众为主人，有事必须跟人民群众多商量。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8]，“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9]。周恩来说：“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10]贯彻群众路线，必须遇事多与群众商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7] 295}

其次，“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7] 29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7] 297}协商民主能够提供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

再次，党的群众路线是发挥好协商民主功能的最好途径。协商的过程也是利益整合的过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平衡社会利益”的重大命题，协商民主为平衡、整合各方面社会利益提供了制度性平台。而要发挥好协商民主这一制度性平台作用，就必须遵循人民当家作主原则，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集思广益，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好”，在全社会和地方等不同层次上对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进行协商，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新贡献

协商民主的深入发展离不开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新贡献集中体现在制度建设上的重大创新。

（一）通过明确协商民主的基本原则、协商渠道和协商程度，积极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

首先，《意见》提出协商民主“六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依法有序、积极稳妥”，“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坚持广泛参与、多元多层”，“坚持求同存异、理性包容”^{[5] 293}。其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相一致。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与协商民主的基本含义相一致。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展的过程。其理论发展到现在，协商民主的概念大致包括三方面内涵：作为政府形式的协商民主、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和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发展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是承认社会的多元性；协商过程尊重程序，视政治合法性来源于决策形成的程序、出于参与者的意愿、基于集体的理性反思。把协商民主贯穿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过程中，正符合协商民主的本意。

“坚持广泛参与、多元多层”和“坚持求同存异、理性包容”与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不同利益主体的差异和分歧，适应社会的多元化，以实现社会利益整合

的现实需要。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对培育民主的主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其一，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有利于培育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共道德精神，如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对人与人之间需求和道德利益的尊重和平等意识。其二，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有利于培育健康民主所必需的集体责任感。协商民主重视每一个公民的需求和利益，也强调每一个公民的政治责任，把政治责任作为促进民主、繁荣社会的前提。其三，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有利于培育健康民主所必需的沟通与理解、包容与合作精神，并以此促成各利益主体间的深层次理解和相互信任感。协商民主强调平等、参与、责任和公共理性。总之，这“六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了协商民主基本精神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统一，为协商民主制度创新提供了指导思想。

其次，《意见》提出了协商民主的七个具体渠道：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这是在我们党对协商民主长期探索的基础上第一次对协商民主渠道的系统概括。《意见》基于党的十八大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新要求，明确了协商民主的具体渠道；并针对目前各方面协商渠道发展的不平衡，提出了不同要求：“继续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发挥各协商渠道自身优势，做好衔接配合，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5] 293}。

再次，《意见》提出规范协商程序的五大步骤。《意见》指出：要“从实际出发，按照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简便易行、民主集中的要求，制定协商计划、明确协商议题和内容、确定协商人员、开展协商活动、注重协商成果运用反馈，确保协商活动有序务实高效”^{[5] 293}。这就明确了开展协商民主活动的计划、目的、内容、参与主体、步骤，以及实效检验、监督落实等环节，以确保协商民主的有效开展、效果“落地”。这是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切实保障。

（二）提出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使命，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协完成了协商建国的辉煌使命。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使命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协商治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人民政协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建言献策，作出了新的积极贡献。

首先，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中具有强大的传统政治优势。这种优势足以使人民政协成为专门协商机构，胜任协商治国的新使命。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民政协以界别组成为特色，有比较完善的组织系统，有巨大覆盖面的层级架构，可以为构建中国协商民主体系提供基础性的组织准备。二是人民政协有丰富的协商民主经验，可以为在党的领导下、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提供有力的经验支持。三是人民政协有比较成熟的协商议事规则，有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可以为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四是人民政协继承和秉持协商文化的优良传统，适应时代发展新要求，形成了平等、宽容、友善的协商民主精神，可以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重要的精神引领。

其次，人民政协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为承担协商治国的新使命创造了有利条件。人民

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作为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机构的性质定位，代表性强、联系面广、包容性大，在联系群众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人民政协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出实招、谋良策，使党和国家的决策和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合乎实际。二是积极宣传改革发展的大政方针，引导所联系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发展，正确对待新形势下改革发展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为改革发展添助力、增合力。三是敢于讲真话、讲诤言，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勇于提出建议和批评，帮助查找不足、解决问题，推动各项改革发展举措落到实处。

再次，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人民政协“要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以改革思维、创新理念、务实举措大力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努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坚持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有效组织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共商国是，推动实现广泛有效的人民民主”^[11]。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人民政协服务改革发展的总要求。发挥好人民政协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和发展协商民主的平台作用，归根到底是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朝着广泛多层制度化方向发展，取得了空前成效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方向发展，是党的十八大做出的战略部署。围绕这一战略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协商民主的长远发展作了战略性设计，形成了作用实在、全方位、多样化、全国上下联动的协商民主大格局。这一大格局的特点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应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因此，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7] 297}

首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这就是说，协商民主要成为真正有效、管用的民主形式，做到“真协商”。要从制度上保障协商的渠道、方式，保障协商有效开展，保障协商成果切实“落地”。协商议题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真正做实。如全国政协创建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优化参与构成，合理确定议题，强化讨论交流，参会委员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为主，选择切口小、社会关注度高的具体问题议深议透，已成为政协协商民主经常性平台和重要品牌。

其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这就是说，要形成全方位、多样化的协商民主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政协通过实地调研检查，推广经验，查找不足，改进工作，进一步完善以全体会议为龙头，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和专题协商会为重点，以双周协商座谈会、对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等为常态的协商议政格局；强化政协民主监督职能，发挥协商式监督特色优势，重点监督党和国家重大改革举措、重要决策部署贯彻执行情况，通过调研考察发现问题、围绕履责不力提出批评、针对存在不足督促改进；把重点监督性议题纳入年度协商计划，寓监督于会议、视察、提案、专题调研、大会发言、社情民意信息等工作之中，做到监督有计划、有题目、有载体、有成效。

再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这就是

说，协商民主必须在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各个层次上全面展开。党的十三大已经提出了民主协商“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基层三个不同层次上展开”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四个涉及”“四个广泛商量”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7] 295}这就明确把协商民主的客体分为全体人民、部分群众和特定群众以及基层群众四个层次。协商客体的分类更为清晰、具体，有利于发展多层次的协商民主。

三、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继承了把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相结合的思想，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认识和提法有了新的开拓。一是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2]这个提法是第一次写入党代会报告，体现了我们党对协商民主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二是报告在重申“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12]，对协商的范围和形式有了新的拓展。三是报告对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12]四是报告强调了人民政协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工作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完善协商议政内容和形式，着力增进共识、促进团结。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重点监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增强人民政协界别的代表性，加强委员队伍建设。”^[12]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要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法治化道路

首先，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走法治化道路。这是因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全面依法治国视阈下的协商民主。以法治为内核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完整性要求和以民主为内核的协商民主的完整性要求，共同决定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法治化特色。一方面，以法治为内核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完整性要求不仅涵盖法治理论上的完整性，而且涵盖法治实践上的全社会覆盖性。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协商民主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从法治体系的构建高度提出协商民主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在完整的法治框架下进行，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体现民主理念的协商民主不具有法治那样的直接的强制性要求，民主相对于法治具有更多的诉求性，缺乏强制力。因此，协商民主在其运行过程中必须得到法治的保障，这就是民主对法治需求的必然性。以法治的强制力确保民主制度的常态化运行，对违反民主制度的行为通过法治的强制力予以限制与制约，最大限度地维护民主的权威性、有效性。这是协商民主的完整性要求。简而言之，全面依法治国对协商民主的基础和保障作用，表现为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主导的法治基础作用和以协商民主所需求的法

治保障作用。

（二）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实行制度化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各具体协商民主渠道的具体制度建设；二是不同协商民主渠道之间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建设；三是协商制度与既有政治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对接的制度建设。

首先是各具体协商民主渠道的具体制度建设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七大渠道”：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围绕各协商渠道建设，中共中央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在具体协商制度的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这些意见为各协商民主渠道具体制度的创新和“落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而，其他四个渠道的具体意见至今还未出台。从实际协商制度落实情况而言，人民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成效最为显著，人大协商和政府协商次之，政党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相对较弱。人民政协和基层恰恰处于公共权力结构的边缘，分别处于横向权力结构的边缘和纵向权力结构的边缘。而处于公共权力结构核心地位、拥有较大公共权力的人大和政府的协商民主制度创新和落实恰恰较弱。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突破的短板，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其次是不同协商民主渠道之间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协商制度与既有政治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对接的制度建设问题。不同协商民主渠道之间相互衔接的宗旨是要建成一个“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按协商领域分类，七大协商民主渠道可分为国家领域和社会领域；按协商性质分类，七大协商民主渠道可分为决策协商和咨询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属于国家领域的决策型协商。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则属于国家领域的咨询型协商。它们的协商过程不是决策过程，只是为党委、人大、政府提供咨询型意见。基层协商属于社会领域的决策型协商。社会组织协商属于社会领域的咨询型协商。我国协商民主的最重要短板在于社会组织协商，原因是公共领域发育不充分。在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少、自主程度和协商意愿不足，协商能力有待提高。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对规范的协商流程、规则和方法还不熟悉，组织或参与协商的能力不强，从而导致协商往往流于形式，难以真正发挥实效。从社会组织已经开展的协商活动看，与自身事务相关的协商较多，关于公共事务的协商较少。在协商制度与既有政治制度的对接上，较弱的也是社会组织协商与既有政治制度的对接。这是因为，在七大协商渠道中，只有社会组织协商处于既有政治制度之外，容易发生双方“断裂”。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组织在与既有政治制度的对接方面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但还未上升到系统性制度层面。

鉴于上述情况，强化社会组织协商，弥补公共领域社会协商的短板，迫在眉睫。社会组织协商具有协商范围的广泛性和协商内容的丰富性等特点。从范围上看，社会组织协商可以超越从国家到基层各个层面，具有纵向贯通的特点；可以遍布社会每个角落，具有横向弥散的特点。完善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并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协商与其他协商渠道、既有政治制度衔接的制度体系，发挥好社会组织协商的作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极为重要。

（三）人民政协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承担好协商治国的新使命

虽然协商民主的渠道是多样的，但专门的协商机构只有一个，就是人民政协。人民政协在发展

协商民主中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5]“人民政协要发挥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5] 70}

落实新时代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要求，一要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二要拓展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建立健全协商议题提出、活动组织、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更加灵活、更为经常地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三要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提高协商实效；四要努力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五要配合支持其他协商渠道，共同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体系。诚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大发展，单靠人民政协是不行的，但离开了人民政协更是不行的。新时代的人民政协应当有更大的作为。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7．
-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49．
- [3]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06．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政党制度[N]．人民日报，2007-11-16（15）．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91．
- [6]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6．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3-294．
- [8]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6．
-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8．
- [10]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4．
- [1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2）．
-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8．

责任编辑：孙德魁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及提升路径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钱再见

(南京师范大学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实现机制。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的基础工程是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的客观必然要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要抓住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 包括成员发展环节、教育培训环节和协调落实环节, 重在不断增强民主监督能力提升的实效性。

关键词: 民主党派; 民主监督; 参政党; 国家治理; 统一战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8) 04-0058-10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 而政党的发展和政党制度的形成又被认为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的组织原则和重要标志, 不论其“是民主的重要工具还是独裁和压迫的根源, 它们都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机构与社会内部团体和利益之间必不可少的纽带”^[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 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 在国家的民主治理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政治职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各民主党派是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充分发挥着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基本职能。其中民主党派所履行的民主监督职能, 既是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一环,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不可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8.04.006

作者简介: 钱再见, 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院长,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路径研究”(13BZZ032),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政务诚信建设研究”(17ZZA002),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委托项目“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研究”(17TZB007)

引用格式: 钱再见.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及提升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4): 58-69.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发挥的效能，不但取决于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民主发展程度，也与党派监督机制的完善、监督意识和监督技能不断提升的训练机制密切相关^[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对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加清晰的目标定位和评价标准，而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的提升是其自身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国家治理中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

学术界有观点认为，参政党监督能力是指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依法履行政治职责，在政党层次上开展民主监督的一种本领，是参政党综合能力的体现。具体说来，它主要包括政治把握力、学习研究力和监督执行力^[3]。也有观点认为，民主监督关键在于政策监督，在于民主党派政策能力的高下^[4]。还有观点认为，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建设，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是前提，执政党的支持是关键环节，并且要在社会创造有利于监督的民主氛围，为民主监督能力建设提供环境支持^[5]。笔者认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是指民主党派围绕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以及党委依法执政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提意见、作批评和提建议的实力、效力和影响力。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是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核心能力，是其作为政党存在的核心支撑。

（一）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既借鉴了治理理论中的先进理念，又结合我国多年来的治理经验和教训，对国家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管理国家的各项制度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其实质是国家一切公共权力及其运行过程的法治化、民主化、透明化和责任性。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6]。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体制机制的优化和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特别是协同能力的提升。其中，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疑是重要的治理主体之一，在国家治理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同时，还要在党际监督中履行好民主监督的职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也就必然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为统一战线平台和机制下的政党监督，服务于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的根本职能，表现为“在合作中监督、在监督中合作”意义上的政治监督，是一种新型政党关系中的党际监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提升始终要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中心、突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

（二）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也就是说，一切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必然要依法受到监督和制约。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政党之间相互监督的实质就是对权力及其运行过程的监督和制约。坚持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多党合作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中国共

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要求。只有不断健全监督体系,把公共权力置于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之下,国家政权才能不断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能够永葆生机与活力。民主党派监督是中国式的“异体”监督。民主党派监督范围的外延性是对共产党党内监督有限性的补充,民主党派监督手段的民主性是对共产党党内监督强制性的补充,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全程性是对共产党党内监督预防性的补充^[7]。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为当代民主制度表现形式的政党政治的一种具体设置,其监督的范围和对象较之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更为广泛^[8]。从实质上讲,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是对执政党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支持。各民主党派反映的都是人民群众的意见。有了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就会使党在制定各项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各项重大工作时能够集思广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要加强对民主党派优良传统的继承、弘扬,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制度,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新时代有新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实行全面的政治领导,是国家大政方针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的执政能力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如果缺乏对执政党的监督,可能会导致公共权力滥用和公共决策失误,进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因此,切实提高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充分发挥和加强民主党派监督职能,不仅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且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既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增强民主意识,发扬民主作风,接受人民监督,也离不开作为我国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更需要切实增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能力。实践证明,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有助于加强和改善中共的领导,提高中共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三) 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是国家治理民主化和责任政治的内生要求

古往今来,如何实现对于权力的监督始终都是治国理政的核心议题。“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9]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人民主权原则意味着人民有权监督执政党和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和状态,而这种监督是通过政党政治实现的。人民通过结社组成不同的政党,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活动,而政党监督就是政党的活动之一。在西方,政党监督能够有效监督执政党对权力的行使,而且是一种重要的防范权力腐败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不少腐败案件的揭露,往往都有政党监督的背景。同一般公众的监督不同,政党监督是一种有组织、规模化的监督。相比于公众的个人监督,它具有专业性、组织性、持续性和广泛性的特点^[10]。从历史的眼光看,政党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是现代民主政体的标志,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性是一切政党的当然属性和宝贵资源。政党的民主性从内外两方面表现出来。政党内部的民主性是指它要充分保障全体党员的民主权利。政党外部的民主性是指它能够综合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保障契约精神、公共理性、民主诉求、主体性精神的实现。政党外部的民主性即其公共性。对执政党而言,政党外部的民主性尤为重要。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公共权力机关只有与社会及公民进行有效的互动,把公众合理的民主诉求有效地上升为国家意志和转变为政策、法律,做出的决策才能代表民意,才能获得坚实的执政根基。执政党的民主性、公共性是与执政党的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11]。责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国家公务人员与人民之间有一个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被授权者不仅应该依法行使职权,而且必须对授权者负责,对自己行使的职权承担相应的责任。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赋予各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习近平指出,多党合作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因此,

要探索有效形式，从制度上保障和完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职能。习近平强调：“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民主党派“五种能力”建设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民主监督能力，但是都与其联系密切、直接相关。在这“五种能力”中，政治把握能力是科学判断形势变化和准确把握发展方向的能力，包括政治鉴别力、敏感性和坚定性，是民主党派自身能力建设的基础和政治素质的基本要求。坚持把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民主党派要紧紧围绕中共各级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通过听民声、察民情、听民意、解民难，建实用之言，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切实把自身的能力和智力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成果；在合作共事过程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找准坐标，摆正位置，主动融入集体领导之中，不当“局外人”，善于与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互相监督、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协同工作；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民主党派组织领导能力的重要性；要通过自我纯洁、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提升民主党派自我化解各种矛盾的能力。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通过民主协商为党政部门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咨询建议。因此，加强民主党派政策建议能力建设，提升自身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实效性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议程。

二、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的基础工程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主党派需要在国家治理进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政党意识，即民主党派组织及其成员对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任务、政治地位和历史责任的自我认知。可以说，作为现代政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的第一意识，政党意识是政党存在的主观前提，也是政党不断提升能力，进而充分发挥功能的现实条件^[12]。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不仅要有主动监督、敢于监督的意识和勇气，还要有善于监督的意识、能力和方法。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动机是促进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是坚持、巩固和完善中共的领导，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以说，爱国、爱民、爱党之心是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原动力。民主党派进步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及其日益扩大的团结面、联系面、代表面是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基础与后盾。民主党派成员所掌握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器和各方面的专业科学知识是其不断提升民主监督能力和提高民主监督实效性的巨大力量。然而现实中，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尚不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有观点认为，从党派建设来说，各民主党派多年来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参政能力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客观地说，其在民主监督能力建设方面不但没有取得突出成就，相反倒有下降趋势。民主监督能力建设的落后不但导致民主党派在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方面的弱化，而且影响到其他方面建设的进展和职能的发挥。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大力加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能力建设^[13]。

诚然，民主党派成员大多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但是民主党派成员个人的专业背景和专家经历反而会影响到其民主监督能力的提升。以赛亚·柏林受到古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斯“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说法的启发，提出：“刺猬”型的人凡事归系于某一单一的“中心识见”，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狐狸”型的人则追逐许多目的，其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的，其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14]。菲利普·E·泰特洛克进一步详细分析了“狐狸”型与“刺猬”型专家在做判断时的区别和优劣，并且指出“狐狸”型专

家在太多的话题上犯了太多的错误^[15]。不仅如此,民主党派成员中的不少人因缺乏从政经验,社会活动经历少,有时其专业结构反而使其在一些方面具有局限性,最终不利于其民主监督能力和效果的提升。同时,民主党派成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对民主监督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对政府的实际运作情况和经济运行情况知情不多,影响了民主监督的效果。民主党派成员中的“监督无用论”观念影响了其民主监督意识和能力的提升。中共各级党委在自觉自愿接受民主监督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这在客观上造成“监督无用论”观念的形成,使民主监督意识和能力难以得到提升。而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阻碍了民主党派成员民主监督能力的提升,突出地表现为民主党派组织和成员的知情渠道有限,具体操作规程和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

实际上,在多党合作制度中,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不是竞争性党际监督,而是合作性党际监督。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目标,就是把本党建设成为与中共亲密合作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围绕实现这一目标,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包含三大主题:一是始终不渝坚持民主党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始终不渝坚持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定位,切实发挥参政党功能;三是始终不渝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力加强参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履行职能的能力和水平,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实际贡献^[16]。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是民主监督能力建设的前提和保证。在参政党自身建设中,思想政治建设是核心和首要任务,组织建设是基础,制度建设是关键。实际上,三者皆为参政党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民主党派要适应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新形势、新标准和新要求,必须进一步强基固本,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民主监督的能力和水平。

(一) 以思想建设为核心, 不断提高民主党派的政治责任感

国家治理需要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实现不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而民主党派拥有的广泛性和进步性优势,是其通过民主监督维护政治合法性和促进民主治理的重要基础。在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进程中,中共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领导核心。众所周知,国家治理强调分权、放权和多元共治,但是在“元治理”即“对治理的治理”的条件下,国家治理也强调执政党和政府在制定规则体系与规范多元治理主体行为过程中的权威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一种政治监督,是维护国体、政体的政治责任,其目的是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提高政府施政合法性、实效性和公信力。2016年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要完善民主监督,加强对重大改革举措、重要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等的监督,促进相关工作。”“人心向背、力量对比决定事业成败。我们提出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就是着眼于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中国共产党要发挥领导作用,各方面成员要共同使劲。”在国家治理中,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建设需要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因此,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从理论上提高和加深对参政党地位、使命、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民主监督能力和水平。

(二) 以组织建设为基础, 不断强化民主党派的政党职能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只有不断加强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才能切实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治协商的能力和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党派组织建设是充分发挥参政党各项职能、增强民主党派自身活力、完成民主党派政治任务的基础。莫伊塞·亚科夫列维奇·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在《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中指出,英美两国的政党政治一开始就存在着弊病,认为政党组织在政党领袖的控制下,其党员、选民的自主性逐渐减弱……长久下去,政

党必会变得专断、集权乃至独裁^[17]。1911年，罗伯特·米歇尔斯在《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中指出，由于组织是形成集体意志的唯一途径，不管它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组织也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因而没有组织的民主是不可想象的；组织的不断发展，往往又会使组织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组织越强大，我们会发现其实践民主的程度反而越低^[18]。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政党组织和其他一切组织一样，要在组织建设民主化的基础上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的民主化进程。然而，要改变当前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中存在的个体化、事务化、随意化的现象，就要进一步提高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组织化程度，注重发挥民主党派的集体智慧和整体优势，凸显其组织性力量，努力将个体化的、零散的行为转换为政党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从而不断提升其民主监督的质量与效能^[19]。在民主党派组织建设过程中，要防止“民主党派不民主”的“官僚主义”异化现象。应当承认，民主党派地方和基层组织目前在组织管理工作上有一定的难度，也的确存在着活力不足的现状。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干部和广大成员主要是兼职开展工作的，相关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和教育培训等方面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搞好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好基层组织的职能和作用，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不仅有利于增强民主党派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增强民主党派成员的组织归属感，而且有助于提高民主监督的整体效能，推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当然，切实地发挥这种组织性力量，还有赖于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真正把政治觉悟高、参政议政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中青年代表人物逐步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队伍中，建立健全民主党派干部选拔、培养、使用的各项制度；要切实加大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力度，努力使其成为教育成员、联系群众、锻炼干部以及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基础作用的重要阵地。

（三）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不断健全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

现代民主政治是与政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权力的行使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党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往往成为实际的政治权力中心。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其作用发挥的重要条件就是政党体制的制度化。莱斯利·M·里普森在《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中认为：“政党制度可能是现代人对政治艺术的最大贡献。”^[20]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状态或结果。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从过程视角将制度化理解为“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过程”^[21]。在制度化的政治体制中，政党关系具有稳定性和合法性，政党组织及其成员都能够更好地发挥职能和作用。离开了政党制度，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甚至无法有效运转。尽管在当今许多国家的政党政治实践中，关于“政党衰退”这一论题的经验证据可能是强有力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政党制度依然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离不开政党制度的现代化。政党制度中的政党监督，即政党政治对国家行政权力的约束与监督，是政党制度的重要方面，也是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主党派要按照各自章程和有关文件规定，实现参政党组织活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不断提高广大民主党派成员的参政党意识和政治责任感，提高各级民主党派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动力，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制度建设作为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的基础性工程，要侧重完善监督能力培训机制，健全监督成效激励机制，以及构建监督安全保障机制。民主监督的安全保障机制并非可有可无。在民主监督的过程中，有时还会遇到“软报复”的现象。比如，有些原来能参加的会议，后来不让参加了；原

来可以看到的文件资料，后来不让看了；原来担任着某些社会职务，后来不让担任了，等等^[22]。民主党派通过自身建设来提高民主监督能力，无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民主党派要切实把自身制度建设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和民主监督的基础工程认真加以对待，努力做好民主监督能力提升的各项工作。

三、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的关键环节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效能，就要不断提升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能力和水平。其中，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是国家治理法治化、民主化、透明性和责任性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能力和水平提升的基本路径，不仅在于加强自身的学习型政党建设、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而且要抓住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包括成员发展环节、教育培训环节和协调落实环节，重在不断增强民主监督能力提升的实效性。

（一）成员发展环节

民主党派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其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每一位成员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以及在统一战线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的实际能力不断提高。众所周知，吸纳新党员是政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各民主党派来说，加强民主党派组织建设不仅要注重特色，而且要注重不断提高各自吸纳新党员的质量。各民主党派要有计划地积极发展新成员，不断壮大力量，持续扩大本组织在本界别的代表性，还要注意对新成员的业务能力、政治素养、社会影响和代表性等方面的考察，以保证民主党派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整体优势^[23]。可以说，加强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和组织建设是民主党派自身发展和增强民主党派活力和能力的关键。只有切实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民主党派人才队伍，才能充分发挥党派的整体优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履行民主监督职能上有所作为。为此，民主党派需要建立相应的成员发展优选机制，珍惜民主党派成员发展的每一个名额，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民主党派成员发展原则。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合作型政党作用的发挥与人数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民主党派成员人数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而在于素质与能力的上乘。建立民主党派成员发展优选机制，可以使民主党派成员在民主监督过程中既能反映问题，提出批评，又能积极探索和调研，从而真正能够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设性意见，充分行使好民主党派的“话语权”。在目前退出机制不完善的情形下，成员发展的优选机制和人才保障机制尤为重要，可以为民主党派输送新鲜血液特别是优秀人才资源。

（二）教育培训环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它不仅要求监督主体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熟悉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还必须有善于发现问题的独特视角，有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的能力，具备提出切实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的能力。因此，各民主党派要不断推进学习型政党组织建设，加强对成员民主监督方面的培训，制定系统的教育培训计划，把提高民主监督能力纳入培训内容。同时，中央、省级统战部门需要站在宏观角度，对民主党派成员民主监督能力进行不同层次的培训，为民主党派成员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这种培训应有针对性，并且逐步实现制度化和长期化，避免短期突击式的培训^[24]。参政党自身要在学习型政党建设过程中不断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基本理论的学习教育；

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以及形势、政策的学习教育；多党合作优良传统的学习教育；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法制和公民道德素质教育。”^[25]“参政党要优化监督职能，就需要组织、教育、发动、引导党派成员将其真知灼见升华为监督的能量。这是发挥参政党监督作用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所在。”^[26]各民主党派既要抵制西方的政党观，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又要克服无所作为的心态，对于国家的兴衰以及国家治理的成败要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积极主动地做好民主监督工作。各民主党派要增强民主监督的主动性，改变民主监督是“柔性监督”，与法律监督和行政监督相比缺少刚性，因而“说了白说，还不如不说”的错误思想及“软作为主义”的错误认识；要克服在民主监督的过程中既怕得罪领导和相关部门，又怕对一些重大和敏感问题的监督把握不好“度”引来自身麻烦，不愿和不敢进行民主监督的重重顾虑。如前文所述，个别专家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只是“片面的深刻”，在政治素质上、全局意识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从民主党派成员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发言来看，其中存在人云亦云，缺乏创新性见解的现象；从个别意见建议看，其中存在一般性表述多，提出切实可行解决问题的办法少的问题。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建议没有被采纳，有接受者认识不到位、不重视的原因，但也存在着其中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不科学、不合理，不符合实际，现在无法办理的问题^[27]。因此，只有不断提高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切实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才能在民主监督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实效性。

（三）协调落实环节

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是民主监督的力量之源，能为民主监督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创造宽松和谐的社会民主氛围，可以进一步为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提供环境支持。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要通过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通过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来推进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相关结果的落实。当然，由于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推进也只能是渐进的。要逐步使民主政治意识成为大多数人的普遍的、成熟的观念，从而为民主党派发挥作用提供一种广泛的社会支持^[28]。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共作为执政党要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把民主监督当作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国安邦的一项重要手段，将之提高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民主化、法治化和透明化重要标志的高度来认识，重视和支持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工作。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党派的知情权和参与程度，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建设创造条件。知情是监督的基础，不知情就无法进行监督，即使监督也不会有高质量的监督效果，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如果不能进一步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也就无法提高民主监督的实效性，国家治理的责任性也难以得到全面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支持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建设，尤为重要是应尽可能地扩大民主党派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其基本路径是：中共党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民主党派的联系，并就重大方针、政策和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等及时通报有关情况；邀请民主党派参加各种有关会议，及时传达相关文件，拓宽知情渠道；被监督单位应坚持信息公开制度和公开办事制度，让民主党派了解真实情况，保障民主党派对重大方针政策、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的知情权，切实为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责创造必要条件。扩大民主党派的知情渠道还需要有相应的对策措施，一方面要通过体制内的政治安排、实职安排确保民主党派成员进入国家政权体系发挥作用，使参政党的民主监督功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要建立可共享的民主监督资料库和民主监督专家库^[29]。总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一项政治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只有不断拓展其知情渠道，确保其政治参与，才能

为其开展民主监督并且不断提升民主监督能力和实效性提供便利条件。

四、结 语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特色。切实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要着力搭建学习平台，不断强化能力提升机制，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增强动力。

（一）搭建学习平台，健全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的学习交流机制

建议由统战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并落实一定频次的民主党派骨干成员的民主监督理论学习班，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学习和交流活动，从理论上提高和加深对参政党地位、使命、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素质、政党意识和政治责任意识。民主党派成员要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深入学习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法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充分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把全面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坚定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政治信念，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导入牵引力，引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正确方向。

（二）加强自身建设，强化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的学习培训机制

建议民主党派组织在其相关委员会或者专门成立的机构中开展民主监督主题学习培训活动，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特点强化能力提升机制，加强自身修养，自觉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提高民主党派成员自身的认识水平、行为规范的自律能力，增强其对民主党派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提升其履行监督义务的责任意识、增强参与监督的权利意识、善于监督的能力意识，为民主党派成员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民主监督工作任务提供基础保障。

（三）明确监督任务，建立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的监督考核机制

反馈是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着力点。监督反馈机制可以有效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功能，使民主党派的政治监督发挥实际作用，使其监督具有实效性。建立监督反馈考核制度，对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实效性情况由专门的部门，如统战部进行定期考核评价。通过考评制度来促进民主监督的水平、质量与实效性的提升，把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绩效工资相挂钩，以加强激励。落实监督考核机制，检查相关民主党派是否履行监督之责，“使各民主党派从要我监督向我要监督转变”^[30]，进一步为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注入动力。

参考文献：

- [1] 安德鲁·海伍德. 政治学 [M]. 张立鹏, 译. 2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93.
- [2] 杨爱珍.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再思考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3 (3): 15-18.
- [3] 许奕锋. 中国参政党监督能力建设研究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 (1): 15-18.
- [4] 李军. 民主监督与民主党派的政党能力建设 [J]. 团结, 2011 (6): 30-32.
- [5] 张瑞芳. 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建设——纪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发表 50 周年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6 (3): 38-42.
- [6] 钱再见.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一战线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 (3):

- 14-20.
- [7] 刘洁. 论民主党派监督与中国执政党建设 [J]. 长白学刊, 2007 (2): 117-119.
- [8] 李劲夫, 陈立新. 创新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运行机制的思考 [J].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报, 2010 (2): 5-12.
- [9] 阿克顿. 自由与权力 [M]. 侯健, 范亚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342.
- [10] 蒋德海. 政党监督: 全面从严治党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7 (4): 31-39.
- [11] 贺善侃. 全面从严治党离不开加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 (3): 24-31.
- [12] 周淑真, 孙林. 在深化改革中破解民主监督难题 [J]. 中国政协理论研究, 2014 (1): 44-48.
- [13] 杨保建. 加强民主监督能力建设的认识与思考 [J]. 团结, 2013 (1): 9-11.
- [14] 以赛亚·柏林. 俄国思想家 [M]. 彭淮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26-27.
- [15] Philip E. 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
- [16] 袁廷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提出、内涵及意义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 (2): 14-20.
- [17] 吴辉, 等. 西方政党学说史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5: 103.
- [18]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M]. 1915, trans. Eden and Cedar Paul, Kitchener, Ontario: Batoche Books, 2001: 19-26; 241.
- [19] 雷振文, 徐婷. 值得重视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效能 [J]. 求实, 2013 (8): 14-18.
- [20] 莱斯利·里普森. 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 [M]. 刘晓,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209.
- [21]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2.
- [22] 民建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 关于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思考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 (4): 25-28.
- [23] 李晓菊.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探析 [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 (3): 16-20.
- [24] 郭秀丽. 影响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实效的因素及对策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 (3): 11-14.
- [25] 邹函奇. 参政党能力建设的自身向度研究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 (4): 26-31.
- [26] 万光碧. 我国参政党的监督功能研究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 (2): 35-38.
- [27] 张解放. 民主监督实践的点滴体会 [J]. 团结, 2009 (4): 24-25.
- [28] 张瑞芳. 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建设——纪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发表 50 周年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6 (3): 38-42.
- [29] 姜仿其. 新时期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特点及改进对策 [J]. 人民论坛, 2012 (23): 56-57.
- [30] 王建华, 王云骏. 我国多党合作的民主监督问题研究——基于比较政党制度的视角 [J]. 学术界, 2013 (1): 23-31+253-257.

责任编辑: 孙德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 模式转换与发展方向

——以上海市黄浦区“海燕博客”为例

肖存良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涌现出来的新的统战工作对象, 他们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统战工作对象的新特征。新特征决定了不能简单沿用传统统战工作模式来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而是要创造新的统战工作模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有 1.0 版、2.0 版和 3.0 版三种模式。1.0 版是一种“少数人少数方面”的传统的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模式。上海市黄浦区海燕博客公益发展中心(简称“海燕博客”)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从 1.0 版推进到了 2.0 版, 实现了从标志性人物到一般性人士、从政治化到“隐政治化”、从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从单向度到全方位、从主客分离到主客融合的转变。建构 3.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模式, 要求进一步把代表性人士与标志性人物结合起来, 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 把政府资源、政治资源与市场资源、社会资源有机整合, 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纳入其中。3.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将实现从“多数人全方位”工作到“全体人全方位”工作模式的转变, 并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代表性; 统一战线价值; 美的统战; 需求; 海燕博客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8) 04-0068-08

党的十八大以来,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逐渐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热点。当前我国大约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7 200 万人^[1]。根据上海市委统战部 2016 年进行的调查, 上海市共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365 万人^[2]。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都处于体制之外、市场之内和社会之中, 具有自主性强、流动性显著、自组织性强、创新意识强、思想多元、网络性突出等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同于传统统战成员, 不能简单沿用传统统战工作方式来做他们的工作。如何突破传统, 建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新模式, 如何有效地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央统战部原部长孙春兰在 2017 年召开的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8.04.007

作者简介: 肖存良,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副秘书长。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四个全面’战略研究”(2015MZD004)

引用格式: 肖存良.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模式转换与发展方向——以上海市黄浦区“海燕博客”为例[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4): 68-75.

战工作会议上坦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很多重点难点问题尚未完全破题。为了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2017年4月至9月，笔者对全国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典型样板^①——上海市黄浦区海燕博客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海燕博客”）进行了深入调查，召开了多次骨干座谈会，参与了海燕博客组织的多次社团公益活动，对海燕博客子社团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度访谈，查阅了海燕博客微信公众号2017年的主要内容和相关历史资料。本文旨在通过解剖海燕博客这个麻雀，分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新模式，探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发展方向。

一、传统模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1.0版及其内在矛盾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组织起来”的号召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精神，全国各地在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基本模式。首先，鉴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处于市场之内和社会之中，属于现代“隐身人”，因而第一步是发现他们，找到人，然后接上头、对上话，使他们由一个个生冷的统计数字变成一个个鲜活的、实实在在的“人”。其次，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四种类型中，寻找出各个领域的专业精英人士，先验地授予其为“代表性人士”，在统战部门的推动下建立“代表性人士”社会组织，如组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然后依托联谊会来做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统战工作。对由此形成的“专业领域精英（代表性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模式，本文暂且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1.0版。

这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模式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第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专业领域精英能代表这一专业领域的所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认为其不但能够代表他们的物质利益和政治诉求，而且能够在这个群体中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号召力，产生代表性效应。这种状况正如毛泽东对代表性的比喻：“一根头发”与“一把头发”的关系^[3]。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专业领域精英虽然只是“一根头发”，但他代表着“一把头发”，拔去“一根头发”就会影响到“一把头发”。第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需求主要是政治需求，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需求就能满足其全部需求，就能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形成强大的政治吸纳能力。第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这种类行政化组织机构一旦建立，就等于工作到位，工作实效也会自然产生。组织结构建立之后，就会产生自身应有的功能，形成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自觉开展相关人士的统战工作。

如果能够满足这三个假设，1.0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模式就是有效的、能够实现效益最大化的模式。如果不能满足这三个假设，1.0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模式就不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事实上，传统统战工作建组织、搭平台、然后依靠组织平台去开展统战工作的方式都建立在上述三个假设之上。但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与传统统战工作相比，区别在于没有单位作为依托，不能通过单位来协助开展统战工作。因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更为鲜明地建立在这三个假设之上。这三个假设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有效性更为显著。在社会政治现实中，这三个假设都难以成立。从理论上分析，这三个假设存在两对内在矛盾。

第一，标志性人物与代表性人士之间的内在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我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党外代表人士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党外代表人士；二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的党外代表人士；三是在改革开放深化推进以来涌现出来的党外代表人

^① 俞正声和孙春兰在2017年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上把“海燕博客”作为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先进典型。

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党外代表人士，经历过革命血雨腥风的洗礼，他们是以历史与社会舞台来成就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地位的。可以说，他们的产生是历史与社会运动的结果。这种代表性人士所代表的界别或社会群体不是哪个政治力量塑造的，而是社会自我生成的，具有天然的强代表性。

在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来的党外代表人士，是在社会呼唤人才与精英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他们主要集中在知识、科教领域，多以自己突出的专业成就来创造自己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总体上是以科教精英统领社会发展的时代。所以，他们的出现很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同和资源。但是这些党外代表人士所代表的“社会各界”，实际上是体制划分形成的“功能性各界”，即依据社会各个群体所承担的功能划分为“社会各界”。这种“社会各界”不是实体性的，没有其内在的组织和运行机制，仅仅是一种工作性的划分。所以，“社会各界”的代表仅仅是社会各界的标志性人物，这些人物“标志”社会各界，但不必然“代表”社会各界。这种“代表”与所代表的群体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代表”关系，因而，自然不容易被社会各界所认可。不被认可的“代表”是没有认同度的，自然也就没有影响力和权威性。但是这批人与老一代党外代表人士之间有一定的时空重叠，并且通过政治交接从他们那里继承一定的政治资源，而且这批人都有单位依托，可以通过单位来建立和加强与所代表群体的联系，因而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改革开放深化推进以来，党外代表人士得以涌现的社会舞台和时代条件又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快速分化、世俗化、大众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发展潮流中，新的社会阶层领域涌现出来的专业精英人士由于身处体制外，缺乏单位依托，政治资源难以配置到他们身上，他们往往较难进入体制内的政治视野。他们与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来的标志性人物又不一样，在缺乏单位依托和老一代代表人士影响的情况下，缺乏直接转化为社会公共领域中代表性人士的政治渠道。与此同时，由于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的分散性和差异性，新的社会阶层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在所在专业和社会领域中也并不必然具有整体代表性。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涌现出来的标志性人物与代表性人士之间几乎完全脱节，不能通过标志性人物实现整体代表性。这就意味着，新的社会阶层领域统战工作不能仅仅抓住几个标志性人物来做，而是要分类施策，通过开展适应各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活动来把他们吸引到党的周围，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同心圆结构。

第二，政治统战的单向性与人的全面发展多维度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毫无疑问，统战工作是政治工作。毛泽东曾经指出，统一战线是最大的政治。我们一般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研究都以政治为主，主要关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需求和思想动态。但是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个体而言，政治需求并不是其基本需求，也不代表其全部需求，而只是其全部需求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除了政治需求之外还有广阔的需求天地，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就本质而言，公民并不是一种政治动物”^[4]。

就基本需求而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基本需求与普通人无异。在基本需求之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还有在市场上生存与发展的经济需求，以及丰富个人精神生活的需求、对真善美的追求、希望个人境界不断得到提升的需求等。人只有把基本需求、经济需求、政治需求、价值需求和精神需求等综合起来，才是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完满的人。而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政治需求，往往忽视其他需求。传统统战工作也主要关注政治需求，如此视野中的统战成员是一个单向度的而不是一个现代的、立体的、丰富多彩的人。因而，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而言，既然“标志性人物+社会组织”不能代表他们，就应该通过多维度活动来吸纳他们、引领他们和提升他们。

根据上海市委统战部 2016 年进行的调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内部差异性极大。四类人群属于经济社会地位有着很大差异的社会群体。每一类人群当中，内部构成又较为庞杂，文化素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差异悬殊。即使在同一群体的同一行业中，经济地位、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存在较大差异^[2]。因而，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以标志性人物代表差异性极大的整个行业、通过行业标志性人物来实现代表性不具有充分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1.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际上是做一小部分标志性人物的工作，并把绝大多数普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置之门外。即使是对这一小部分标志性人物，也主要做他们的政治工作，对政治工作之外的其他工作付之阙如。这种工作思路看到的只是少数人，又只是看到少数人的少数方面，是一种“少数人少数方面”的工作模式。如何更好实现党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初心，把他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 1.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内在问题，也是传统统战工作的瓶颈。通过对海燕博客的实地调研，本文发现它能为我们提供突破瓶颈的新路径。

二、海燕博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 2.0 版

2006 年，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团工委书记施海燕在开展“两新组织”党建、团建的试点活动中，意识到需要抓住商务楼宇中的白领。为此，她花了两周时间“扫”了近 20 幢商务楼宇，“扫”出了当时第一批 50 名“骨灰级”会员。随后她组织这些“扫”出来的白领开展了各式各样以娱乐为主的活动。参与活动的白领在娱乐之余，认为有必要开展一些公益性活动，建议成立公益性组织，海燕博客由此产生。2012 年 7 月，海燕博客以黄浦区统战部为业务主管单位，在区社团局正式注册成立“上海市黄浦区海燕博客公益发展中心”。截至 2017 年底，海燕博客先后孵化培育出了 18 个子社团，包括都市原点剧社、海有爱公益社、白金部落阁、海搏武道社、海天行益游社、海贝捉友社、海带读书会、海派创投俱乐部、海航梦想派、海韵旗袍会、书虫部落、东方雅集、茄子脱口秀、海悦荟、智慧公益、绿色有我、声音部落和海律社等，涵盖了文化、艺术、环保、交友、体育、公益、创投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高度关注的领域。海燕博客有线上线下会员近 3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其会员还在滚雪球式地不断增长。

与 1.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相比，海燕博客开展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具有以下 6 个方面的鲜明特征：

第一，从工作对象上看，海燕博客实现了从标志性人物到一般性人士的转变。海燕博客找到了具有代表性的一般性新的新社会阶层人士，而不仅仅是依靠少数标志性人物。海燕博客 18 个子社团的负责人都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但他们都不是所在公司企业的负责人，也不属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标志性人物，而是一般性人士。他们通过投身公益，在业余时间开展社团活动，建立了核心团队，凝聚了大量粉丝，影响了一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为所在公益领域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性人士。比如，“书声”子社团负责人丁智刚每年做 200 场阅读活动，平均每场参加人数 30~40 人。阅读活动坚持以普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主，不邀请作家等名人名家出席。丁智刚在爱好阅读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力^[5]。可见，海燕博客是通过普通人做普通人的工作，然后从普通人中发现真正的代表性人士。

第二，从工作方式上看，海燕博客实现了从政治化统战到“隐政治化”统战的转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处于体制之外，本身与体制的联系较为薄弱，政治资源也难以直接配置到他们身上。对他们而言，政治只是生活与事业中极小的一部分。1.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模式主要从政治出

发,重点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推动他们的政治参与,这是一种典型的从政治到政治的政治化统战思路。这种统战思路一方面主要关注统战成员的政治需求,另一方面往往显得枯燥乏味。海燕博客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实施从政治到政治的政治化统战,而是实施从生活到政治的“隐政治化”统战。

“隐政治化”统战不是不讲政治,而是把政治融入到生活之中,通过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各种管道来输入政治,以生活政治来感化、教育和提升人,最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统战效果。海燕博客以娱乐活动起家,这种天生的娱乐基因使它的统战工作一开始就是生动活泼、新鲜多样的。都市原点剧社以演出喜剧《粉红女郎》开场,但逐渐有意识地把政治要素或统战要素植入其中,以剧目的形式来阐释政治或统战。剧社参演了中央电视台首部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电视专题片《国魂》。2016年,该剧社推出以两岸和平统一为主题的话剧《和平饭店》。2017年,该剧社以“黑石号”沉船事件为背景推出话剧,以艺术演绎的方式为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贡献。

第三,从工作内容上看,海燕博客实现了从满足物质需求向满足精神需求的转变。海燕博客更加注重精神提升和精神引领。总体上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基本物质需求已经得到较好满足。上海市委统战部2016年的调查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收入水平普遍较高,是同时期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2]。海燕博客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把工作内容从物质转向了精神,从满足他们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实现自身梦想等角度来引领他们和提升他们。这样的统战工作就是属于人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要义的统战工作。海燕博客开展的大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都是从激发他们内心追求、内心需求出发:不是要他们做什么,而是在激发内心追求之后他们自己要求做什么。海燕博客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往精神、价值、个体实现和美的追求等方面提升,是一种追求真善美的统战工作。个人美的追求、精神生活的提升是无法简单通过代表性人士来实现的。因而,注重精神引领的统战工作需要把每个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融入进来。这样的例子在海燕博客中举不胜举。上海市梦想戏剧节发起人、都市原点剧社社长秦云峰的职业是威士伯(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商务经理,但他同时是一个对舞台艺术充满无限热爱的人。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他在报纸中缝发现“都市原点”剧社招募会员,他马上报名参加。这位心怀“戏剧梦”的“化工男”终于重披戏装,再走演艺路^[5]。

第四,从工作方位上看,海燕博客实现了从单向度到全方位的转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仅仅开展政治统战是不够的,还要从政治领域拓展开去,把统战融入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和个人实现、个人梦想、个人潜力发挥等方面。当然,海燕博客在开展全方位统战工作的时候,也不是不要政治性,而是按照前面所讲的“隐政治化”方式来植入政治性。在海燕博客的全方位统战工作中,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注重精神、文化和个人实现层面之外,海燕博客还注重以生活为基础,照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生活需求。海燕博客注重从满足生活需求出发,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全方位统战工作。海燕博客所构建起来的文化公益生活圈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了丰富的业余生活规划。“书声”活动、“都市原点”剧社、“文庙讲堂”、“茄子脱口秀”、海博武道社、海有爱公益社活动等公益性项目活动,均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参与主体,旨在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全方位、多层次需求。

第五,从工作方法上看,海燕博客实现了从统战主客分离到主客融合的转变。海燕博客化统战对象为统战力量,充分发挥统战对象的统战主体功能。在以往的统战工作中,总是有明确的统战主体和统战对象之分,主客二元分立。但是在海燕博客的统战工作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交织、融为一体。海燕博客开展活动不是由主体规划推动,而是源自客体自发需求。客体有开展公益活动的

内在需求，市场和社会也积极呼应这种需求，推动客体主动要求开展公益活动。主体把统战要素植入活动，使活动体现公益性和政治性，主体也把自身多年积累所产生的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等各种资源赋予客体，协助客体办好活动，协助客体解决在开展活动过程中遇到的人、财、物等方面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在后台组织张罗活动的是客体，而提供资源和幕后支持的是主体，主客体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机的一体化关系。

第六，从工作机制上看，海燕博客实现了基于项目化的运转新模式。海燕博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项目化，即以优秀的公益项目来招募人、团结人、凝聚人、鼓舞人、提升人。项目化使海燕博客具有内在生命力，是其迅速生长、形成生态和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与 1.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相比，2.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模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组织+项目+公益+市场+政治引领+人自我实现的追求。2.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现了社会化、市场化、人性化、平等化、项目化等多方面的突破，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新模式。

三、方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 3.0 版

海燕博客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从 1.0 版提升到 2.0 版，改变了做“少数人少数方面”工作的困境，建构了一种做“多数人全方位”工作的新模式。但是，海燕博客开展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代表性人士与标志性人物的关系上，海燕博客虽然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代表性人士，但还有大量标志性人物没有进入海燕博客的视野，即使海燕博客所在的黄浦区也是如此。从普通人士入手是海燕博客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基本方式和优点，但也导致其与大量标志性人物绝缘。标志性人物处于海燕博客的活动模式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燕博客的市场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第二，在子社团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关系上，海燕博客虽然建立了 18 个子社团，但这些社团还没有成长为枢纽型社会组织，还不能把相关社会组织的绝大部分囊括到社团之中。海燕博客计划将每一个子社团都打造成为上海具有标杆引领作用的组织，通过好项目带动上海同领域的组织共同发展，但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第三，在政治性、市场性与公益性三性当中，海燕博客公益性最突出，市场性次之，政治性略显单薄。虽然海燕博客是以“隐政治化”的方式在开展统战工作，但是由于政治资源配置不足，使其在植入政治的时候面临一定的阻力，个别子社团负责人及其成员对植入政治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种不愿意参与政治、融入政治的心态，不愿意被吸纳到政治体系中来。

建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3.0 版，需要加强以下 4 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帮助社会涌现出来的代表性人士成长为标志性人物，同时推动标志性人物往代表性人士方向靠拢，促使代表性人士与标志性人物实现有机统一。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培养，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培养。海燕博客通过公益社团活动培育了一批社会上自发涌现出来的代表性人士，但这些代表性人士还没有成长为自身所在领域的标志性人物。比如，前文所述丁智刚是阅读训练领域中自发涌现出来的代表性人士，在阅读训练领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在上海近 3 000 家读书会中，他并不是阅读训练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在海燕博客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就是要帮助像丁智刚一样的代表性人士逐渐成长为标志性人物，自下而上地把代表性人士与标志性人物统一起来。当然，推动他们成长为标志性人物并不意味着要海燕博客或统战部门包办代替。海燕博客

和统战部门可以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一定的政治资源，但最终要靠其自身成长，靠其自身有成长为标志性人物的内在需求，决不能代替其成长，更不能拔苗助长。

与此同时，海燕博客是从普通人士入手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市场上一批已经成长起来的标志性企业及其标志性人物并没有进入其视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3.0 版要把这些人吸纳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对象中来，促使他们既是所在领域的专业精英，又在市场和社会中成为真正具有代表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代表性人士。基于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标志性与代表性之间的脱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3.0 版就是要把他们由标志性人士往代表性人物方向靠拢。以海燕博客所在的黄浦区为例，爱奇艺和蓝鲸传媒等新媒体企业都位于黄浦区，他们的负责人都是新媒体从业人员中的标志性人物，但目前他们都没有被吸纳到海燕博客中来。3.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模式仍然要以普通人士为主体，但要尽量把代表性人士与标志性人物有机统一起来。

第二，建立新的枢纽型社会组织，通过枢纽型社会组织把相关社会组织囊括其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科协、工商联、欧美同学会等群众团体和统战社团要广泛吸纳新的社会阶层党外人士。”除了上述这些已有的传统枢纽型社会组织之外，还要把社会组织团结联合起来，建立新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以海燕博客为例，建立新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就是要在海燕博客所建立的 18 个子社团的基础上，以项目为纽带，把相关社会组织完全整合起来，建构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联合会，把这些子社团打造成为所在领域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建立新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就是要让“各子社团与上海其他社团结成联盟，以领域为划分，以项目为载体，建立大平台，实现更大范围的融合”^[5]。从目标上看，新的枢纽型社会组织要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标杆，成为统战社会组织和统战内在生命力的孵化器，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生活生态的全球标杆。

第三，把政府资源、政治资源与市场资源、社会资源有机对接。现代化推动国家与社会分立。但是分立之后，中国和西方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不一样。西方国家与社会分立之后处于对立状态，社会制衡国家，社会力量制约国家力量。我国国家与社会分立之后处于合作状态，国家与社会合作，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各取所需、共同发展。尤其在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状况下，一方面，社会上自发产生的社会组织为了能够在市场上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特别希望获得政府资源的支持；另一方面，社会上自发涌现出来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市场能力，形成了自身一定的市场资源，政府在施政过程中也希望共享这些市场资源，获得社会组织的支持。但是由于市场上产生的社会组织本身处于体制之外，与政府相互隔离，社会组织自身的市场资源难以直接为政府所用。因而，在国家与社会互有需求的情况下，还需要一个中介组织把国家与社会串联起来。

海燕博客十几年来迅速发展壮大的一个秘诀就是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者，一方面把社会组织的资源转化为对政府有用的资源，另一方面把政府的资源转化为对社会组织有用的资源，实现了政府资源、市场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的有机对接。海燕博客在发展过程中，先后获得了黄浦区统战部、宣传部、侨办、侨联、文化局和商务委等党政部门和团体的支持。海燕博客在获取政府资源支持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政治资源配置上，由于其成长与活动于体制之外，处于我国政治资源配置范畴之外。我国目前政治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组织性的行政配置，即通过组织内部的行政性手段进行资源配置。这种配置方式自然使得处于体制外的社会组织难以被纳入政治资源的配置体系之中，导致社会组织开展的大量活动没有产生政治效应，社会组织自发产生的代表性人士难以纳入组织内政治资源配置的视野。政治资源配置环节的缺失导致海燕博客所开展活动的政治性较弱。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3.0 版，一方面要把海燕博客自发产生的代表性人士吸纳到政治体系中来，使他们在政治体系内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源；另一方面要通过两新组织党建、团建把政治资源配置到社会组织中去，以党建带统战、团建。

第四，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融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物质上的先行者，在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之后必然会率先进行精神上的追求，进而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海市委统战部 2016 年进行的调查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注重精神生活，追求实现个人价值，这成为他们加入各种社会组织、参加海燕博客各类子社团的动因^[2]。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率先具有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因而要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融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统战工作必定注重精神生活。统一战线注重精神生活之后，必定把美融入统战工作之中，使统战活动具有内在的美感，体现人对美的内在追求，从而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成为一种美的统战，这是统战工作的一种新形态。海燕博客的统战工作就是一种帮助实现美的统战工作，它通过美来濡化心灵、提升道德情操、激发人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美的统战是海燕博客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一种特点和优势。3.0 版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美的追求融入各项工作。当然，3.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还是以普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主体，标志性人物与代表性人士脱节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尽量把二者统一起来。从模式上看，3.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通人士、代表性人士、标志性人物）+枢纽型社会组织+资源（政府资源、政治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人的全面发展。这种统战工作实现了从“多数人全方位”工作到“全体人全方位”工作模式的转变，这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向。

四、结 语

海燕博客通过 18 个子社团吸引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每年 500 多场活动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既接受精神洗礼，又实现自身的人生追求。海燕博客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模式 1.0 版的基础上，把它推进到 2.0 版，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了一种新模式。从发展方向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有必要从 2.0 版推进到 3.0 版，即从“多数人全方位”统战工作模式推进到“全体人全方位”的统战工作模式，通过资源配置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2.0 版和 3.0 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契合人的内在需求，创造平等与创新的环境，寻求现代人的意义和归属感，以项目匹配资源，以参与带来活力，既是一种寻求共同生长的统战工作，也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内生性统战，更是一种美的统战。

参考文献：

- [1] 王海馨.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 7 200 万人 [N]. 光明日报, 2017-01-06 (1).
- [2] 上海市委统战部课题组. 新的社会阶层基本情况研究 [Z]. 2016: 5.
- [3]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 下卷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526.
- [4] 罗伯特·达尔. 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 [M]. 范春辉, 张宇,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251.
- [5] 威尔达, 刘毅. “海燕博客”如何实力圈粉 [N]. 联合时报, 2017-06-06 (3).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22.

新乡贤统战： 基层统战工作的整合拓展与全新模式

——以浙江省县以下实践为案例

许 军

（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 研究室，浙江 杭州 310025）

摘 要：2016 年以来，浙江省基层开展了新乡贤统战创新探索。新乡贤统战是基层党委和统战部门基于中央对新乡贤文化、社会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重视，以空间维度、地域文化、乡情纽带为基本途径的全新统战工作模式。新乡贤统战充分体现了大统战工作格局，对县、乡两级统一战线具有整合、拓展功能，对统一战线参与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基层乡村治理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突出的推动作用。基层各级党委和有关方面应该在载体构建、机制完善等方面予以深化，使之成为县级统战工作的基本载体和乡级统战工作的主要载体，成为基层统战工作创新的重要抓手。

关键词：基层统战；新乡贤；新乡贤文化；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柔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8）04-0076-10

国内对“乡绅”“乡贤”的研究已有较长历史。本文所探讨的新乡贤指的是户籍、原籍、祖籍、姻亲关系或工作关系在当地，品行好、声望高、影响大，有一定经济文化实力且热心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事业的代表人士、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他们以党外人士为主，兼顾中共党员；以体制外人士为主，兼顾体制内人士^[1]。新乡贤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新乡贤文化的重视与部署。2014 年以来，学界在新乡贤（乡贤）的概念、新乡贤（乡贤）与文化建设、新乡贤（乡贤）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成果。在基本概念方面，有人认为，新乡贤具有地域性、平民化、社会声望高等特征^[2]；有人认为，新乡贤具有自身的客观影响、民众的主观认定、特定的文化土壤、本土的地域界限等特征^[3]；有人认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与传统的乡绅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逐渐被称为‘新乡绅’”^[4]。在新乡贤与文化建设方面，有人认为，“弘扬乡贤文化对于提升本地区的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激励社会向上向善，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作用”^[5]。在新乡贤与社会治理方面，有人认为，乡贤的嵌入有利于完善治理结构^[6]；乡贤可以利用其非正式权威的影响力，在乡村治理中发挥辅助“村两委”的作用，具有非官方特质、

DOI：10.13946/j.cnki.jcqi.s.2018.04.008

作者简介：许军，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

引用格式：许军. 新乡贤统战：基层统战工作的整合拓展与全新模式——以浙江省县以下实践为案例[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4）：76-85.

能够解决后农业税时代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作用^[7]。

由于统战工作实践发展的渐进性，目前新乡贤统战的理论研究尚未起步。在本质上，“新乡贤”与“统战”的紧密耦合具有必然性。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主要做代表人士工作，具有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根本职能。这与新乡贤的精英、贤达、反哺家乡、社会治理等内涵具有天然的相似性，二者的结合具有实践可行性。目前，部分地方的基层党委和统战部门及时发现了这个机遇并付诸了实践。2016年以来，浙江省基层的新乡贤统战工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异军突起的态势。目前，浙江省内明确提出新乡贤统战或乡贤统战概念并开展相应工作的，已有16个县（市、区）和2个地级市以及众多乡镇。浙江省委统战部计划将这一统战工作模式在全省全面推广。这为新乡贤统战理论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一年多来的探索表明，新乡贤统战已经成为浙江省基层统战自发、自主创新的新领域和新实践，不但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地域特色和社会作用，而且有利于基层统战工作的资源整合和机制规范。因此，对新乡贤统战工作加强研究，有利于统战理论与统战实践形成良性互动。

一、新乡贤统战的依据与背景

（一）理论依据：乡村振兴与国家治理

一方面，中央对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文化传承以及协商民主的重视，是新乡贤统战的外部契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8]。在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中，乡贤具有积极作用。乡贤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灵魂^[9]。复兴和重构乡贤文化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现代乡村治理，对于优化和丰富当下农村社会治理的资源结构，促进社会贤达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具有重要意义^[10]。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仅有普通大众和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新乡贤这一群体的智力、财力和影响力需要得到充分重视和使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1]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特点，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一直是重要资源。新乡贤中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资源丰富、联系广泛，是基层社会建设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基层社会的守护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农村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培育“新乡贤文化”被写进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统一战线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方法是广交深交党外朋友，而新乡贤是统战工作不可忽视的对象。在推进乡村振兴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环境下，统战工作必须主动作为，把新乡贤纳入工作范围。

另一方面，新乡贤统战是以空间维度、地域文化、乡情纽带拓展统战工作广度和提升统战工作力度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所列12类统战对象，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信仰、文化等角度来确定。但是，中国自古地域文化高度发达，乡情、乡缘一直是联结朋友、获取力量的重要途径，叶落归根、回报桑梓、同乡宗亲等观念一直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基于地域情结构建、挖掘、组织、扩展统战对象，理应成为统战工作创

新的重要方式。实际上，在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领域以及招商引资等其他工作领域，乡贤工作一直受到重视，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只不过新乡贤统战概念没有被明确提出而已。面对新时代的新方位和新使命，面对统战工作新格局的新理念和新要求，基层统战工作进一步强调这种方式并使之成为一个专门的统战概念，具有突出的实践探索价值。

（二）实践背景：港澳台海外、外地浙商与基层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浙江省基层新乡贤统战的探索不是凭空产生、从零开始，而是有扎实的实践基础：

首先是港澳台海外乡贤工作。在境外、海外领域，浙江省各级统战部门和相关部门成立了数量庞大的同乡会（大部分地方甚至实现了县级同乡会的全覆盖），并通过他们推进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反独促统、凝聚侨心等工作，在通过“乡贤”进行“统战”的同时，也“统战”了“乡贤”。在境内，乡贤工作比较典型的有宁波的“宁波帮”工作、温州的“世界温州人大会”、丽水的“世界丽水人大会”等。它们邀请全国和全世界的本籍代表人士回乡团聚、回报家乡。“世界温州人大会”至今已经举行四届。在历次活动中，温州市委和市委统战部突出联谊交流和凝心聚力，充分发挥大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邀请各有关方面的代表人物出席，通过表彰先进、联谊交流、换届选举、专题座谈等形式，密切乡情乡谊，加强交流互动。

其次是在外地浙商工作方面，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和统战部门一直以外地商会、浙商总会、浙商大会等形式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在省级层面，浙江省委省政府举办的浙商大会至今已经举行四届。浙商总会成立的宗旨是“把海内外千万浙商大军更好地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团结起来，汇聚起合心合力建设浙江的强大力量”。在市县层面，杭州、宁波、温州、丽水、湖州、嘉兴等市及其众多所辖县（市）都曾举行“X商大会”。

再次是在基层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方面，浙江省的基层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省是全国最早实现党外知识分子联合会县级全覆盖的省份。县级知联会的广大成员大多数是当地有影响、有成就、有贡献的党外知识分子，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政治协商、秩序维护、道德示范、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当地的新乡贤。

在各种实践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世界温州人大会”“世界丽水人大会”。这种模式把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归国留学人员工作、人才工作等各个方面工作综合起来，是新乡贤统战最重要的原型。比如，“世界首届丽水人大会”围绕“乡情、回归、发展”这条主线，不但策划“乡情、乡音、乡思”活动，而且发挥乡情、荣耀、热土的感召力，实现“大联谊、大回归、大参与、大发展”，将乡贤工作和统战工作的要素均纳入其中^[1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巩固完善，是各地新乡贤统战工作意识逐步强化的直接原因。其作用在于能够在原来相对分散的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和招商引资的基础上，把乡情联谊、人物培养、参政议政、引领乡风等各项工作融为一体，并且突出新乡贤的作用。

二、新乡贤统战的创新与特点

新乡贤统战工作是浙江省基层统战工作者把中央要求与本地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而自发进行的一项重要创新。与已有的各种统战工作模式相比，浙江省基层的新乡贤统战具有全面性、综合性、整体性、文化性、地域性等特点。

（一）在领导体制方面，新乡贤联谊组织充分体现了党委领导、全面动员、各方联动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新乡贤统战得到了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各地有意避免将新乡贤统战变成统战

部门一家的工作。台州市各县、丽水市的缙云县以及温州、湖州、绍兴、金华等市多县的党委均对新乡贤统战予以重视和支持，多以县委名义出台文件，且对各单位参与新乡贤统战提出了明确要求。仙居县委出台了《关于推进乡镇街道“乡贤联谊会”建设的通知》，又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乡贤统战工作的若干意见》；建立了乡贤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副书记和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和相关副县长任副组长，20个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和15个县级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缙云县委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乡贤组织推进乡贤统战工作若干意见》，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任副组长，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和县属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全县乡贤统战工作领导小组，要求把乡贤统战工作纳入县委总体工作部署，把乡贤统战工作融入党建工作、社会治理工作和群众工作，确定由县委统战部牵头，明确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形成责权明晰、分工明确、运转有序的乡贤统战工作体系。玉环市以市委办名义出台《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乡贤工作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各乡镇街道因地制宜，专门出台乡贤工作实施方案，形成了县（市）乡联动、统战部门主抓的工作格局。

（二）在载体搭建方面，新乡贤联谊组织具有综合性，其成员涉及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

搭建载体、组织起来是开展统战工作的基本途径，新乡贤统战也不例外。各地在实践探索中不约而同地把组织建设作为创新的前提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在统战部门的参与、推动和主抓下，浙江省目前已有16个县分别成立了县级乡贤联谊会、乡贤研究会、乡贤协会、乡贤参事会等组织，并有部分县将联谊会延伸到乡、村两级。仙居县委率先要求20个乡镇（街道）实现乡贤联谊组织全覆盖，并要求条件成熟的村（居）成立村级乡贤联谊会；成立全省首家异地乡贤联谊会（上张乡乡贤联谊会江苏分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县级乡贤联谊会总会。仙居县联谊会的成员构架分为道德类、文化类、公益类、经济类和干部类。玉环市的乡贤联谊会建设严格遵循“六有”（有场所、经费、人员、制度、台账、活动）和“六全”（审批、班子、规章、资料、规则、措施全）标准，目标是实现乡镇（街道）乡贤联谊组织全覆盖。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各类统战性组织，如民主党派、工商联、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海外联谊会等组织的成员同质、目标单一相比，新乡贤联谊会的成员包罗各个方面，有的地方甚至囊括了基层统战成员的绝大多数。台州市各县的主要特点是紧紧围绕大团结、大联合主题，着力扩大统一战线的包容性和团结面。总体来看，在各级乡贤联谊会成员的选择上，各县普遍要求乡贤联谊会成员具有代表性、广泛性，囊括党政军学商各界人士，囊括思想政治素质好、社会威望高、在本领域具有影响力、关心家乡发展、热心家乡事业的各类代表人士。

（三）在工作目标方面，新乡贤联谊组织积极参与当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具有服务大局的全面性

一般而言，多数统战组织发挥作用各有侧重。但由于成员中人才的综合性、广泛性，新乡贤联谊组织在发挥作用时显示出与其他各类统战组织显著不同的全面性，在基层“五位一体”建设中均可以有出色表现。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的乡贤会，以弘扬善举、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共促发展为己任，借助乡情亲情纽带，引导内外乡贤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等参与荻港村的美丽乡村小镇建设、4A级景区打造和基层社会治理。

（四）在工作方式方面，新乡贤联谊组织在具有政治性的同时，兼有鲜明的文化性、奖劝性，对成员的吸引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超过其他统战组织

新乡贤统战因与新乡贤文化存在源流关系，带有天然的文化、道德基因，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性、奖劝性。如果说其他统战组织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严肃性，那么新乡贤联谊组织具有鲜明的

民间性、人文性。调查表明,浙江省各县的乡贤工作大多注重以文化风、以文聚人,注重把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并以此推进基层社会道德建设、挖掘继承当地传统文化、树立乡贤标杆、培育时代新风等工作,试图通过文化统战的方法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仙居县开展了“百名乡贤育新风”活动,深入挖掘乡贤文化资源,有效提炼乡贤文化的精髓,教育引导当代乡贤和广大群众,引领乡村道德文化建设。特别是,不少县均建立“乡贤馆”一类的纪念性建筑,展示当地新乡贤中的杰出人物、著名作品、经典事迹,对推动当地道德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这种把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融为一体的做法,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究工作艺术、善于联谊交友的要求。

(五) 在整体风格方面,各地新乡贤联谊组织各有侧重、各有所长,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各地的乡贤本身各有特点。各地在探索中紧密结合当地具体实际,巧妙利用当地特色资源,各有侧重,展示出基层探索创新的充沛活力和良好前景。绍兴市上虞区是浙江省乃至全国最早开展乡贤工作的县级单位之一^[13]。该地文脉久远、名人辈出,其乡贤参事会首重“弘扬乡贤文化、凝聚思想共识”以及“发展乡贤文化、培育时代新风”,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风文明”,试图通过文化力量完成统战任务。相对而言,温州市的文成县玉壶镇以海外乡贤众多为突出特色,侧重弘扬“侨乡乡贤文化”,抓住乡贤报国报乡之心,助推侨乡公民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总体来看,在乡贤吸纳方面,有的侧重外地浙商,有的侧重当地知识分子;在工作重心方面,有的侧重招商引资,有的侧重协调关系,有的侧重乡风引导;在工作方式方面,有的侧重联谊研讨,有的侧重现场办公,有的侧重走访联络,有的侧重新媒体交流;在工作成效方面,各地在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方面各有侧重。这是新乡贤统战的地域性所带来的必然特点,同时说明各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较大。

三、新乡贤统战的价值与功能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基层统战成员越来越多,基层统战工作任务越来越重。然而,当前基层统战工作基础薄弱,力量不足,组织、载体、方法、途径有限。新乡贤统战的开展对解决当前基层统战工作的突出短板具有重要意义。

(一) 聚集功能:扩大基层统战工作范围,壮大基层统战工作队伍

新乡贤联谊会的成立使县级以下各种分散、零碎的统战力量得以在“新乡贤”的旗帜下集中整合起来并纳入统战视野。无论是本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还是外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无论是民主党派成员还是无党派人士,无论是港澳台海外同胞还是海归精英,无论是党外人士还是中共党员,无论是社会贤达还是政府官员,都可以在新乡贤这个平台上组织起来、聚合起来、团结起来、活跃起来。这极大地壮大了基层统战工作力量,增强了基层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新乡贤联谊会为广大乡贤施展才华、发挥作用、服务家乡提供了广泛、多层次的渠道,有利于统战部门培养发现更多的优秀党外代表人士。仙居县通过成立县乡村三级新乡贤联谊会、构建乡贤统战工作三大体系、实施“乡贤+行动”等,有效掌握和培育了3600余名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有社会参与能力的乡贤队伍,有效地把目前仍处在统战工作视野之外的一大批“建设者”和“服务者”涵盖在工作范围之内。各地新乡贤统战启动之后,党委政府和统战部门做本籍和外地各类人士的工作主动性均大大提高。绍兴市上虞区通过虞商联谊总会开展与外地商人的联谊工作,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发展虞商联谊分会10个,吸引会员3000余名。与集聚统战对象相关的是,新乡贤统战的情感集聚功能也值得注意。绍兴市上虞区通过“区乡贤研究会—乡镇乡贤分会—村乡贤参事室”三

级组织，着力做好乡贤之家、乡贤馆和名人故居等基地建设，为海内外虞籍乡贤打造“有人可找、有事可托、有情可诉”的家园。事实上，由于受“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等传统文化因子的影响，各地新乡贤联谊组织在从建立到拓展的过程中，其吸引力、凝聚力与日俱增。

（二）整合功能：增强基层统战工作合力，提升统战工作贡献

基层统战工作力量有限，若在民主党派、民族宗教、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各个方面全面出击、各自为战，必然导致工作忙于应付、浅尝辄止。若通过新乡贤平台把各项工作整合起来，把全部力量投入进去，则可以进一步畅通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新通道，也可以根据当地实际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彰显服务改革发展稳定的统战力量，并减少统战工作资源的浪费。调研表明，新乡贤统战在促进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的成就是丰富和显著的。对基层社会来说，新乡贤统战的作用更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中城市对全社会发展资源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资源禀赋难题。新乡贤是乡村中最具“视野”和“资源”的人士，能够起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开展新乡贤统战工作，有利于充分整合广大乡贤的资金、智力、专业、技术、人脉等优势，有利于引入外部资源来促进区域合作、招商引资、创业创新、乡村治理、社会公益事业、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等。安吉县灵峰街道碧门村积极发挥当地乡贤资源，与统战成员共同研究美丽乡村规划和创建等工作，加快了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创建工作进度。

（三）拓展功能：提高基层统战工作艺术，创新基层统战工作模式

中国乡村有着悠久的乡贤自治历史与传统。新乡贤统战的重要功能是把新时代现代化的治理模式、法治观念与传统地域文化、乡情文化有机对接，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崭新的统战工作模式。新乡贤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与理念中古与今、中与外、法与情、柔与刚、城与乡的辩证统一体。他们既有宏大视野，又熟悉本地乡情；既有法治理念，又有道德观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统战领域的完美体现。

新乡贤提供了柔性的协商治理方式。长期以来，由于基层社会的特殊情况，基层政府管理往往出现较多的管制色彩。新乡贤组织的协商民主功能，有效弥补了基层协商民主议事平台较少、乡镇没有政协一级组织的不足，有利于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新乡贤参与乡镇党委、政府重大决策，既丰富了民主形式、拓宽了民主渠道，又丰富了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对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推进乡村善治具有重要作用。绍兴市上虞区充分发挥乡贤的“人才库”“智囊团”作用，在重大活动举办、重大意见出台、重大项目实施上，做到“问政于乡贤、问计于乡贤、问民生于乡贤”，增强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务实性。

新乡贤统战有利于形成儒雅、亲和、平等、潜移默化的工作氛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战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讲求很强的工作艺术。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要有特殊的方式方法。统战工作的政治性很强，但不能过分强调政治性，更不能冷冰冰、硬邦邦，而要循循善诱、彬彬有礼，努力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聚人。各地乡贤统战做到了这一点。比如，为乡贤建立展览机构、编纂乡贤书籍，节日期间与乡贤交流乡情，乡贤参与公共事务。这些都是基层统战工作艺术提升的表现。

金华市金东区的两个案例最值得关注。其一是天下谱局金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是家谱续修、古籍修复、资料查找等，兼顾寻找宗亲、寻找家谱、寻找祖籍地等，积累了丰富的姓氏研究资源。当地统战部门认为，该公司是国内罕见的把中华传统宗族文化、寻根文化与现代科技紧

密结合的企业，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能够为港澳台海外同胞提供寻根、修谱服务；可以增进他们对中华文化、国家、民族、乡土的认同，可以在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中积极作为。统战部门对其加强业务指导，在其业务中植入更多的关于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的元素和方法，加挂“海联驿站”的牌子，使其成为对港澳台海外人士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地。其二是“吃遍全球”APP公司。该公司在海外拥有4000多块屏幕。在统战部门的联络下，该公司决定不定期播放港澳台海外乡亲回归、民族风情、家乡发展、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以增进港澳台海外同胞的故土之情。

新乡贤与统战的紧密结合给统战工作带来放大效应。台州市各县通过建立乡贤联谊会，搭建起基层党委政府与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着力引导乡贤在协调关系、凝心聚力、服务社会中主动融入、积极作为，发挥出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尤其是各县坚持统战性乡贤联谊会与民主协商会互促互进，鼓励乡贤参与乡村发展议事，共谋家乡事业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台州市乡贤联谊组织开展协商活动达6000余次，共对1100项民生决策达成共识，推动120个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化解矛盾纠纷810起。

（四）提升功能：增强基层党委领导大统战格局意识，提升基层统战工作激情与效果

一方面，通过开展新乡贤联谊会建设试点工作，基层党政领导班子主动运用统战优势在项目引进、社会稳定等工作中进行尝试，收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大量优质的统战资源和统战工作的独特优势，引起了基层党政主要领导的重视。他们开始主动参与统战，运用统战优势开展工作。安吉县天子湖镇党委书记李明多次赴外地拜访在外创业的乡贤，主动加强与统战成员的联系联谊，并主动督促乡镇党政班子加强“五联”制度的落实；灵峰街道党委书记马联合国主动与外地乡贤人士联系，运用统战资源优势解决了钉子户征地拆迁、老上访户上访、政府与群众司法纠纷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山川乡党委书记邱竟明通过加强对乡贤人士的联系，树立了当地乡贤人士榜样人物，使一批党建薄弱村的民风得到较大转变。

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建立乡镇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建设统战工作室、健全统战工作机制等工作，改善了乡镇统战工作基础薄弱的局面。过去，由于乡镇统战资源底数不清、缺乏有力的工作抓手和工作载体，乡镇统战干部存在乡镇统战“干什么”“怎么干”等诸多困惑，工作激情不高，工作不能深入推进，许多工作存在敷衍了事、流于表面的问题。开展新乡贤联谊会建设工作以来，乡镇统战干部通过统战对象摸排，搭建统战成员参与中心工作载体，工作思路和工作对象普遍清晰，工作激情得到提升。许多乡镇统战委员积极与统战成员接触联系，在完成常规工作的基础上，主动谋划统战工作。绍兴市上虞区建立区领导分片联系制，设立华北、华南、华中、华东四大联络站。区领导分片联系，依托虞商联谊会、校友会等平台，建立虞籍人士信息库，定期联络沟通感情，以走访、慰问、座谈会等形式广泛联系团结乡贤和虞商。

（五）挖掘功能：利用浙江作为文化大省、非公有制经济大省的丰富资源

浙江省各市县的方文化各有特色、丰富多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商遍布全国和全球，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这些文化和名人资源是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这些资源只是散见于各条战线，而不能形成规模效应、放大效应，未能发挥其支持当地发展的应有功能。新乡贤统战工作的开展，使一个汇聚地方经济文化资源的平台得以形成，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和谐等都具有积极作用。上虞区委统战部深入挖掘乡贤资源，有力夯实了乡贤文化传承发展的根基。在此基础上，上虞区以古贤感化今贤，以前贤影响后贤，以老贤培育新贤，促进乡贤队伍不断壮大，在浙江省内外都产生了良好影响^[14]。

四、新乡贤统战的升级与推广

新乡贤统战作为新生事物，其探索还处于相对初级的起步阶段。新乡贤统战存在如下突出问题：一是重经济、轻政治。虽然统战部门在新乡贤工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新乡贤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引导并不突出。一些县级“XX商大会”对招商引资、促进发展津津乐道，对团结引导的成果避而不谈，对如何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所知甚少。二是重索取、轻付出。各地对新乡贤提出的要求多且高，而对新乡贤的诉求关怀少，导致新乡贤积极性下降，工作持续性存在隐患。三是重实践、轻思考。各地对新乡贤统战的理论意义思考不够，特别是对于新乡贤联谊会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知联会、工商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等方面的关系如何处理，对新乡贤联谊会成员的政治待遇如何安排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作出有力的回答。四是重特色、轻规划。目前，浙江省各地新乡贤统战工作仍然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起步阶段，各地各自为战、参差不齐，领导格局、组织构架、工作重心、工作方式各有不同。多数地方虽然充分结合了本地实际，保持了本地特色，但尚未形成科学的标准、完善的机制，亟须加强引导和规范。升级和推广新乡贤统战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工作载体方面，应在县一级统一建立“新乡贤联谊会”

一是合理设置新乡贤联谊组织的层级。新乡贤统战的最佳层级配置在县乡两级。这是因为：县乡两级由于方言、风俗等文化习惯更加接近，工作更容易深入；县乡两级统战资源有限，需求也更加强烈；县乡两级统战成员相对较少，凝聚力更强，工作更有成效。县级党委应出台专门文件，对新乡贤统战工作作出明确规范，由县委统战部牵头抓总，成立县级新乡贤联谊会组织。在此基础上，推动新乡贤统战工作向乡镇（街道）、村（社区）和其他社会团体延伸，形成“县—镇—村”三级新乡贤统战工作网络。在总结推广经验的基础上，省、市两级可适时出台加强乡贤统战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二是进一步明确新乡贤标准。新乡贤的素质高低决定着新乡贤联谊会作用的发挥情况。新乡贤联谊会应是各行各业优秀人才和社会精英的汇聚之地，其成员的标准应为：政治坚定、德高望重、贡献突出、群众认同、热心公益。其成员主要包括当地著名党外知识分子、在外商人、港澳台海外同胞、在外地知名领导干部等。

（三）在工作目标方面，应兼具政治性、公益性、地域性和文化性

所谓政治性，就是新乡贤统战的目标是促进基层统战对象的进一步扩大、统战力量的进一步扩大、统战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所谓公益性，就是新乡贤统战必须有利于基层社会治理、协商民主、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发展。所谓地域性，就是新乡贤统战不应是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而应该在省级统战部门确定的基本原则、基本构架的基础上，根据本地资源的多寡厚薄，有侧重、有特色、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从而对本地的经济社会和统战事业发展起到更加突出的作用。所谓文化性，就是要在政治性、公益性、地域性的基础上，在方式方法上不断改进，使统战工作越来越讲究、越来越儒雅。

（四）在工作机制方面，应进一步强化统战性、科学性

统战部门要充分利用大统战工作格局抓新乡贤工作，形成新乡贤工作和基层统战工作“互融共赢”。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是新乡贤组织与其他统战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县一级，新乡贤联谊会组织应该成为县级统战工作的重要组织之一。但与其他统战组织相比，新乡贤联谊会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本地、外地与境外

的本籍同乡资源，广泛发挥他们推动本地各方面事业发展的正能量。在乡一级，要使乡贤联谊会组织成为整合基层所有统战对象的平台载体，成为乡级统战工作最主要的组织，并赋予其民主协商、社会公益、参政议政、招商引资、矛盾化解等功能。

二是新乡贤组织中各类成员的关系。应参照政协组织架构，在其中设立诸如“参政议政小组”“引资引智小组”“资政参事小组”等二级组织，使之各有分工、有分有合，在联谊活动中注重广泛参与，在参与各类助推发展事务中根据需要选择相关小组、代表人士参与。

三是党外人士和中共党员的关系。按照统战工作的一般原则，新乡贤组织应以党外人士为主。但实践表明，本地和外地退休干部、著名文化名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各类乡贤，同样愿意加入新乡贤组织，而且会起到明显的政治引导作用。

四是发挥作用与政治待遇的关系。新乡贤本身是一种荣誉称号，但仅有此是不够的，要进一步通过领导结对联系、政治待遇安排、政府挂职锻炼、各类培训活动、各种荣誉奖励等方式，持续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各乡镇街道要创造条件，建立乡贤工作室等乡贤活动中心，使乡贤有活动之“家”、落脚之“地”，使他们更加紧密团结在党委政府周围，与党同心同德、合拍共振。

五是统战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统战部门、各乡镇街道要积极对接经济职能部门，全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新乡贤回归提供优质服务。统战部门要积极对接人才办等部门，依托人才联谊会、异地商会协助做好新乡贤工作，强化联络联谊，增进发展共识。要积极对接文化部门，了解当地文化底蕴和代表人士，共同做好团结引导工作。

六是县乡两级组织之间的领导关系。县一级应建立新乡贤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或副书记任组长，各乡镇党委书记和有关县级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以为新乡贤统战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县委统战部作为牵头协调部门，应切实发挥指导、联络、把关作用，督促各乡镇高度重视、充分利用新乡贤，督促各乡镇统战委员建好组织、开展活动。

（五）在政治构架方面，应强调新乡贤统战姓“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新乡贤联谊会作为一种新的统战组织，必须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统一领导和具体指导。长远来看，应该在乡贤联谊会中成立党组织。要统筹推进新乡贤联谊会的建设、发展、运行等工作，重点抓好新乡贤联谊会领导班子成员的推选和培养，指导有序发展会员；成立新乡贤联谊会党支部，及时把优秀新乡贤发展到党员队伍中来；探索建立乡贤进入村级后备干部、“镇长顾问”等制度，推动新乡贤联谊会各项工作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台州市各县把“万名乡贤千村帮”活动与驻村“第一书记”有机结合起来，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仙居县新乡贤张新建由组织部门派驻岭脚村，紧紧抓住村班子建设这一关键，有效化解村班子内部矛盾，增加了凝聚力，解决了该村住房建设等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题。缙云推动“乡贤+党建”活动，组建新乡贤党员队伍先锋队，在筹资、服务、治理等方面发挥乡贤党员引领作用。温岭市开展“1名领导干部+1个企业+X个乡贤”结对帮村活动，33位领导干部、33家企业、3053名新乡贤结对33个经济薄弱村，落实合作项目750个、合作资金2.5亿元，安置农村劳动力就业13000多人，已有10个村完成农房改造，5个村顺利创建美丽乡村精品村。

（六）在照顾同盟者利益方面，应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培养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不但是统战工作的应有任务，而且是保证新乡贤统战工作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要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相关要求以及关于党外干部配备比例、数量指标的规定，做好新乡贤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特别是要重视抓

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外地浙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党外知识分子中代表人士的发展培养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浙江一些地方对这项工作比较重视：温州市注重打造港澳台海外乡贤代表人士队伍，建立了“世界温州人乡贤库”，探索建立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在县、镇两级开展试点，为代表人士政治荣誉安排提供基础支撑，通过培训提升他们的素质。该市已连续举办四届世界温州人影响力人物评选表彰活动，树立先进典型标杆，提升代表人士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七）在宣传推广方面，应厚植乡贤文化、扩大乡贤影响

乡贤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榜样和引领。要积极打响乡贤品牌，使广大新乡贤成为广为人知的人物，发挥其对社会风气的正面影响作用。要进一步挖掘新乡贤文化内涵，加强对新乡贤发挥作用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发挥新乡贤言传身教的正面影响，使新乡贤文化更具长远的生命力。在这方面，浙江省各地的做法颇有借鉴意义。一是通过仪式。三门县春节期间为每位新乡贤颁荣誉证书、送红榜，形成示范作用。临海市东溪单村新乡贤联谊会成立孝心基金理事会，每年开展“十佳孝心”评选活动，将评出的若干名孝子、孝媳在该村乡贤墙上予以公示，在村内外形成比孝心、比奉献和学孝敬、当孝星的浓厚氛围。二是通过媒体。绍兴市上虞区建立新乡贤宣传平台，开展“走近虞籍乡贤”采风和“虞籍乡贤故乡行”等活动，借助电视、报纸、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媒体宣传形式，打造“天南地北上虞人”“虞商联谊报”“上虞乡贤报”“上虞统战”四大宣传阵地，广泛宣传虞籍乡贤、虞商事迹，大力弘扬乡贤和虞商精神。三是通过场馆档案。台州市各县充分利用文化礼堂、书院等乡村公共平台，创设乡贤馆，汇编乡村“微档案”，修建名人乡贤墙，采集功绩突出、乡人推崇的乡贤感人事迹，讲好身边的新乡贤故事。

参考文献：

- [1] 李巨澜. 试论民国时期新乡绅阶层的形成及其影响[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4): 16-21+121.
- [2] 张兆成. 论传统乡贤与现代新乡贤的内涵界定与社会功能[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 154-160.
- [3] 李晓斐. 培育当代乡贤促进乡村发展[J]. 唯实, 2017(11): 75-76.
- [4] 杨国勇, 朱海伦. 新乡绅主政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6): 177-181.
- [5] 刘淑兰. 乡村治理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 理论月刊, 2016(2): 78-83.
- [6] 李传喜, 张红阳. 政府动员、乡贤返场与嵌入性治理: 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J]. 党政研究, 2018(1): 101-110.
- [7] 付翠莲.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J]. 地方治理研究, 2016(1): 67-73.
- [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 [9] 张玉玲, 李慧. 乡贤、乡土、乡愁: 探寻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N]. 光明日报, 2017-11-30(16).
- [10] 白现军, 张长立. 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11): 82-87.
- [11]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10-14(1).
- [12] 林坤伟. 首届世界丽水人大大会硕果累累[N]. 丽水日报, 2017-09-29(1).
- [13] 赵畅. 乡贤精神, 薪火传承——上虞市发掘和弘扬乡贤文化纪事[N]. 今日浙江, 2003(9): 42-43.
- [14] 叶辉. 浙江上虞传承乡贤文化[N]. 光明日报, 2011-12-21(1).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新乡贤统战工作

范景鹏^{1,2}

- (1.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民族宗教理论教研部, 甘肃 兰州 730070;
2.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与基层统战具有辩证统一关系, 统一战线能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法宝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为加强和改善基层统战提供了工作主题。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人, 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新乡贤为加强和改善基层统战提供了根本落脚点。现代新乡贤“新”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立场、服务城乡融合、具备现代知识、具有法治思维, “贤”在能够在助力发展、引领风气、化解矛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新时代, 要坚持党对“新乡贤”的政治领导, 通过联谊交友厚植乡情、将其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引导, 为其搭建平台、发挥其作用, 充分发挥新乡贤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新乡贤; 新乡贤文化; 基层治理; 软治理; 基层统战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8) 04-0086-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 根本在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 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深入开展‘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 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做好新乡贤统战工作, 对乡村振兴战略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 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 其中从“三农问题”角度开展的研究最多, 如王亚华、苏毅清的《乡村振兴——中国农村发展新战略》、刘合光的《乡村振兴的战略关键点及其路径》、廖彩荣、陈美球的《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等; 其次, 研究发展产业经济的较多, 代表性的成果有罗必良的《明确发展思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张强、张怀超、刘占芳的《乡村振兴: 从衰落走向复兴的战略选择》等。学术界对新乡贤的研究比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开始要早, 成果也比较多, 主要从乡村治理角度, 运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成果有王先明的《“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

DOI: 10.13946/j.cnki.jcqj.s.2018.04.009

作者简介: 范景鹏,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部副教授, 博士,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引用格式: 范景鹏.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新乡贤统战工作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4): 86-91.

黄海的《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颜德如的《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付翠莲的《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等。把乡村振兴战略和新乡贤结合起来研究是从党的十九大之后才开始的，多集中在文明乡风和乡村治理方面，更多的是新闻报道，从统一战线角度开展学术研究的成果还不多。

一、统一战线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辩证关系

（一）统一战线在党的农村工作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49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党的工作重心长期在农村，这一时期党领导建立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和农村工作有密切关系，统一战线对做好农村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好农村工作又对党的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7年八七会议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心由对国民党工作转向发动工农群众上来，开始致力于建立由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封建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1928年6月，党的六大决定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由组织全国暴动转到从事群众工作上来，组成“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1]。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作为主要工作对象。根据这一策略，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壮大红军，不断扩大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在农村。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发出了《关于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要求建立中共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这是一种“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2]。李维汉认为“三三制”是“统一战线在政权构成上的具体体现，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抗日统一战线阶段上的具体形式”；“统一战线政权及三三制，给了全国人民以光明的前途，给了中等阶层的人士以极大的鼓励”^[3]，“就靠共产党人自己在平日有充分的统一战线工作，多交朋友，并熟悉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及无党派的人士，而不是在选举时临渴掘井”^[3]。“各根据地建立的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所实行的各项新民主主义政策，表明根据地已经开始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逐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4]。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历史证明，如果不争取和联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不巩固工农联盟，就不能建立起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以武装起来的农民进行革命战争所形成的坚强的工农联盟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有可能同其他革命力量实行联合，革命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得到巩固和发展。”^{[4] 825}

（二）统一战线能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挥重要的法宝作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其规定：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

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城乡之间的表现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优秀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乡村地区人口空心化、知识匮乏、没有资本等一系列问题突出，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发达程度、现代化程度之间的差距缩小缓慢，甚至有拉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原来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转移到经济社会的其他领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其他身份主体。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增加了社会流动，导致中国农村从一元化、均质化的计划经济时代向多元化、异质化的阶层分化转变。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带来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贫富差距拉大，农民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并更加多元多样，随之而来的是矛盾纠纷不断增多。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历来是为党的工作全局服务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宏大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是巨大的，更需要用好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统一战线历来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战线拥有大量专家学者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可以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帮助党优化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增进团结的工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乡村振兴战略为加强和改善基层统战工作提供了主题

1. 解决基层统战工作问题。基层统战工作是整个统战工作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从政治领域向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拓展和由大中城市向小城市和广大乡镇延伸的趋势，基层统战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当前，基层统战工作点多面广、冷弱散现象、边缘化空心化等问题突出，出现无事可干、无人干事、无人可统的窘境。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为加强和改善基层统战工作提供干事的“主题”。统一战线成员要深刻领会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辩证关系、丰富内涵和任务重点，深刻把握统一战线在其中的职责使命，以此来凝聚广大成员的共同意志，把工作做到点子上、做到关键处，更好地紧扣大局，构建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

2. 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统战工作说到底是在做人的工作。新乡贤是指新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5]。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人物，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6]。新乡贤为加强和改善基层统战工作提供了根本落脚点，要紧紧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多做聚人心、得人心、稳人心、暖人心、顺人心的工作，通过“一根头发”带动背后“一把头发”；要引导新乡贤学习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思想精髓和根本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乡村振兴战略上来。

二、新时代新乡贤统战对象的特点与作用

（一）新乡贤的特点

1. 坚持党的领导。历史上，中国传统行政体制“皇权不下县”，县级以下的广大乡村主要靠乡贤自治来维持。在现代政治和组织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是领导一切的。乡

镇是党政的最基层组织 and 行政机构。乡村治理中，由村“两委”协助乡镇政府工作。其中，村党支部是村级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基层统战工作中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通过民主协商和广大党员的模范作用，使党的方针政策成为新乡贤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在党的创新理论和具体政策传播中，新乡贤可以结合自身知识优势、工作实践优势、社会阅历优势进行宣传解释，增强村民的认同感^[6]。新乡贤以各种组织形式协同参与基层治理，与村党支部、村委会之间是“辅”和“主”的关系、“谋”与“断”的关系^[7]。新乡贤通过基层民主协商，对村“两委”发挥着有益补充作用。

2. 坚持人民立场。在历史上，很多乡贤是地方的“大族头人”和地主头人，有着狭隘和自私的宗族立场或经济立场，有时还会激化基层矛盾；有的以权谋私，横行乡里，剥削和压迫穷苦人民，发展成“乡霸”和土豪劣绅。历史经验表明，只有真正自觉坚持人民群众立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维护群众利益，应当是新乡贤群体能否产生、发展的根本决定标准^[8]。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贯穿于统战工作之中。新乡贤不是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是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经常扑下身子，深入到百姓中间，倾听百姓声音，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说话办事。

3. 服务城乡融合。新乡贤不同于旧社会乡贤生于农村、长于农耕文明之中，难以超出农耕文明的窠臼和局限。现代文明下的新乡贤虽大多生于乡村、长于乡间，但学于城市、工作于城市、发展于城市，既受到“乡村文化”的熏陶，也受到“都市文明”的滋养。他们身已离土离乡、心已完成城市化。新时代赋予他们新的内涵，使他们具有现代文明的修养、视野和思维，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于一体。他们对生育养育自己的乡村充满了感情，拥有建设家乡的梦想和奉献精神，是城市与乡村的天然纽带。

4. 具备现代知识。旧社会乡贤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知识结构，比较狭隘和封闭。新乡贤虽然或多或少地依然保有着家族宗族观念、孝亲睦邻思想和落叶归根情结，但大多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素养，包括经济、金融、农林、信息、管理等现代知识结构；在实践中既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又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自身具备诸多优良品质，拥有更多更丰富的社会管理资源和经验，以及现代化理念和前瞻性视野；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是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时代精英。

5. 具有法治思维。旧社会的乡贤具有一定的执法权力，享有国家赋予的政治经济特权，可以制定族规束缚族众，训诫族众遵守封建法纪，对违犯族规者给予制裁等，是控制乡土社会的实际权威。但新乡贤既不享受旧乡贤的特权，更没有执法权力，和乡民们一样在法律面前平等。新乡贤是乡村依法治理的模范遵守者和践行者，有助于树立起宪法法律和村规民约在基层群众中的权威。新乡贤本身具有的法治思维，可以协调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公众与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9]。要以法治思维和方式调节社会矛盾和关系，用法治规范社会秩序和管理基层事务。新乡贤群体可以积极推动村规民约的制定，运用专业知识或外界力量对村规民约进行一定的合法性审查^[10]。

（二）新乡贤的作用

1. 助力发展。新乡贤是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乡村先行者，有很多是具有创业、营销与技术方面能力、德才兼备的“能人”。他们不仅自己实现先富，也言传身教或无形示范带领村民致富，吸引乡民争相学习、效仿，对促进村民致富、乡村发展具有重要示范带动效应。他们还能发展各类合作经

济组织和专业协会，从而带动当地特色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引领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新乡贤中的致富能人能够成为农村发展的“领头雁”，充当连接城市与农村、传统与现代的媒介，能够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更多地传播农村特色产品信息。他们的带动能力将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为乡村振兴注入内驱力。

2. 引领风气。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深厚根源，古代乡贤的做法和言行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影响乡村社会文明氛围的形成和文明观念的树立。新乡贤继承了传统乡贤弘文励教、道德教化和民风培育方面的作用，既传承了传统乡绅的优点，又具有现代文明的特点。他们善于利用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教化作用，是现代文明乡风的示范引领者。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有利于教化乡民、涵养文明乡风，使村民遵循正确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11]。

3. 化解矛盾。古代先贤因自身智慧、学识和道德品行高尚而受到当地乡民尊重和认可，在乡村社会享有很高的声望，是维护基层稳定、维系乡村和睦的重要力量。研究表明，在民间矛盾纠纷的解决中，乡民对情感的接受程度往往比对法律的接受程度要高，很多时候乡贤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道德为先、国法为据的准则处理矛盾^[12]。新乡贤作为乡中德高望重的人，凭借其在乡村的威望和缘人情、顺人性的优势，由其所组成的乡贤组织用“百姓法平百姓事”化解矛盾纠纷，用乡贤“软治理”来破解农村“硬难题”，可以事半功倍、及时有效化解民间纠纷和矛盾，促进乡村和谐和稳定，焕发农村社会治理的新生机和活力。总之，要构建起以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新机制，做到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

三、新时代新乡贤统战工作的思路

（一）联谊交友，厚植乡情

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基层领导要从政治高度来看待联谊交友工作。良好的生态环境、醇厚的人情关系、丰富的民俗活动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新乡贤统战工作要以乡情、乡愁为线索，发挥“同乡会”“团拜会”和各种仪式性活动的作用，搭建沟通平台，积极拜访慰问在外乡贤，与其增强情感维系；要借助“互联网+”的方式，发挥传统媒体、新媒体的优势和力量，大力宣传思乡文化和“福泽乡梓”的义利文化；要鼓励新乡贤回乡参与文化事务、投资基础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要积极创造条件，使外出的乡贤愿意返回家乡或以各种方式支持家乡建设；要从乡村挖掘新乡贤的感人事迹，使之成为全社会的群体意识和共同追求；要加强舆论宣传，增强新乡贤群体的名誉感、自我价值感、社会认同感，形成尊重新乡贤、培育新乡贤、支持新乡贤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组织起来，政治引导

根据《半月谈》记者调查采访，新乡贤由以下几类人群构成：一是有威望的退休公职人员，二是有影响力的成功经商人士，三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四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返乡务工人员。新乡贤从空间上可以分为“本土乡贤”“居城乡贤”“返土乡贤”。县级政协和县委统战部要统筹安排新乡贤统战工作，由乡镇具体落实、村社日常联系联络；要由乡镇党委书记或副书记亲自抓新乡贤统战工作，在不增加编制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新乡贤的职能设立产业发展理事会、乡风民俗理事会、矛盾调解理事会等，把新乡贤组织起来；要通过有组织的培训和轮训，对新乡贤进行思想政治引导，不断增进其政治认同，增强其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把握能力；要引导新乡贤树

立正确的大局观念，时刻保持为村民无私奉献的本心，提高为村民服务的意识，提升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文化平台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水平。

（三）搭建平台，发挥作用

打破城乡人才资源双向流动的藩篱，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把有志于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新乡贤引回来，让城里想为乡村振兴出钱出力的新乡贤在农村有位、成就事业，让那些想为家乡做贡献的新乡贤找到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和平台；要根据时令、时节和任务及时召开“诸葛会”，如逢婚丧嫁娶、重要节日，议定程序、仪式，制止天价彩礼、铺张浪费、盲目攀比，遇有重大社会矛盾和隐患，组织相关乡贤积极奔走调停调解；要完善定期与新乡贤举行座谈会议制度、联系走访制度、组织形势报告会和有关讲座等制度；要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决策参谋、调查研究、政策指导、推动落实等方面的作用。各部门要协同配合，加强工作指导，强化资源要素支持和制度供给，形成工作合力。

（四）扫黑除恶，纯洁队伍

新乡贤的统战工作要和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将其摆到工作全局中的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切实将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切实落实农村的公开、公示、公平、平等制度，加强基层村民的民主监督，完善民主监督渠道；警惕和防止少数有才无德的人渗透到新乡贤组织中来，净化新乡贤队伍，保持新乡贤的完整性与纯洁性，形成长效机制，为新乡贤的培育、团结、使用创造安定和谐的环境。

参考文献：

- [1] 周恩来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07.
-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44.
- [3] 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43.
-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M]．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560.
- [5] 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20-29+144-145.
- [6] 李思琪．新乡贤：价值、祛弊与发展路径[J]．国家治理，2018（3）：28-36.
- [7] 丁宁宁．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J]．黑龙江科学，2017（7）：52-53.
- [8] 任九光．“乡贤”的历史发展与近代突变——兼论新乡贤建设应汲取的历史经验教训[J]．教育文化论坛，2016（3）：123-130.
- [9] 陈锦文．公共治理视域中新乡贤的角色与功能探讨[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7（4）：8-14.
- [10] 李金哲．困境与路径：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乡村治理[J]．求实，2017（6）：87-96.
- [11] 崔雪，崔恒．新乡贤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以湖北省鹤峰县为例[J]．行政科学论坛，2017（4）：47-50.
- [12] 刘俊巧．新乡贤治村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学理论，2017（2）：21-22.

责任编辑：孙德魁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的由来新探

路璐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创始人, 但是他们在阐述这一思想时并没有用过“统一战线”这个词, 而是使用了“同盟”“联盟”“团结”“联合”等词汇。列宁和斯大林创制了统一战线这个专用名词。这一专有名词经共产国际定型后, 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流传开来。1922年5月, 陈独秀将“United Front”译为“联合战线”。1925年5月, 邓中夏将之改译为“统一战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使统一战线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统一战线;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 统一战线学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8) 04-0092-08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指出: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统一战线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统一战线实践经验的系统化知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厘清其核心概念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统一战线学的核心概念就是统一战线。对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问题, 现有研究和著述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统一战线是译自英文“United Front”。那么“United Front”又从哪儿来? 究竟是哪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制了这个词? 这个词又是如何传到中国来的? 本文以现有研究成果为线索, 依据马克思主义原文典籍, 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的来龙去脉做进一步的梳理和考证。

一、国内研究成果综述

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来源的研究,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两部: 一部是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著的《统一战线 100 个由来》(2010 年出版, 以下简称《由来》), 另一部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秘书长朱真撰写的《统战理论讲座——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纲要》(1989 年出版, 以下简称《纲要》)。其他著述^①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的说法大多转引自这两部著作。《由来》认为, 马克思、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8.04.010

作者简介: 路璐,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山东大学统一战线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5 级统一战线学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 路璐.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的由来新探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4): 92-99.

^① 如姜汝真, 等. 统一战线思想史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孙信, 张树桐.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发展史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5.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主要创始人，恩格斯最早提出和使用了统一战线概念，1840年10月17日，他以弗·奥的署名在《知识界晨报》第249号上发表文章《唯物论和虔诚主义》，其中写道：“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1892年3月8日，恩格斯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再次使用了统一战线的概念。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要善于运用革命策略，“如果射击开始得过早，就是说，在那些老党还没有真正相互闹得不可开交以前就开始，那就会使他们彼此和解，并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我们”^[1]。

《纲要》提出，马克思最早使用统一战线概念是在1869年11月29日致路·库格曼的信中。信中谈到，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英国人民就还得受统治阶级的摆布，“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2]。

《纲要》认为，真正系统地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一战线这个特定概念的是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1917年7月16日，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些人是愿意同反革命作斗争的，“我们准备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同他们联合起来”^[2]。《由来》则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1917年7月，斯大林指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右翼“已经出卖了革命统一战线，和反革命结成了联盟”。列宁使用统一战线概念的时间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当时，列宁曾设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党派要建立所谓的联合政府。对此，1919年、1922年，列宁曾多次使用统一战线的概念，揭露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结成反革命联盟，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行为^[1]。《纲要》提供了列宁当时使用统一战线概念的文本：1919年7月31日，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而提议——象你们听到的那样——建立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2]根据朱真的研究，列宁、斯大林和俄共（布）此后在国内问题上就很少提及统一战线了。朱真认为，1919年3月在列宁直接领导下成立的第三国际，系统地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围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方针、政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概念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使用，成为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策略的重要内容。

《由来》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初使用的是“联合战线”概念。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发表《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该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得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中共二大正式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写进党的文件。最早改用统一战线概念的是瞿秋白。他在1925年8月18日发表的《“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一文中提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1]此后，统一战线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用语。

上述研究成果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的来龙去脉基本说清楚了——恩格斯最早提出并使用了统一战线概念；随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曾在不同语境中从正反两个方面使用过这个概念；到第三国际，这个概念被各国共产党广泛使用；1922年和1925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先后以“联合战线”和“统一战线”表述把这个外来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研究者们所依据的经典著作都是中文译本，而非原文典籍。除了中国共产党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人是陈独秀，他对这个概念的最初表述是“联合战线（UNITED FRONT）”这个环节确定无疑之外，整个链条的其他环节仍然有待确认。第一，陈独秀首次用中文写下“联合战线”四个字时，后面括号中的那个英文词“UNITED FRONT”是从哪儿来的？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提及统一战线时，用的是这个英文词，还是相应的德文词或俄文词，或者其他什么词汇？要解答这些疑问，只能回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典籍中去。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未使用过统一战线这个专用术语

概念是用语词来标示和记载的。专用概念以专用术语来标示和记载。中文统一战线对应的英文是“United Front”，德文是“Einheitsfront”，俄文是“единый фронт”^①。

恩格斯是否在1840年提出并使用了统一战线这个词？恩格斯以弗·奥署名发表的《唯物论和虔诚主义》一文的中文译本中的确有统一战线这个词：“迄今为止，虔诚主义认为它的对手被分为许多派别是上帝的善行，但愿它终究会感到，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3]这段话的德文原文是：“und der Pietismus, der es bisher für eine Schickung Gottes ansah, daß seine Gegner in so viele Parteien unter sich selbst zerfielen, spüre nun auch einmal, daß wir alle zusammenhalten, wo es den Kampf gegen die Finsternis gilt.”^[4]统一战线的对应德文是“alle zusammenhalten”。按照德文习惯，名词的首字母应该大写。显然，“alle zusammenhalten”既非名词更非专用术语。此句直译应为：“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团结一致。”因此，说1840年恩格斯最早提出和使用了统一战线这个词，应该是个误会。

马克思是否在1869年使用过统一战线这个词呢？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写道：“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它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还倡议取消1801年所实行的合并，以自由联盟的关系去代替这种合并以前，它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做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英国人民就还得受统治阶级的摆布，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6]这封信的原文是德文，含有统一战线一词的短语原文是“weil es mit ihnen gemeinschaftlich Irland gegenüber Front machen muß”^[6]。其中几个关键词：“gegenüber”是介词，基本含义是“在…的对面”，在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各种搭配中可以表达“与某人、某物的排斥、对抗、敌对”的含义。“machen”是动词，意为“结成”。“gemeinschaftlich”是形容词，意为“共有的、共同的”。这里出现了“Front”一词，而且首字母大写，可以将之译为“战线”。“gemeinschaftlich”和“Front”中间隔着两个词，虽然含有共同阵线或结盟、联盟的意思，但不能就此认定其为统一战线的表达式。这个短语可以直译为“共同反对爱尔兰的战线”。

恩格斯是否在1892年3月8日致倍倍尔的信中使用过统一战线这个词呢？信中相关的中文段落为：“对于正在逐渐组成的反动的一帮，我们现在还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当我们自己还无法能动地创造历史时，我们所希望的是历史的发展不致停顿，为此，就需要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相互倾轧。就这一点来说，当前的制度是异常可贵的——它在为我们创造这些条件。如果射击开始得过早，就是说，在那些老党还没有真正相互闹得不可开交以前就开始，那就会使他们彼此和解，并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我们。”^[7]信的原文是德文。被译为统一战线的德文原文是“einmütigen Front”^[8]。“einmütigen”是形容词，意为“一致的、同心协力的”。“Front”首字母大写，显然是名词。“einmütigen”修饰“Front”，可译为“统一的战线”，将之译为统一战线也说得通。共产国际四大文献中表达统一战线概念的德文词是专用术语“Einheitsfront”。“einmütigen Front”相当于一个词组，或一个语词搭配，可以看作是统一战线的初始表达形态，但恩格斯用这个词组指的是反动势力的统一战线。

① 时佳. 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发布（2015年第四期）[EB/OL]. (2015-07-23) [2018-06-25]. http://www.cctb.net/bygz/zywxsy/201507/t20150720_325517.htm.

上述考证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意义上使用过统一战线这个词，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思想的创始人。那么他们又是怎样阐述统一战线思想，用什么词汇来表达统一战线这个概念的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很早就注意到欧洲反动势力联合的现象。他们为此提出，各国工人为了反抗共同的敌人，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战斗。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17周年的国际大会上各自发表了演说。马克思在演说中指出：“各民族的联合（Vereinigung）和兄弟联盟（Verbrüderung），这是目前一切派别，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一句口头禅。的确，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Verbrüderung）。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是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vereinigt）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vereingt）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9]恩格斯在演说中提出：“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Verbrüderung der Arbeiter aller Völker）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9] 315-316}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战略作了全面阐述。《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实现自身联合的战略思想。这是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机器使各种劳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Koalitionen）”^{[9] 409}，“他们斗争的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Vereinigung der Arbeiter）。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9] 409}，“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总是民族的斗争。每一个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首先当然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9] 41}，“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9] 419}。《宣言》阐明了共产党人联合和支持一切政治力量共同反对主要敌人的斗争策略。“在法国，共产党人联合社会主义民主党去反对保守派的和激进派的资产阶级”，“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党人”，“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侩”^{[9] 434-435}。“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宣言》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ach!^[10]）”结尾^{[9] 435}。

1850年，马克思为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在总结革命的策略时，马克思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要联合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9] 499}，“这一次无产阶级是革命联盟的首脑”^{[9] 534}。在革命进程中，农民、小资产者、整个中间等级将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组成“各种不同利益的联合”^{[9] 530}。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中央

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以下简称《同盟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之一。标题中“同盟”一词用的是“BUND”,这个词的本义为“有血缘关系的兄弟般的联盟”。《同盟书》特别指出,工人党在未来的革命中必须独立地、最有组织地进行活动。“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跟无产者缔结的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Allianz)。”^{[9] 558}

对上述文献的考察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使用过统一战线(Einheitsfront)这个专用术语。他们在阐述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思想时,使用的是“同盟”“联盟”“团结”“联合”等一系列词汇,而最接近“Einheitsfront”的是词组“einmütigen Front”。

三、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创制了专用名词统一战线

确如《纲要》所说,真正提出并使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这个特定概念的是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而且斯大林先于列宁。1917年7月16日,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多次使用统一战线(единый фронт)一词:“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工人和布尔什维克,那么反革命是可以击败的,但是他们开始打击布尔什维克,破坏革命统一战线”^[11],“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开始打击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反革命就明白革命统一战线(единый фронт революции^[12])已经破裂了”^{[11] 112}。斯大林指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同“护国派结成联盟反对革命”,因此不能同他们联合,但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些人是愿意同反革命做斗争的(在社会革命党人中有卡姆科夫派,在孟什维克中有马尔托夫派),我们准备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同他们联合起来”^{[11] 114}。1921年12月18日,斯大林在《前途》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工人的统一战线”(еди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фронт):“在工人阶级中间就产生了为建立工人的统一战线和争取成立工人政府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特别是德国),这个运动要求工人阶级中一切或多或少带有革命性的派别(从‘温和的’到‘极端的’)达成协议和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3]

1919年7月31日,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使用了“社会主义统一战线(едины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фронт)”的提法:“有人向我们提议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说,这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他们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动摇,倒向资产阶级”,“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的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人,即建议同那些动摇不定、在俄国革命史上两度倒向资产阶级的分子实行联合的人”^[14]。这里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指的是要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结盟,列宁显然是拒绝这种主张的。

“工人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在列宁的指导下作为一个重要策略提出来的^[15]。1921年前后,列宁逐步认识到世界革命走上了缓慢、曲折发展的道路,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强调需要“革命的准备”,并推动共产国际在策略上由“直接进攻”转向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三大提出了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同时提出了实现这一任务的实际办法:统一战线策略。1921年6月,《论策略》指出:“共产国际的世界性的政治任务,不是就某些重大事件开展示威运动,而是通过建立联合战线,来经常加强共产党人在不断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联系。”^[16]1921年12月,以列宁的建议为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和关于对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人以及对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的提纲(以下简称《十二月提纲》)。其中明确提出,“工人统一战线就是一切愿意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的统一战线”^[17];为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都必须支持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为此,“允

许各支部同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各政党和各工会达成协议”。共产国际“自己显然不能拒绝在国际一级上达成类似的谅解”。1922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讨论和批准了《十二月提纲》。

上述考证表明，统一战线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专用术语，是由列宁和斯大林创制的，并经过共产国际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流传开来的。早期，对统一战线概念的标准表达主要有三种语言：俄文“единый фронт”，德文“Einheitsfront”^[18]，英文“United Front”，并应当是在1921年的《十二月提纲》前后定型的。

四、统一战线概念传入中国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十二月提纲》曾载于1921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19]。从前后时间判断，1922年5月，陈独秀文章中的“联合战线（UNITED FRONT）”应该来自共产国际。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发表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红色工会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联合宣言》（“ECCI-RILU MANIFESTO ON THE UNITED FRONT”）^[15]。这时，“UNITED FRONT”显然已经作为一个术语被固定了下来。这次远东大会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指南，分析了远东各国及中国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议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国内各革命势力，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均派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以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问题。1922年上半年，参加远东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回国，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与传达。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刊登了署名G.S.的文章《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文中指出：“第三国际在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到八月七日第二次大会中所议决的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方针。去年的第三次大会，据报上的记载，对于这些原则并未变更并且主张严厉执行。”“依照上面所述的根本原则，国际共产党对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大政方针是：联合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有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一起，同力共事于革命的争斗以达到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不如此，民族平等和民族受压之是不能消除的。”^[20]这里所谓的“大政方针”正是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提出的，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而闻名于世的统一战线策略。这意味着，至少在1922年1月，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已经传入中国，只是署名G.S.的文章还没有用统一战线这个专门术语来表达。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发表署名文章《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文中第一次出现了“联合战线（UNITE FRONT）”这个术语^[21]。这表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从英文引入并创制了自己的中文术语“联合战线”。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首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中国现存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以“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22]。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联合战线”这个概念。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统一战线”^[23]。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统一战线”的议决案》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必须联合“全国革新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统一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23]。

根据共产国际文献的中文译本，党内最早使用统一战线一词是刘仁静在向共产国际四大提交的报告中提出的。但是因为目前还没有见到中国共产党当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原件，无法确定上述报告是用中文，抑或用别的什么语言写就的。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刘仁静在《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说：“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24]

目前可以确实查到的中共党内最早改用统一战线一词的是邓中夏。1925年5月31日，他在《中国劳动运动的新生命》一文中写道：“此次大会（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议决工农联合，而且实际上举行两次工农兵联合大示威巡行，便是建立全国被压迫革命势力之统一战线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因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总联合机关，加入它，便是建立全世界被压迫革命势力之统一战线。”^[25]此后，1925年8月18日瞿秋白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一文中再次使用了统一战线概念：“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所以‘五卅’以后反帝国主义运动确已进了革命行动的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已经不仅是宣传上的口号，而成了群众斗争的实际目标了。”^[26]党中央的决议中首次使用统一战线的概念是在1926年7月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文件指出：“我们除了在政治上得到左派的拥护外，还要努力在乡村间努力实行各阶级的统一战线，使各种民众在统一战线之下组织起来。”^[27]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统一战线，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运用得炉火纯青，以致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重要法宝的是毛泽东。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八年的革命经验。他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28]

五、结 语

概念以语词为载体，是思维工具，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话语体系中，往往用不同语词来表达同一概念，甚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话语体系也可能采用不同语词来表达同一概念。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正是这样一个概念。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文明中产生出来的，西方政治理论表达这个概念的词是“同盟”或“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学说，但他们表达统一战线概念时，并没有创造新的词汇，而是沿用“同盟”或“联盟”以及“联合”等词汇。作为专用术语，统一战线一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创造。中国共产党从苏俄和共产国际引入“United Front”，最初将之译为“联合战线”，后来又改称“统一战线”。它在长达90多年的实践中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

参考文献:

-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统一战线 100 个由来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1-3.
- [2] 朱真. 统战理论讲座——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纲要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9: 1-4.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33.
- [4] KARL MARX FRIEDRICH ENGLES, ERGÄNZUNGSBAND, SCHRIFTEN MANUSKRIPTE BRIEFE BIS 1844, ZWEITER TEIL, DIETZ VERLAG BERLIN 1973: 101.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625.
- [6] KARL MARX FRIEDRICH ENGLES BAND 32, DIETZ VERLAG BERLIN 1965: 638.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8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94.
- [8] KARL MARX FRIEDRICH ENGLES BAND 38, DIETZ VERLAG BERLIN 1968: 292.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13.
- [10] KARL MARX FRIEDRICH ENGLES, BAND 4, DIETZ VERLAG BERLIN 1959: 416.
- [11] 斯大林全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 109.
- [12] И.В. СТАЛИН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3, Москва 1946: 112.
- [13] 斯大林全集: 第 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96.
- [14] 列宁全集: 第 3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126-127.
- [15] Jane Degras, “Extracts from an ECCI-RILU Manifesto on the United Fron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ume 1, 1919-1922, Published by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316-317.
- [16] 王学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第 32 卷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399.
- [17]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1919-1932, ПАРТИЙ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1933: 310.
- [18] Protokoll des Vierten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Petrograd-Moskau vom 5. November bis 5. Dezember 1922, Verlag Carl Hoym Nach. Louis Cahnbley Hamburg 8, 1923. Feltrinelli Reprint in con la biblioteca dell'Istituto G.G. Feltrinelli 1967: 1029.
- [19] 列宁全集: 第 4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585-586.
- [20]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先驱 无产青年 工人宝鉴 [G].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4: 5-6.
- [21] 陈独秀文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51.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97.
- [23]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献选集: 第 1 册 (1921 年—1925 年)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115.
- [24] 王学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 第 35 卷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70.
- [25] 邓中夏全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550.
- [26]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向导③ [G].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4: 1146.
- [27]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献选集: 第 2 册 (1926)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250-251.
- [28]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05-606.

责任编辑: 孙德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政商关系： 从冲撞到磨合再走向飞跃

耿 曙

（浙江大学 社会学系，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政商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考察。第一阶段是所谓“八零体制”下的政商互动，时间约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前期，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通过政商关系的运作，逐步打开中国的市场经济。第二阶段是“九零体制”下的政商互动，时间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主要的发展是国家与市场相互磨合，形成稳定的政商互动模式。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八大召开。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发展走向全新飞跃的阶段。展望未来，我们期待通过政商关系变革，再落实一轮“政府主导”的发展方略，创造比二战后“东亚奇迹”更大规模、超越世人想象的“中国奇迹”。

关键词：政商关系；政企关系；发展型国家；亲清政商关系；改革开放；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8）04-0100-06

一、从政商关系看改革开放四十年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历程，这期间的社会变迁主要是由经济变化驱动的，而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又总离不开“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动^[1]。因此，如果能够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入手，检视改革开放的历程，所获致的识见将会更透彻深入，也将更有启发。但说起“政商关系”，它不完全等同于“政企关系”。虽然两者指涉的对象类似，但“政企关系”侧重两类组织的互动，更加强调制度化的交流，更适合观察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经体制。反之，“政商关系”则突出两类人群的往来，更加强调个人化的互动，更有助于理解非西方国家的政经结构^①。当然，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政商关系”听来有点双方界限不明，纠葛不清，甚至还带点寻租、腐败的味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8.04.011

作者简介：耿曙，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引用格式：耿曙.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政商关系：从冲撞到磨合再走向飞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4): 100-105.

^① 详见斯蒂芬·哈格德. 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M]. 刘丰,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09; 康灿雄. 裙带资本主义: 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 [M]. 李巍, 石岩, 王寅,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巫永平, 吴德荣. 寻租与中国产业发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道，但本文后续会说到，“寻租”与“寻利”本就一线之隔。当年的政商关系大大激励了招商引资，将中国推向“世界工厂”^[2]的地位。当然在那之后的发展中，政商关系本身也成为检讨与改革的对象。

如果从“政商关系”的角度着眼，关照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过往四十年中，中国的政商关系既驱动政经体制变化，也深受政经体制束缚，两者的冲突与磨合交织出改革开放的跌宕起伏。这条线索将有助于掌握中国改革的特征与步履。笔者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政商互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首先是“八零体制”下的政商互动，其时约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前半期。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企业重获动能，政商关系复苏，并通过政商运作一点点的凿开市场运作的空间。其次是“九零体制”下的政商互动，其时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21世纪1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主要的发展是“政府”与“市场”相互磨合，形成稳定的政商互动模式，一方面创造出“中国奇迹”，另一方面也不免渐趋僵化，产生不少腐化现象。眼见中国的政商关系将一步步陷入上述“制度陷阱”，无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此时又幸运地迎来了激动人心的党的十八大^[3]。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走向政府强势振兴阶段，国家发展迈向全新飞跃阶段。

二、政商关系的“八零体制”：政商关系复苏，逐步开辟市场

先从掀起巨浪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说起。撼动传统计划体制的浪潮当然是“由上而下”掀开的，但主要是通过政商关系的传导，才一点点冲出了市场运作的空间。

政商关系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关键角色，要从比较的角度出发才能看明白。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引领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通过激活体制以达到维护体制的目的，在性质上绝非冲击体制的“革命”。20世纪60年代以降，苏联、东欧此起彼伏的各种改革既希望维持计划体制，又要求导入市场机制，两者互相龃龉，结果改革纷纷下马^[4]。相较之下，中国改革却大相径庭，既基本维持体制，又成功创造市场。一方面，通过体制的协调掌控，改革步伐逐步展开；另一方面，生猛发展的市场经济，抬高了政权威望。这样的“改革奇迹”怎么发生的呢？正是活跃于基层的政商关系，才使中国在计划经济的铜墙铁壁上硬开凿出市场运作的空间^[5]。换句话说，政商之间的绵密互动，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终能与众不同的关键所在。始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政商关系进程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政商关系出现时农村改革已经铺开，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各种产业、各种身份此起彼伏。但对于主导经济活动、类似“守门人”的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政策要求支持国有部门；另一方面，历来交流仅限相关单位，与新兴经济力量素无瓜葛。但是缺乏地方政府许可，游离体制之外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缺乏竞逐关键资源的机会。如果继续维持国有部门独大，市场机制将难以存在。这一切的变化从哪里开始呢？关键就在政商关系。原来对地方政府而言，一边是具有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自恃其无可取代，并不尊重迎合地方政府；另一边是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基本属于发挥浑身解数，百般讨好政府官员。结果我们在基层看到的是，地方政府无论于公于私，似乎还保护着国有部门，但在具体做法上却一次次给乡镇或民营企业开口子，放宽各种进入障碍，容许他们竞争资源。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对地方政府而言，即便掌控关键资源，倘若企业缺乏竞争，仍然没人“买政府的账”。根据实地调查，在中国的最基层，正是基于上述政府“寻租/设租”的心理，通过政商关系的运作，竞争才一点点被创造出来，市场就这么一步步得到开放。当然，这样极其有限的开放，一般顶多只能做到地方层次、少数企业间的有限竞争，远远谈不上大开大阖、全面开放的市场竞争。因为再进一步放开竞争，不利于上述少数产商。所以他们借助之前建立的政商关

系，帮助防范继续的市场开放。换言之，这类政商关系先促进了竞争，之后却又限制了竞争。

第二类政商关系的运作源自另一波的寻租努力：有来自外地的，往往拥有靠山，要求硬分杯羹；也有来自本地的，有的通过多角经营延伸，有的船小掉头转向，纷纷通过政商关系，打入上述寡占市场，试图利益均沾^[6]。经过这一波又一波的“进入”攻势，农村基层一多半的商品、服务领域，就一步步走向市场竞争了。从制度的角度看，市场进入门槛被逐渐垫平，国有企业也要竞争图存。中国越来越走向“竞争性市场经济”。当然，上述竞争局限于地方/区域市场，要再迈向全国统一的市场流通与竞争，就需要通过第三类政商关系的运作。

第三类政商关系运作主要建立在前两个政商关系类型的基础上。由于企业百般结交政府，形成密切的政商互动，政府支持当地企业，企业也配合当地政府，编织出一个个“地方利益共同体”。各共同体虽以政企联盟为核心，但彼此却在市场上相遇，通过各种产品进行竞争，终于慢慢扩张为全国性的竞争市场^[7]。钱颖一等学者将这种地方政府带头的商业竞争称为“中国式的联邦体制”^[8]。换言之，“中国式的联邦体制”的特色就在于密切的政商互动。

回顾“八零体制”下政商互动的演化，可以将其总结如下：体制通过政商关系运作，为市场经济开拓空间；而市场机制不断扩张发展，又强化了政府的治理威望。因此，虽然经济制度经历巨变，政府地位却丝毫未有动摇。处于这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追随着发自农村（集体）、渗透城市（国有）的市场经济步伐，中国政商互动的模式自然迥异于西方做法，但却与中国传统类似。例如在政商关系的结构上，企业必须嵌入国家体制，取得政府鼎力支持，才能壮大繁荣。另一方面，在政商关系的运作上，企业又得藉由个人网络，通过人际信任超越体制内部分割，才能搭桥牵线、整合各种资源^[5]。从这个角度看，政商关系的“八零体制”是从革命年代的环境中迅速解放出来的，但就其结构与运作来看，它又受到“乡村包围城市”的影响，反而具有回归传统模式的倾向。

三、政商关系的“九零体制”：国市关系磨合，变通体制巩固

结束了“八零体制”，受到“九二南巡”触动，时序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发展。一方面，国家经过了转型期的经济社会冲击（如经济过热、过度放权、金融危机等），另一方面，鉴于之前的教训，党与政府提高了警觉。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启了由中央主导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央地分税、国企改革等，终于迎来了“九零体制”^①。经过上述改革之后的政商关系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考察。第一，整体的政商关系结构受到“抓大放小”影响，政府掌控战略要地，让出大量经营空间，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共处与合作关系；第二，经过反复制度实践，之前国家介入经济、企业等级结构之类“变通性的制度安排”逐渐得到巩固夯实，似乎将长期延续下去^[9]。

处于这样的结构下，市场力量固然得到强化，国家权力也得到进一步伸展，一步步磨合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如果进一步观察政商关系的“九零体制”，我们可以发现：首先，由于中央集权压抑地方机会主义，深深困扰“八零体制”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其次，受到产业结构“抓大放小”影响，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各有空间，磨合出相互搭配与合作的关系^②。如果再进一步观察，那么支撑经济体制运作的法治条件明显改善：企业地位得到更好保障，经营空间也更加明确稳定。但与此同时，政府的市场监管、资源配置能力也在逐步强化。在“九零体制”的经济结构之下，企业依附政府的总体格局并没有出现本质变化。

① 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M]。3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② 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吴晓波。激荡四十年：中国企业1978-2018[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若再拉开历史纵深来观察，不同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政府面对冲击，尚未适应市场环境；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政府已经娴熟因应，可以驾驭自如。也因此，前者仍然牢牢掌握体制的“制高点”；另一方面，所谓市场转型仍有其局限性。换言之，处于“九零体制”之下，制度化仍是有底线、有选择的。在这样的权力基础上，企业只能极力寻觅、猎取获利机会，仍难自由组织，进而尝试影响政府决策，为企业经营创造空间^①。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阶段的政商关系仍是前一个时期的延续，但是经过逐年磨合，政府与市场取得妥协并有良好互动。一方面，国家更加尊重产权、开放企业参与竞争。另一方面，企业也在嫁接体制资源，积极投资生产，试图扩大获利。就在这样“国家-市场大妥协”的基础上，中国一方面创造出增长奇迹，傲视全球；另一方面也伴随腐败问题增加。当然，在上述的整体趋势之外，也形成各种丰富多样的地方体制^[10]。一方面，中央、地方有别，上游、大型企业纳入国家网络，下游、中小企业放给民间或者外资经营；另一方面，沿海面向全球开放，内陆挣扎转型求生。政商关系主线基本统一，但风貌各不相同^[11]。换言之，高层有高层的政商互动，基层有基层的政商往来，交织出一个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秩序。

四、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政商体制局限，制约超越领先

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于改革转型的当口，急需寻觅未来的出路。对此不妨借鉴类似中国发展经验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考察其中的相似与可比层面，并从相关案例中汲取教训^[11]。换言之，各发展型国家如何崛起？如何衰退？它们所面临的发展困局足可提醒中国未雨绸缪，而其转型经验也值得中国参考借鉴。

针对东亚发展型国家案例的经济停滞，现有文献主要围绕“国家能力”与“产业政策”两个特征^[12]。首先，部分学者认为其衰落肇因于“国家能力”弱化。此类研究部分强调国际政经局势，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全球化潮流以及相伴的“自由主义思潮”，逐步削弱了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国家能力”，导致国家撤出特定产业的扶持，失去对经济的引导权。与之呼应的部分研究侧重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认为随经济长期发展，配合威权体制转型，利益团体日益壮大，官僚机构被其俘获，难再推出有利整体的发展方略，甚至走向“裙带资本主义”。

其次，有部分学者更看重“产业政策”层面，特别是受所处“发展阶段”影响^[13]。也就是说，这类学者将发展型国家的兴衰归因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其中，对日本的案例研究发现，其产业政策在战后赶超阶段，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完成赶超之后，同样的政策便几无成效了。对此，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产业政策的本质为大量投入，只在短期刺激增长，若未有效提升效率，长期仍将走向衰颓^[14]。基于此，有学者主张：政府的产业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有模仿的目标，可是一旦自身成为领先国家时，便失去了参考借鉴的对象，产业政策便难有发挥余地。基于上述观点，东亚发展型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基本上是从资源动员为主的“模仿经济”转变为创造效率的“创新经济”。发展型国家衰落的关键原因是在创新领域中的“产业政策”失灵。这点可以自发展型国家的经验中窥探一二。首先，日本始终厉行产业政策，却饱尝政策错误的苦果。不论是在其引以为傲的半导体领域，还是在颇具竞争力的计算机领域，都因为政策错误而走向衰落。韩国情况也类似，在其信息光电、电子通信等领域逐步取得领先后，仍然维持“扩大产能”为主的政策方向。最终因缺乏重大创新的问题，韩国科技产业走向后继乏力的窘境。中国台湾地区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依靠信息产业、全球布局取得美好光景，即便也曾尝试调整产业结构，却始终未能将“侧

① 冯仑. 野蛮生长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重生产”转换为“创新培育”的产业政策，因而同样存在创新不足问题。其信息产业的优势随产品市场的衰退而逐步走向式微。

基于上述不同阶段的发展经验，可以归纳出传统“产业政策”不利于“创新培育”的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基于信息不足导致的“监督失灵”。创新行为通常被界定为一种“创造性破坏”，既难有所预期，又缺可循经验。面对严重信息不足，政府决策便不易进行战略产业选择与产业政策拟定。在执行上述政策时，也就缺乏清晰的标准。由于政府难以甄别与监督企业，创新往往沦为“大忽悠”。而监督失灵的结果，或者滋生“政策寻租行为”，或者腐蚀政策支持力度^{[9] 20-38}。第二类问题源于信息有限导致的“风险积累”。创新行为的特征之一就是风险巨大，面对成败难料、方向不明的形势，唯一的因应策略就是分散风险、多多试错。但是产业政策的本质却是选择企业、集中资源。厉行产业政策的结果不但放弃试错的可能，减少成功的机遇，还因政府扶持导致的“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降低了企业风险意识，难挡起伏动荡。总而言之，上述两类问题均源自“产业政策”与“创新行为”的本质冲突，因此种下了产业政策失败的种子^[15]。

面对周遭东亚发展型国家案例存在的困难，中国如何理解？又得到哪些启发？首先，上述涉及“产业政策”的分析更有助于理解增长逐渐放缓的困境，也能通过“东亚发展型国家”案例的经验超越它们的所有局限。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增长的放缓关键在于创新能力的不足。虽然早在2000年中，政府就开始推动“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但其具体的政策手段却与之前“追赶阶段”如出一辙，仍然是政府直接介入，援用许可准入、财税优惠、信贷支持等，引导企业投入创新。由于传统“产业政策”的局限，政府监管创新实践的能力有限，因此政策寻租者有之、盲目扩张者有之。虽然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了各种鼓励政策，其政策效果并不显著^[16]。基于此，中国想要改变现有政经体制的格局，超越目前政商关系的局限，避免或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桎梏，必须再进行一轮体制改革。

五、迈向未来：国家强势振兴、迈向全新阶段

从政经体制的角度考察，中国目前仍需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原因在于其本质是“制度陷阱”。换言之，支撑前期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之后将成为进一步突破发展的束缚。因此，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所仰仗的制度未必能帮助我们“中等收入国家”再走向“高收入国家”。从制度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解读，现阶段增长趋缓的问题有赖于进一步的制度改革。正当面对发展局限问题时，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掀起了一轮历史性的改革浪潮。展望未来，中国即将走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大到国家方向，小到政商互动，处处显现出崭新的风貌。就层次与规模而言，党的十八大所迎来的变化远远超过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政策调整。经过近几年的改革，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党和政府已经彻底拿回发展的主导权、领航的制高点。

政商关系既然是经济体制的大梁，自然能够充分反映“国家中兴”的气象，具体表现为亲清的政商关系^[17]。据笔者所见，其中“亲”虽然更重要，但“清”应该更优先。通过强有力的自我监察、无死角的官员问责，创造出高效而清廉的行政部门，一扫之前政商往来中的各种贪婪腐化。在“清”的基础上，国家便能“我心如秤”地一方面加强引导，扶持产业发展；一方面加强监督，确保政策落实。换言之，中国将在“有为政府”的基础上，启动新一轮增长动能，再攀又一个发展高峰，再实验一轮“政府主导”的发展方略。这是比战后“东亚奇迹”更大规模、超越世人想象的一次“中国实验”。

如果从政商关系角度来看，这条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中

国是在“全球时代”之中，推行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如我们所知，全球化潮流所至，各国政府无不声弱。但这样的趋势是否不可避免？政府能否因应与转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扮演较之前更加积极而重要的角色？其次，中国已渐挥别“追赶阶段”，却仍坚持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如我们所知，处于“低收入”阶段，各国经常凭借廉价要素、技术模仿、规模生产取胜，此阶段政府经常可以充分主导。可是一旦迈向“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必须仰赖技术创新，但政府能否有效扶持技术创新，并引领产业繁荣？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都犹未可知。因此，中国的做法都将从根本上挑战传统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正在迈开步伐的“中国道路”注定具有人类历史层级上的重大意义。正像当年的改革开放一样，人皆投向产权私有，中国却独觅蹊径，最终反得亮丽的成绩。换言之，无论是基于道路独特，或者是由于体量巨大，“中国实验”都将对全球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政商互动肯定不同于西方模式：或者是由于市场逐渐脱离引导，催生“高度自律市场”；或者是企业反向虏获政府，形成“利益团体社会”。经过这一轮的政府自我改革，中国不但将告别“市场转型”，与东欧国家分奔前程；也将超越“繁荣演变”，与东亚经验分道扬镳。中国政经互动的模式将航向何处尚无法清楚回答，但可以通过政商关系的演变观察这出激动人心的历史大戏。

参考文献：

- [1] 朱天飏. 国家能力与多样的政商关系 [M] //肖滨. 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 (2017).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34-55.
- [2] 耿曙, 陈玮. 政企关系、双向寻租与中国的外资奇迹 [J]. 社会学研究, 2015 (5): 141-163+245.
- [3] 耿曙, 陈玮.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 要素短缺还是制度束缚? [J]. 天津社会科学, 2017 (2): 84-89.
- [4] 吴敬琏.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 [M]. 2版,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 276-308.
- [5] 耿曙, 陈陆辉. 与市场共欣荣: 华北小镇地方网络的创造性转化 [J]. 问题与研究, 2001 (3): 83-108.
- [6] Shu Keng. The Changing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in Rural China, 1979-1999 [J].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2 (23): 109-148.
- [7] 耿曙. 中国大陆的区域经济动态: 问题意识及成果积累 [J]. 中国大陆研究, 2003 (4): 55-101.
- [8] Gabriella Montinola, Yingyi Qian & Barry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J]. World Politics, 1995 (1): 50-81.
- [9] 黄少卿. 走出发展的陷阱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3-93.
- [10] Jing Ye & Shu Keng. Development Paths,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J].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5 (2): 67-87.
- [11] 耿曙, 陈玮. “发展型国家”模式与中国发展经验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 16-20.
- [12] 朱天飏. 发展型国家的衰落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5): 34-39.
- [13] 陈玮, 耿曙. 政府介入与发展阶段: 发展策略的新制度分析 [J]. 政治学研究, 2017 (6): 103-114+128.
- [14]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1994 (6): 62-78.
- [15] 陈玮, 耿曙. 政府介入能否有效推动技术创新: 基于两个案例的分析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 76-84.
- [16] Wei Chen & Shu Keng. The Chines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ransition: In Light of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s [J].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2017 (2): 209-222.
- [17] 习近平: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强调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俞正声参加看望和讨论 [EB/OL]. (2016-03-05) [2018-06-20].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6-03/05/c_135158133.htm.

新时代中美合作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背景、条件与对策

王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摘要: 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 中美合作至关重要。中美合作的基础在于两国的共识, 但目前中美合作面临一些障碍。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确保朝鲜半岛局势行稳致远, 中国应建设性参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在角色定位上是“帮忙”而非主导, 要保护好自身利益, 积极施加影响。

关键词: 新时代; 朝鲜半岛; 中美合作; 半岛无核化

中图分类号: D7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8) 04-0106-07

一、新时代的朝鲜半岛局势

当前, 朝鲜半岛局势风高浪急, 已经逼近摊牌, 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以下 3 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朝鲜建设“核武国家”的“闯关”接近于最后阶段。标志是朝鲜在 2017 年 9 月 3 日和 11 月 29 日分别举行的核试验、洲际导弹实验。2017 年 9 月 3 日, 朝鲜宣布试爆了一枚可搭载于洲际弹道导弹弹头部的氢弹, 不仅威力大, 而且体积小; 11 月 29 日, 朝鲜宣布成功试射了“火星 15”导弹, 据测算其正常射程可达到近 12 000 公里, 覆盖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全境。朝鲜一直想要构筑的对美威慑目标有两个: 一是对美在亚太驻军和盟友构成实质性威胁; 二是对美国本土构成实质性威胁。因此, 朝鲜追求的目标其实就是洲际导弹+核弹头。

第二个指标是美国的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宣称不让朝鲜的目标得逞, 多次宣称不惜用战争手段, 尤其引人关注的表态有两次。2017 年 8 月 9 日, 特朗普表示: 朝鲜将遭遇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怒火, 当时他对“怒火”一词连续重复两遍以进行强调。9 月 19 日, 特朗普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称, 如果朝鲜一意孤行, 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不过当时特朗普说这些话的时候, 不仅国际社会多数国家都觉得他仅仅是说说而已, 即使美国国内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真的会采取武力措施。但是随着后续朝鲜加速核导发展, 美国国内舆论发生改变。2017 年 11 月 29 日, 特朗普的朋友、美国国会议员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指出: “特朗普已做好准备摧毁朝鲜政权、保护美国, 我们绝对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8.04.012

作者简介: 王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

引用格式: 王俊生. 新时代中美合作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背景、条件与对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4): 106-112.

不会让朝鲜政权拥有打击美国本土能力。”^①2018年1月30日，随着特朗普政府钦定的美驻韩国大使车维德因反对“鼻子流血”（Bloody nose）方案而被撤销提名，外界对特朗普政府可能对朝动武的担心再次泛起^②。2018年1月9日，朝韩实现对话、半岛局势出现缓和后，《华尔街日报》透露美国政府还在继续评估这种对朝鲜的有限武力打击方式^③。

第三个指标是国际社会对朝制裁手段接近于穷尽。2017年的对朝制裁与此前的最大区别在于，此次制裁触及朝鲜经济发展的基础。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决议禁止从朝鲜进口的主要出口项目包括煤矿、钢铁、铅和海产品，一些数据估计这次制裁将导致朝鲜的国际收入减少10亿美元；第2375号决议禁止朝鲜出口纺织品，据估计朝鲜的国际收入将因此减少7亿美元，这一决议首次对朝鲜石油制品的供应和出口限制在每年200万桶；第2397号决议进一步将朝鲜每年的成品油进口数量从200万桶削减至50万桶，以及联合国成员必须在24个月之内遣返其境内的朝鲜劳动工人。2017年5月3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国务院发表演讲时表示，目前美国对朝制裁强度仅处于20%~25%的水平^④。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自2017年8月开始联合国安理会陆续通过三个对朝制裁决议后，对朝施压的效果正在显现。2018年1月17日，白宫官员公开表示，“2017年的对朝制裁共减少朝鲜外汇收入25亿美元，相比于2016年其外汇创收减少了95%。如果按安理会决议，未来两年‘驱逐’朝鲜海外劳工，朝鲜外汇创收将再减少5亿美元，届时在2019年年底将完全封堵朝鲜的合法外汇创收渠道”^⑤。美国亚洲协会的托马斯·拜恩认为，通过2017年的制裁，“已经使得朝鲜出口商品的90%遭到限制，这将会严重打击朝鲜经济”^⑥。2018年4月11日，车维德在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甚至认为，“2017年的对朝决议使得朝鲜外贸的近100%都遭受制裁”^⑦。

综上，自1993年第一次朝核危机浮出水面以来，朝鲜半岛问题在真正意义上逼近摊牌的前夜。所谓摊牌是指朝鲜半岛问题的走向无外乎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美朝两国意识到此前的政策行不通，需要进行直接对话，照顾对方的合理关切，朝美关系与朝鲜半岛局势实现“柳暗花明”；二是如果外交解决的前景悲观，这就有可能滑向战争方式。正如一些美国专家指出的那样，“一旦美朝首脑会晤失败，那么特朗普更有可能倾向于选择战争方式”，“因为特朗普届时可以向美国民众

① Sophie Tatum, “Graham on North Korea: ‘We’ re headed for war if things don’ t change, ’ ” CNN, November 29, 2017.

② Steve Mollman, Victor Cha is against a preventive strike on North Korea and now won’ t be US envoy in Seoul, January 31, 2018. <https://qz.com/1193833/victor-cha-is-against-a-preventive-strike-on-north-korea-and-now-wont-be-us-envoy-in-seoul/>.

③ WSJ: U. S. STILL CONSIDERING BLOODY NOSE STRIKE, JAN 9 2018, <https://www.trunews.com/article/wsj-u.s.-still-considering-bloody-nose-strike>.

④ Rex W. Tillerson, “Remarks at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Ministerial Session on D. P. R. K”, April 28, 2017,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04/270544.htm>.

⑤ Press Briefing with Acting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Robert Scott,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North Korean Policy Mark Lambert, and Acting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Sandra Oudkirk U.S. Policy on North Korean activities in Africa. January 17, 2018. <https://www.state.gov/r/pa/ime/africamediahub/r/s/277495.htm>.

⑥ Thomas Byrne, PacNet #3 - Kim Jong Un's New Year's Resolution: What It Means. January 10, 2018. See: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cnet-3-kim-jong-uns-new-years-resolution-what-it-means>.

⑦ Victor Cha, “North Korea’ s Diplomatic Gambit: Will History Repeat Itself”, P4,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April 11, 2018.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congressional_testimony/ts180411_Testimony_House_Victor_Cha.pdf?eri3vN5H.eC3ugVvYUIGv01pCB9YqG6Am.

和日韩两个盟友解释“我外交手段上尽力了，但外交解决不了，只能动武”^①。实际上，2018年以来朝鲜与美国都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强劲动力，这鲜明体现在2018年5月朝美首脑会晤的“取消风波”上。

2018年5月24日，朝鲜副外相崔善姬发表公开谈话，指出“美国副总统彭斯所谓的‘利比亚模式’解决朝核问题充分说明其是‘政治笨蛋’”，指责美方不自量力、不讲分寸，并表示“朝美是在会谈场所见面，还是在核对核的对峙中见面，全部取决于美方的决心和举动”。特朗普随即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12日的朝美首脑会晤，但他又留有余地，指出“任何时候如果金正恩希望对话解决，请随时和我联系”。5月25日，朝鲜副外相金桂冠发表公开信，语意恳切地指出“朝美领导人亟须会晤，为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能够成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付出了最大努力”，“对话的大门依然敞开，朝方愿随时与美方对话解决问题”。5月29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部部长金英哲访问美国，连续多次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金英哲是2000年以来到访美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与此同时，朝美另外两个代表团也在新加坡与板门店举行会谈。6月1日，特朗普会见金英哲，金英哲当场转交了一封金正恩给特朗普的亲笔信。随后特朗普宣布，“朝美首脑会晤仍将在6月12日举行”。这充分表明美朝双方均有强烈政治意愿举行首脑峰会。通过“取消风波”，朝美两国希望和平解决分歧的意愿得到确认。在朝美首脑会晤达成的《联合公报》的开头，特朗普与金正恩表示双方进行了全面、深入、坦诚的会谈，旨在建立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不像此前的互相指责和相互施压，这次特朗普甚至称同金正恩建立了特殊亲密关系。金正恩也反复感谢特朗普为双边会谈付出的努力。

2018年8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率领美方代表团结束了在平壤与朝方的高级别会谈，这是美朝新加坡首脑会晤后的首次高级别会谈。从蓬佩奥访问朝鲜后美朝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仍然存在一些较大分歧。蓬佩奥称与朝鲜的会谈富有成效，但是朝鲜外交部的发言称对蓬佩奥的访问成果表示深切遗憾，并表示华盛顿坚持快速推进去核化是“强盗”行为。可以说，当前朝鲜半岛问题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是通过相向而行从而抓住和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解决朝鲜合理关切的历史契机，还是重复过去失败的教训而重回对峙乃至走向更为严重的冲突，正在考验着各相关国家的诚意与智慧。

二、中美合作对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至关重要

之所以强调中美合作对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至关重要，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利益与影响力。

其一，从利益分析上看，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着密切利益关联。美国方面，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毫无疑问会深刻影响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的走向。随着朝鲜核武器的小型化与洲际导弹技术的快速推进，朝鲜越来越接近于实现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的能力。考虑到美朝两国关系，朝核问题的发展走向已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对中国而言，首先是安全问题。朝鲜核试验地点离中国不足100公里，中国一侧人口稠密。随着朝鲜加速核武发展，韩国与日本独立拥核的呼声在升高。比如在韩国，不同于过去主要是由反对党或者其他民间人士主张拥核。2016年以来，韩国执政党内部和政府高官开始直言不讳地表达类似观点。2016年2月15日，韩国新国家党院内代表元裕哲在国会交涉团体代表演讲中呼吁“为应对‘北韩’的代表恐怖与毁灭的核武器和导弹，我们也需要从行

^①MARK BOWDEN, A Trump-Kim Summit: Why the Hell Not?, MAR 10, 2018; SEE: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3/trump-kim-jong-un/555323/>.

使自卫权的角度出发用代表和平的核武器和导弹来以牙还牙”^①。同时，“拥核”的朝鲜会给美国在东亚地区加强军事存在提供借口。美国目前已经借朝鲜核威胁实现了航母在黄海军演的常态化，并不顾中国和俄罗斯的坚决反对实现了“萨德”入韩。如果朝核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在当前中美关系竞争性一面凸显的背景下，美国极有可能再次以朝核问题为借口在韩国重新部署包括战略核武器在内的更多战略武器，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其二，从影响力方面看，在半岛局势上美国的影响力是最大的。一是因为其与日韩两国的同盟关系，二是美国自身的实力。朝鲜在“弃核”谈判上所要求的关键回报只有美国才能满足，比如对朝鲜体制与国家的安全保障、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正常国际环境，这都加大了美国在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中国虽然对朝鲜的影响力有限，但这种影响力不仅重要且不可替代。这从2018年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三次访问中国就可以看出端倪。其中3月底，金正恩对中国的访问是他就任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的首次出国访问。这首先得益于地缘政治关系，中朝两国在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上具有共同利益，其次是由于历史上朝鲜战争中，中朝并肩作战。这种曾经在战场上“肩并肩、背靠背”的经历与历史记忆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除此之外，中朝的经贸关系比较紧密，朝鲜90%的贸易仍然是和中国进行的；中国与朝鲜有长达1300公里的边境线。虽然俄罗斯与朝鲜也有边境接壤，但与中国相比要短得多，只有不到40公里，而且俄朝接壤处，俄罗斯一侧荒无人烟。加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与韩国紧密的经贸和人文关系以及近几年在迅速推进的安全关系等，这其实变相地对朝核问题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复杂性也是朝鲜在对美谈判上可以借重的力量。

由此可见，在影响朝鲜半岛问题走向的外部因素里，中美关系至关重要。这就表明，当前要妥善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中美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有时候朝鲜和韩国互动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在于朝韩关系本身，而且更希望借此撬动与大国的关系。这也是许多观察者将2018年4月27日朝韩首脑会晤视为美朝首脑会晤的“准备”与“试金石”的主要原因。影响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合作的因素，无疑是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或分歧。

三、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

相比于美国前任政府，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性改变，这对中美合作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看，其一，特朗普政府坚决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与中国存在共识。2018年1月30日，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再次表示，“美国有‘完全的决心’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②。对中国而言，正如王毅部长指出的那样，“只有实现了无核化，半岛才有真正和持久的和平”^③。

其二，特朗普政府将朝鲜半岛问题作为其外交优先议程，预示着美国有解决问题的强烈政治意愿。金正恩在2017年的新年贺词中表示，洲际导弹进入最后测试阶段，这增大了特朗普政府解决朝核问题的紧迫性。2017年3月1日，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认为朝鲜是美国最大的、最直接的安全威胁”^④；3月16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问日本时表示，美国过去20年促使朝鲜无核化的政

① 参见：<http://view.asiae.co.kr/news/view.htm?idxno=2016021609475588065>.

②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30,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state-union-address/>

③ “王毅：只有实现无核化半岛才有真正和持久的和平” [EB/OL]. (2014-03-08) [2018-06-20]. <http://news.sina.com.cn/o/2014-03-08/111129656031.shtml>.

④ Karoun Demirjian, Speaker Ryan offers AIPAC policy pledges, announces trip to Israel,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1,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werpost/wp/2016/03/21/speaker-ryan-to-offer-aipac-policy-pledges-announce-trip-to-israel/?utm_term=.e86124489400.

策都失败了；3月17日，蒂勒森在访问韩国时表示“战略忍耐”政策到此为止，12月7日，蒂勒森在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朝鲜是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①。在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越是拖延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那么美国面临的威胁将会更加严重，美国所能采取的防御性措施也会更少”^②。其实这种紧迫性对中国而言也是如此。如上所述，美韩多次以朝核问题为借口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与强度越来越大，半岛局势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紧张。这不仅导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难以在东北亚地区落地，而且冲突与战争风险时刻存在，对中国的边境安全造成了极大干扰。

朝核问题自冷战以来发展至今，部分原因就在于美国过去几届政府“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缺乏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反而是利用朝核问题服务于其加强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在东亚推进霸权战略。中国正好相反，“中国具有解决问题的强烈政治意愿，但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1]。特朗普政府将朝核问题解决列为优先外议程，并显示出解决问题的意志，这就使中国与其合作解决这一问题具有了可能性。

其三，中美两国都希望和平解决。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一贯坚决反对战争方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正如王毅部长在2017年4月26日指出的，“至于（在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有多少可能性，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行，朝鲜半岛不是中东，这个地方一旦出现了战争，那后果是不堪设想”^[2]。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迄今并未对朝鲜动武划下红线。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在力争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基于上述共识，特朗普在推特上多次表示和中国正在进行紧密合作，表示“我非常感谢习主席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给予帮助的努力”。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也有较高期待。长期关注国际议题的美国记者纪思道认为，“唯一的选择是与中国一起坚持不懈的合作，达成协议”^③。

尽管中美两国具有强烈的共同利益加强合作，但是两国的分歧也依然严重。其一，两国对于朝鲜半岛问题产生根源与解决思路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从中国的角度看，朝鲜半岛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两个：有关国家错误的政策与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美国的错误政策体现在不愿意正面回应朝鲜的安全关切，并且显示出利用半岛局势的适度紧张服务于其亚太战略的倾向。半岛冷战格局主要体现为美日韩对朝鲜的安全威胁。冷战结束后，朝鲜所面对的美日韩的安全威胁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愈来愈大，这典型体现在美韩两国每年针对朝鲜的联合军演上。美韩制度性联合军演主要集中在朝鲜的春播秋收时，此外还有许多不定期军演。这不仅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而且对朝鲜正常的经济建设也造成很大干扰^[3]。美朝错误政策及互动过程中彼此螺旋上升的误判与敌意是致使朝鲜不愿“弃核”的根本原因^[4]。这就需要谈判解决，以缩小小政策差距，逐渐找到共识。针对冷战格局，要把朝鲜半岛停战协定转化为和平机制。这是中国提出应“并行推进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双轨并行”解决思路，以及“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的“双暂停”解决思路的基本逻辑。

相反，美国认为朝核问题发展至今是朝鲜的责任，小布什政府将朝鲜称为“流氓政权”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实际上经过美国媒体经年累月的塑造，朝鲜在很多美国人眼中早已是十恶不赦

① Rex Tillerson. I am Proud of Our Diplomacy,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2017.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26.

③ Nicholas Kristof. The North Korea-Trump Nightmare, April 20,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4/20/opinion/the-north-korea-trump-nightmare.html>.

的“流氓国家”，加上朝鲜近年来确实在频繁试射导弹和核武器，特别是美国人认为自其建国以来，朝鲜是第三个对其直接威胁进行核打击的国家，美国战略界人士内心深处对朝鲜充满“敌意”。在这种不恰当的意识支配下，美国战略界就选择有意回避自身责任，普遍认为责任完全在于朝鲜。这其实是特朗普政府出台对朝“极限施压”政策的基本逻辑。

正是由于对问题本质的看法存在区别，美国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和中国存在巨大差别。美国不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建议也是如此逻辑。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甚至表示，“某些国家倡导的双冻结选项是对美国的侮辱”^①。美国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坏行为”，而美韩联合军演是正常的双边同盟行为，为什么要用停止正常的行为来换取“坏行为”的停止呢？美国主张对朝鲜的“坏行为”只能施压惩罚。归根结底，美国丝毫没有认识到自身责任。“中国责任论”在华盛顿更是盛行。这种观点认为朝核问题发展到今天，正是由于中国不愿意配合美国对朝鲜全面施压所致，这也是美国所谓的对华“次级制裁”的主要依据。

其二，威胁对中国施加“次级制裁”的非理性声音在美国也在增强。2016年美国国会赋予奥巴马政府更多权利，以对和朝鲜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企业和个人进行“次级制裁”，但奥巴马政府并没有使用这一权利，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开始使用这一权利。2017年9月，特朗普发布第13810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对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企业和个人开展“次级制裁”^②。由于与朝鲜进行贸易往来的绝大多数企业和个人都属于中国，这给中国的相关合法权益带来了伤害。美国战略界的这种不理性声音也很高涨，传统基金会的布鲁斯·克林纳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2018年2月24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一些国家的涉朝企业、船只及个人实施所谓史上最严厉的单边制裁后，布鲁斯·克林纳对此仍不满足，呼吁应该对中国涉朝企业进行更严厉制裁。“参议员递交给白宫12家涉朝中国公司，但迄今为止，白宫还没有任何行动。美国曾经因在伊朗核问题上对欧洲银行罚款120亿美元，但却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类似的行为熟视无睹”，“特朗普政府必须把制裁重点转向中国银行和企业等”，“如果再对中国的类似行为熟视无睹，特朗普的对朝政策就不是真正的‘极限施压’政策”^③。

实际上因朝鲜发展核武，中国一直在对朝鲜施加巨大压力，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与外交成本^④。那么为什么美国还不满意呢？原因就在于，美方认为朝核问题的根源在于朝鲜，甚至认为中国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反而没有反思自己的责任。

其三，主张从地缘上给中国施加更大压力的不理性声音也很高涨。“如果朝鲜核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美国就应该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这除了威慑朝鲜外，也是在警告中国。”^⑤实际上，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不少，进一步强化只会让朝鲜固化拥核心理，也破坏与

① Jeremy Herb, Joshua Berlinger and Taehoon Lee, "Haley: Kim Jong Un 'begging for war'," CNN, September 5, 2017. <http://www.cnn.com/2017/09/04/politics/haley-north-korea-untied-nations/index.html>.

② Thomas Byrne, PacNet #3 - Kim Jong Un's New Year's Resolution: What It Means. January 10,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cnet-3-kim-jong-uns-new-years-resolution-what-it-means>.

③ Bruce Klingner, Trump's New North Korea Sanctions Are Good, but Not Tough Enough, Feb 23rd, 2018. <https://www.heritage.org/asia/commentary/trumps-new-north-korea-sanctions-are-good-not-tough-enough>.

④ 2017年8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峰会外长会时表示，鉴于中国同朝鲜的传统经济联系，执行决议、付出代价的主要是中方。9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再度表示：中方严格、全面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并为此做出巨大牺牲，付出巨大代价。

⑤ Abraham Denmark, The U.S. Can't Get Rid of North Korea's Nukes Without Paying a Catastrophic Price, Sep 19, 2017.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the-us-cant-get-rid-north-koreas-nukes-without-paying-catastrophic-price>.

中国的合作。美国这种“通过惩罚中国而惩罚朝鲜”的错误逻辑只会让中国认识到美国并不是真正想解决问题。此外，对美国威胁要对朝动武的政策，中国也坚决反对。

四、中国应该建设性介入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

综上所述，为和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推动半岛局势行稳致远、维护中国利益，中国应该建设性介入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并就此问题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其一，更积极地介入是向朝美两国表明其所达成的协议受到国际监督，中国是国际监督的重要力量。朝美信任缺失是众所周知的问题。即使协议达成，那么互相扯皮必然成为协议履行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过去的监督效果不佳，因为朝鲜指责其由美国在背后操控。从南非核问题与乌克兰核问题的经验上看，大国的监督是和平解决核问题的重要保障。这里不仅中国要参与，相关的其他国家也可以适当参与进来。

其二，中国的利益使然。朝核问题走向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朝核问题首先是朝美关系问题，但是它不仅仅是朝美问题，而是牵涉到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重大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朝核问题解决、地区格局变动等都会对中国利益造成影响。国际关系中，没有国家会保护缺席者的利益。中国参与进来也是保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正当诉求。

其三，这也和中国的付出有关。从四方会谈、三方会谈到六方会谈，中国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付出了巨大努力。2015年以来，中国为打破半岛僵局，相继提出了“双轨制”与“双暂停”的解决思路。美国对朝“极限施压”中的经济部分很大程度也是由中国所承担。中国理应发挥和自身付出相匹配的作用。

当前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迎来了一个关键期，我们乐见朝美对话，实际上长期以来也一直在积极推动。但为了抓住当前难得的机会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使半岛和平行稳致远，中国应该建设性地介入到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第一角色定位是“帮忙”而非主导，第二角色是要保护好自身的利益。这两者互相联系，不帮忙就难以保护好自身的利益。之所以不主导不仅因为其中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由于自身的力量也做不到。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与影响力，不发挥一个与实力和影响力相符的角色，往往意味着朝鲜半岛问题难以解决。

参考文献：

- [1] 王俊生. 冷战后中国的对朝政策——美国的解读与分歧 [J]. 东北亚论坛, 2013 (4): 19-27+128.
- [2] 王毅: 朝鲜半岛不是中东爆发战争可能性 1%都不行 [EB/OL]. (2017-04-27) [2018-03-16]. http://news.ifeng.com/a/20170427/51010736_0.shtml.
- [3] 刘江永. 朝鲜半岛局势与东北亚可持续安全 [J]. 东北亚论坛, 2016 (3): 3-14+127.
- [4] 王俊生. 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战略缺失与敌意螺旋的形成 [J]. 教学与研究, 2013 (9): 72-80.

责任编辑：任蓓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 卷(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 55(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 52(6): 6-12 [24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jy/hlwxz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18年第4期 总第10期 第2卷

双月刊 2018年7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何晓栋

执行主编：汪守军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定价：15.00 元